

Vol. 10
2023 JUN

如水
flow HK

流散媒體？ 如何抗衡 國家機器？

調查報道

統戰部借香港秘密持《歐洲時報》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

專題

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

專訪

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
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繩資源下生存？

學者觀點

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

流散媒體 如何抗衡 國家機器？

Vol. 10
2023 JUN

如水
f low HK

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採訪・報道

編者話

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海外抗衡「大外宣」 何以困難重重？

文／M.Y. 004

調查報道

統戰部借香港秘密持《歐洲時報》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

文／卡卡
莫莫
M.Y. 010

專訪

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
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絀資源下生存？

文／M.Y. 030

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

文／編輯部 042

Infographic

化零為整

2－4月 香港・世界大事回顧

文／編輯部 058

2－4月 外媒觀點整理

文／編輯部 062

2－4月 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紀錄

文／編輯部 068

2－4月 香港研究進展

文／編輯部 074

學者觀點

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敘利亞媒體
對香港記者的啟示

文／Jacky 078

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

文／Jacky 094

專題

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

文／M.Y. 102

風暴中的獨立之聲：
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

文／凌志豪 116

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意國直擊

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

文／編輯部

124

《路透社》 紀念講座

如何在獨裁下報道：
尼加拉瓜及其他地區的經驗

翻譯／Jacky

130

創作・評論

評論

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文／Kennedy Wong 138

遙控器上的香港：
比起媒體，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

文／破曉 142

創作

以攝影走入社區

文、攝／陳啟駿 146

四手聯彈——流散傳媒

畫／日巷 148

瑪珂

Justin Wong

vawongsir

編委答

文／馮敬恩 150

文／式 152

讀者投稿

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

文／莫離 154

編者話

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海外抗衡「大外宣」 何以困難重重？

文／M.Y.

今期《如水》談「流散媒體（Diasporic media）」。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到底甚麼是流散媒體？筆者向香港、臺灣的友人介紹時，就說到：「通俗而言，即是一些離開了原居地在海外運作，但仍然關心原居地社群的媒體，我們《如水》也是一例……」

在國安法後，多間香港傳媒逐一停運，與此同時又有一些新的媒體誕生，面對這個現象，今期《如水》分別訪問《同文》、《棱角》兩間流散媒體，亦訪問了 RFA（自由亞洲電

台）粵語部副主任胡力漢，一起探討現時在香港做新聞的環境，以及已在海外的流散媒體能做些甚麼。

RFA 是目前在香港仍有辦公室的外媒。在《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的專訪中，胡力漢自言：

「我覺得現在香港媒體有好多自我審查……不該說他們自我審查，而是大家都不清楚紅線在哪，所以香港媒體會退得好後……（至於）香港傳媒可以做的，我們都可以做，而且還可以比香港媒體行前一步……面對（國安法）『紅線』，我們可以企得硬啲」。

雖說 RFA 可以相對「企得硬」，但在香港做新聞還是有不少局限，像是難找合適的人做訪問，他坦言在香港「基本上做唔到啲」（當然，在海外做新聞也有一定的挑戰，下文會講述）；還有一點，即使 RFA 相信在國安法下仍有辦法在港運作，但是否有美國政府資助就凡事都無所畏懼？答案是否定的，而令他們最擔心，是聲言即將立法的《基本法》第 23 條，會不會針對外媒。

「以我所知（若然立法後）有很多外國媒體都……都咩嘅啦，都摺嘅啦、都走（苦笑），多間外媒都收縮得很厲害。」——胡力漢

當許多外媒離港，香港發放新聞的渠道減少，海外香港媒體就變得更有價值，筆者作為在流散媒體工作的一員，認為除了可以利用海外空間繼續為香港議題發聲，同時也在制衡政權外宣，讓外界聽到不同港人的聲音。故此，今期的主題訂為《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在《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絀資源下生存？》的專訪中，他們不約而同講到在海外做港聞有一定局限，其中：

「海外的流散媒體無法如香港傳媒一樣快速、在現場報道即時情況，亦要依賴香港傳媒的第一手報道。」——《同文》總編 YC

「畢竟人在海外，能取得的新聞資料已是第二、三手，但相信仍可做到一些香港傳媒受國安法『紅線』所限而無法選取的新聞角度。」——《棱角》總編輯 Jane Poon

除此以外，流散媒體大多面臨資源短缺的問題，因為難像主流媒體般有持續、穩定的廣告收入，只能靠讀者付費訂閱，兩人皆說因此裁減人手，其中 Jane 說，希望減省支出能更容易達到收支平衡：

「無辦法啦，（目前）只有 cut（人手）啦……大家同事都明白……因為大家都想做到落去。」

破曉的評論文章《遙控器上的香港：比起媒體，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就不看好香港流散媒體的前景：

「歷史軌跡表明，離散媒體成長所依賴的翻譯外電和移民專題，需求將隨後代融入當地社會而下降。有心人成功配對資金支持仍要面對缺乏影響力的困局，畢竟目前的復甦假象掩飾不了市場萎縮的事實。雖然多間新辦媒體先後吸納以往具公信力媒體的班底，但整體影響力疊加起來，仍不足以彌補一間傳統媒體的消失。要麼只能專注一類新聞、要麼隔周刊登深度報道、要麼在多地頻密更新而分身不暇。最不方便的真相是，即使媒體數量反彈，留下來的人發現以碎片化網誌的方式苟延殘喘，已難以重奪流失至綜合性外媒和專門時事評論的讀者群。」

然而，面對財政壓力、讀者群流失致難以經營下去的，不只是流散媒體，同樣在國安法後成立，但紮根香港的新媒體亦然。Channel C HK 今年 6 月初「告急」，指一直以來大力

支持該平台營運的「有心人」無法繼續提供財力支援，Channel C HK 須在一個月內自負盈虧，否則將在 7 月 12 日開台兩週年之際停運。港人聞訊後一呼百應訂閱支持。

《同文》總編 YC 在訪問中提到：

「有賴《蘋果》當年推出訂閱制，讓港人慢慢接受付費閱讀，現在大家都比較願意捐錢給與民主自由有關的組織及媒體……《同文》今年有開設 Patreon 接受公眾捐款，儘管收到的款項不算多，但至少可以補貼一部分支出。」

那麼有多少香港人願意「課金」支持香港媒體？今期《如水》製作的 infographic 《海外、居港港人 有幾信任、支持香港媒體？》，希望與讀者、傳媒行家一起探討這個議題。我們在《如水》各個社交媒體發帖，邀請公眾分享對於香港媒體（包含國安法前、後成立之海外及香港傳媒）的可信度，以及每月願意花費多少錢訂閱等資訊。

我們透過數據發現，不論在香港還是海外的受訪者，無「課金」者皆超過四成；而願意每月付費者當中，分別有 57% 及 75% 人報稱每月支付金額為港幣 99 元以內。不過，居港受訪者相對比海外受訪者更願意支付較高金額支持傳媒機構，前者有約 25% 每月支付超過 100 港元，而後者僅 14%。

至於哪間傳媒在受訪者心中可信度最高，容筆者賣關子，請讀者在今期《如水》中找答案。

在我們這本 160 頁的雜誌裡面，當然不只是訪問傳媒行家，還有其他持分者。筆者在本期雜誌撰寫《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的報道，訪問了在 2019 年反送中後，赴英國、美國及臺灣讀傳播學系學士及碩士課程的香港學生，以瞭解他們為何明知香港新聞機構萎縮、就業機會減少，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度大幅倒退，仍繼續讀新聞相關科系。

筆者發現，他們或多或少是受到反送中事件影響，但不一定是受抗爭運動啟發而想做新聞，就如在美國讀大學的 Ariel (化名) 就談到：

「因為（在旁聽的過程中）法庭內不可拍照或錄影，只能靠文字記錄，我希望自己未來能用記者的身分，透過報道記錄這些歷史，『否則可能之後就無人知道入面發生過甚麼事』。」

其實，她大學主修地質學，正是因為反送中，才突然副修新聞系，及後還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副修科目及做該校學生報記者，對此的熱誠更超越主修科系。

在英國讀書的 Reagan 想做記者，是源自從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加上讀中學時讀到《傳真社》的一篇報道，讓他認為記者追查鮮為人知的事件讓公眾知道，「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職業」。

至於在臺灣攻讀傳播學院碩士的 Patty (化名)，是本篇 3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人在香港讀過新聞系，並曾在反送中前線做採訪。會去臺灣進修，她不諱言其一原因是不想留在香港發展，也不想在香港繼續讀新聞。從筆者與她交談，察覺她對新聞行業前景的看法較另外兩位悲觀，對未來會否從事新聞行業，她的答覆也比較模稜兩可：

她認為，臺灣傳媒薪酬待遇較差，行業前景不太明朗。她亦會考量做傳媒能否幫助她未來的生涯規劃... 她坦言不想在臺灣做即時新聞，只想做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 若找不到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則可能考慮做 *Marketing* 或者於研究中心任職。

而在訪問中，他們均告訴筆者，在學業或學生報上，做過、或爭取過做有關香港的議題，但當筆者問及假設未來在海外做傳媒，會否想繼續做香港議題，三者均認為該 move on，其中 Reagan 指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驅使他想做記者，只是一個起點：

「我不單只做香港新聞，甚麼地方的新聞我都想做。再者，做香港新聞，受眾真的太少了，我希望用英文做新聞能夠擴大受眾，為更多勢弱言輕者發聲。」

講到語言帶來的制肘，目前香港的流散媒體主要都是以中文發稿，這會否局限了傳播範圍僅在華語圈子，難以「衝出國際」呢？是否該改變模式要出雙語報道？

我們編輯部同事 Jacky 在《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敘利亞媒體對香港記者的啟示》一稿，訪問到專注中東和北非地區新聞和政治活動、研究敘利亞流亡記者的學者 Yazan Badran，他以敘利亞的經驗指：

「這對敘利亞媒體來說已經成為必要，現時大多數敘利亞媒體都是以雙語出版，至少有部分報道是這樣處理... 對香港而言，首先，我想中國大陸如此龐大、資金充足，而且有國家支持，香港媒體不可能通過出版中文雜誌帶來甚麼變化。」

但我認為，在另一方面，即使香港媒體只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與華語圈的其他讀者互動，香港媒體也有一個基本責任參與這個更廣的

公共領域 . . . 因為一旦你開始翻譯，你就開始在一個不同語言的語法及思考邏輯中重新思考問題，並試圖把它們翻譯成一個不同的範式，同時在該翻譯語言的文化領域生產知識。」

今期《如水》的兩篇學者訪問，英文版會在網站上刊出。

然而，流散媒體並非香港、敘利亞獨有，全球各地只要有極權的地方，就會有流散或流亡媒體出現，有些甚至已有幾十年歷史。

就像今期《如水》獲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授權，將流亡海外的著名新聞網站 *Confidencial* 的編輯、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Carlos F. Chamorro），今年在《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內容翻譯成中文發表。

查莫洛的身世頗為特別，其父生前是《新聞報（La Prensa）》總編（1978 年遭暗殺），查莫洛就在一個月後、獨裁統治下展開其新聞工作生涯；至於其母親，1990 至 1997 年間曾任該國總統，推動民主轉型，不過，隨著現在的當權者奧蒂嘉（Daniel Ortega）自 2007 年重新掌權以來，當地的民主體制就大幅倒退，甚至加強管控媒體：

（政權）設計出一套傳播戰略，強制推出所謂「未受污染資訊」，也就是她所謂的「純淨狀態」的資訊，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傳達到市民手中，不經任何獨立媒體的質疑或調查。

這種專制政府的模式，在 2018 年 4 月爆發的公民抗議運動下崩潰，政權看到自己的權

力受到威脅，遂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 . . . 並視新聞界為要粉碎的敵人 . . . 2020 年，政府通過「網絡犯罪特別法」，針對透過社交媒體和媒體機構傳播的所謂「假新聞」，並將涉案者處以 1 至 5 年的監禁。

何謂「假新聞」？當局無定義，某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查莫洛說到，在法例生效後，至少有 20 人因而锒鐗入獄，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牧師，甚至一個沒有任何社交媒體賬戶的農民。他的 *Confidencial* 編輯部，則分別在 2018、2021 年兩度遭警方查封，迫使他們流亡海外，在異地繼續無間斷做原居地的新聞。

另外，*Confidencial* 還是今年 4 月在意大利佩魯賈舉辦的國際新聞節中，題為「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Exiled Media is Not Just a Trend）」的講者之一。《如水》編輯部一篇《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記者專程前往意大利，參加及報道這場歐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傳媒業界盛事。在這場討論環節，5 名分別來自緬甸、尼加拉瓜、俄羅斯等國家的媒體機構，其流亡媒體人進行小組討論，當中談及營運財政壓力，還討論到流亡媒體的目標受眾群：即應該面向（原居地的）本地居民，還是已經流散到海外的流散社群？

如果選擇以流散社群為主要對象，傳媒機構便可能須要面對流散族群人數遠少於本地居民的現實。讀者人數不足會導致影響力不足、資源不足，傳媒工作可能會難以持續。儘管如此，放棄流散社群讀者、專注於本地讀者也未必是出路。最明顯的問題是，媒體工作者如何在異地報道自己家鄉的事。在拉脫維亞報道俄羅斯新聞的 *Medusa* 總編輯及創辦人之一 Ivan Kolpakov 坦言，「每個流亡媒體都會努力為他們的母國提供服務，並期望自己能與本地民眾保持聯繫」，但如何

做到這一點，對於流亡媒體來說仍是個挑戰。

那麼，這些問題究竟可以如何解決？顯然沒有標準答案。事實上，即使有，答案也可能隨著時局的發展而改變，例如新科技的出現，可能會帶來新的解決方案，但威權政府採取新的打壓手段，又可能會加大應對問題的難度。——《如水》編輯部 著

也就如標題所示，5 人藉該活動，正式宣布成立環球流亡媒體網絡 NEMO (Network of Exiled Media Outlets)，希望能將全球的流亡媒體連結起來，讓彼此能夠互相幫助、互相借鏡，以令流亡媒體工作者能夠一起走過艱難的路。

《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則寄語：

「尼加拉瓜的經驗表明，在獨裁統治下，流亡新聞業的抵抗並不足以為民主變革鋪路，但只要他們保持信念，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新聞，新聞自由的火焰就會繼續燃燒，成為所有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上文有提及到，俄羅斯也是一個有不少流散海外媒體的國家。凌志豪撰寫的《風暴中的獨立之聲：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訪問了網上學生媒體《風暴 (Groza)》創辦人 Marina Bezmaternykh。受訪者已在俄烏戰爭後流亡海外，而她的媒體在經營 3 年後，正打算轉型。

轉型有兩種，一種像是《同文》，避免各家海外香港媒體都做一樣的事而力量抵銷，所以按實際情況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尋求改變。另一種就如俄羅斯的《風暴》，原是關注當地大學教育議題，現在因為當地政局愈趨敗壞，故想轉型成一個推動公民教育的組織。Marina 指：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急需學會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 例如由（學校）宿舍問題到（俄烏戰爭）軍方動員入伍等生死攸關的課題，人們需要知道如何自保... 在現時的俄羅斯談人權是極為矛盾，儘管法律明文賦予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人權的狀況亦是如此。」

像這種的做法，香港亦有類似。香港民主女神的「本業」是聚焦在藝術及文化方面，加上團隊成員皆非做／讀傳媒出身，據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ex 說，是「（藉此）提供平台為港人帶來不同角度觀察社會議題」。

對於媒體應否參與社會運動，在《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中，Terje S. Skjerdal 說道：

「如果媒體的主要動機是宣揚特定政治議題或代表特定政治立場，那麼我認為媒體需要公開這一點。他們需要保持透明，盡量不隱藏自己的意圖... 其次，對於純粹的社運媒體，如果它唯一的動機是帶來改變、干預或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我對能否稱之為專業新聞有所保留。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與傳統新聞學所定義的新聞不同的東西。雖然，在當地社會完全滅聲，當局粗暴打壓言論自由和任何異見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做法。」

Yazan Badran 也認同立場要公開透明，他以香港的情況表示：

「只要記者立場是透明的，我更願意閱讀一篇由一位記者清楚、透明地告訴我，他支持香港獨立運動，但更多層次、更深入的文章，而非一篇由外國空降當地記者寫的無味文章，因為外國記者去了那裡，也只會看到表面。與此同時，我亦可以閱讀另一位記者的文章，他可以告訴我他反對香港獨立，但為我提供更豐富和更詳細的細節。」

至於 Kennedy Wong 的書評《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回顧了香港的媒體歷史，講起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亦不是天長地久，「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還指在極權下，「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本地傳媒因國安法而噤聲，Kennedy 則相信，在海外的媒體有一定空間運作：

「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

既然今期的題目有講到「抗衡國家機器」，《如水》重點文章是精心製作了調查報道《統戰部借香港秘密持〈歐洲時報〉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我們過去數月透過於英、法兩地實地採訪，以及查閱香港、法國、英國及德國的商業登記資料，調查號稱全歐洲最大華文媒體《歐洲時報》的架構與運作，並發現它實際上是由中共統戰部，透過一家香港註冊、名為「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的公司操控，公司成立年分甚至能追溯到 1980 年。

對此，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葉飛立 (Filip Jirouš) 接受《如水》訪問時表示：

「香港這麼多年來，尤其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之後，都一直被國家企業和機

構用作進軍海外的渠道... 這種做法令到西方政府更難看清這些公司的真面目，因為香港在商業與投資領域，一直被視為合法而且管治優良的地方。」

他又提到，中共操控海外傳媒影響歐洲輿論的手法已符合歐盟「混合戰爭 (hybrid warfare)」的定義：

「既然歐盟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競爭對手，而且中國試圖干預環球民主國家政治的意圖愈來愈明顯，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審查相關機構，特別是接受外國資助的一群。」

筆者作為有分參與這個調查報道的一員，我們從蒐集資料、查冊、整理資料、實地調查及聯絡各方做訪問等，確實花了很長的時間、人力及資源（真是砸重金做調查）；但在花心思做這個調查報道的同時，我們還是要處理其他稿件，有一段時間忙得天昏地暗（笑）。

趁著撰寫《編者話》，筆者懇請讀者們繼續購買《如水》雜誌、大力 CLS 支持我們的工作，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做深度報道；倘若這個調查報道的成果反應熱烈，編輯部會希望未來作進一步調查，但前提是需要得到大家實質支持。

借讀者莫離投稿《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的一段話作結：

想起蔡元培先生一句話，「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筆者斗膽改幾筆，「要有良好的媒體，必先有良好的社會，要有良好的社會，就要先有良好的個人。」媒體固然匯聚、輸出文化，可羊毛出自羊身上... 在演算法當道的時代，媒體的內容水平也是我們想看的內容水平，媒體不再只是報紙、編輯的責任，自我、群體成長不可或缺。 ■

【調查報道】

統戰部借香港 秘密持《歐洲時報》 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
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

文／卡卡、莫莫、M.Y.

前言

近年國際關注中國政府以各種方式秘密滲透全球各行各業。其中，對輿論民意影響重大的傳媒業界，是中共關注焦點。然而中共如何操控媒體？從何時起操控？操控這些媒體的目的是甚麼？要引起怎樣的效果？其建立的政治與商業網絡是甚麼模樣？關鍵人物姓甚名誰？香港，又在這網絡中扮演甚麼角色？這些問題至今鮮為外界所知。社會對中共操控媒體的手段也缺乏認知，容易令人誤信中國政府發布的偏頗或虛假消息；而當一些大型機構比如國家、政府，亦對哪些媒體被中共操控似乎毫不知情，其結果，可能是不慎與這些媒體合作，以金錢支持這些媒體運作之餘，更可能不自覺替這些媒體背書。

為使社會對中共秘密操控傳媒有更深刻的認識，《如水》過去數月，透過於英、法兩地實地採訪，以及查閱香港、法國、英國及德國的商業登記資料，調查號稱全歐洲最大華文媒體《歐洲時報》的架構與運作。根據這份華文日報的資料，它於全歐洲 40 個國家發行數萬份，自 1983 年創刊至今，更發展成一個業務涉及網絡、報章、雜誌、書籍出版、電視製作、電影發行，以至網購和市場策劃的集團，總資產值超過半億港元。

這家龐大的傳媒集團雖然號稱獨立，但《如水》調查發現，它實際上是由中共統戰部，透過一家香港註冊、名為「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的公司操控。後者早於 1980 年已經由三人成立，而根據調查顯示，這三人均疑與中共僑務工作有一定關係。現時「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的股東與董事名單，亦可找到不少疑與中共有關的名字，包括香港的華豐國貨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邱建新，還有據指為中共黨員的「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總編輯王苗，以及「中新社」香港分社社長王佳斌等。

利用聲稱獨立的《歐洲時報》，中共積極進行大外宣，發布支持中國政府、挑撥西方國家矛盾等內容；又用英、法、德語製作內容，試圖打入外語輿論空間。該報更與多家外國大型傳媒，包括法國《巴黎競賽周刊 (Paris Match)》；英國的《每日電訊報 (The Telegraph)》、《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和《泰晤士報 (The Times)》合作，共同出版或製作內容。同時，《歐洲時報》的外宣手段並不停留於傳媒產業，更創辦「歐洲時報文化中心」，收取「孔子學院」的資助向中小學生教中文，並與外國官方或非官方機構舉辦「文化活動」。

傳媒對一個社會的意識型態影響有多大，難以衡量，然而作為例子，法國史上第一個華

裔國民議會議員陳文雄，其父親陳順源就是《歐洲時報》的「顧問」一員。陳文雄在政壇出身的巴黎第 13 區，是華人聚居地，也是《歐洲時報》的主要基地之一。而他當選國民議會議員後做了甚麼？包括多次邀請中國官員於國民議會演說、與習近平握手，和投票反對法國國會譴責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那場投票，他是唯一一個投下反對票的議員。

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葉飛立 (Filip Jirouš) 接受《如水》訪問時，如是說：「香港這麼多年來，尤其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之後，都一直被國家企業和機構用作進軍海外的渠道 . . . 這種做法令到西方政府更難看清這些公司的真面目，因為香港在商業與投資領域，一直被視為合法而且管治優良的地方。」他表明，中共幕後操控媒體的情況令人擔憂，並提到歐洲諸國對此議題沒有足夠關注，儘管從歐盟的角度而言，中共操控海外傳媒影響歐洲輿論的手法已符合「混合戰爭 (hybrid warfare)」的定義。「既然歐盟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競爭對手，而且中國試圖干預環球民主國家政治的意圖愈來愈明顯，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審查相關機構，特別是接受外國資助的一群。」他說。

編按：《如水》就此調查報道內容曾向《歐洲時報》、華豐國貨、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南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共統戰部查詢，惟均未獲回覆。本文提及的姓名及其資料，或有同名同姓的可能，如有誤會，煩請來信 editorial@flowhongkong.net，《如水》定當查證後再作更正。



巴黎第 13 區 | 黑黑 攝



歐洲時報文化中心外觀 | M.Y. 攝

巴黎南部的第 13 區是華人聚居的地區之一。從該區再往南駕車十分鐘，你會來到巴黎衛星城市 Gentilly 的 Rue Benôit Malon。那是一條寧靜而平平無奇的街道，人車俱不多，也沒有起眼的店舖，但如果抬頭看，你會看見一座大廈一樓掛出一個招牌，寫著「歐洲時報文化中心 Nouvelle D'Europe」。這家文化中心並不是讓人自出自入的公共空間，倘若無緣無故叩門，恐怕要吃閉門羹，但在 2023 年 4 月 13 日的下午，《如水》記者來到門前。

「您好，是報了名參加『中法人才交流會』的。」記者對職員說。

「您好，請進。」職員答。

接待處除了「歐洲時報文化中心」的招牌外，還掛有三個金屬牌，分別寫著「孔子課堂」、國家漢辦「漢語考試考點」和中國海外交流協會「華文教育示範單位」。離「人才交流會」開始還有一段時間，記者被職員帶入一個房間等候，裡面放有各期《中國新聞周刊》，以及



歐洲時報文化中心接待處另掛有三個金屬牌，當中包括「孔子課堂」 | M.Y. 攝

《品味潮洲》、《中华古代名将》等書籍。而等候室外，是一個可說是美侖美奐的大廳。大廳通往兩個中文教室，也有一個玻璃櫃放有《歐洲時報》創刊 40 年以來的多件紀念品，包括早期的打字機，和《歐洲時報》英國版、西班牙版、德國版、中東歐版等的創刊號。記者看了一會，回到等候室，少頃，「人才交流會」開始，在職員帶領下，記者連同約十數名參加者來到二樓，二樓與一樓同樣有多個房間，其中一間裡面有一張會議桌，《歐洲時報》常務副社長鍾誠已經就座，準備好為活動揭幕，而會議桌前一個巨型屏幕，則播放著《歐洲時報》40 週年為的紀錄短片，旁白說：「四十年，歲月如梭。四十載，年屆不惑。時針回撥，潮起潮落，我們用『歐時』一支筆，記錄耕耘與收穫。」

然後畫面顯示一行金光刺眼的大字：「四十年的跨越」。

《歐洲時報》是一份華文日報，顧名思義，於歐洲發行，並分為原版（法國版）、英國版、德國版、意大利版、中東歐版與西班牙版。根據該報公開資料，所有版本加起來，於全歐洲共 40 個國家發行數萬份。一份《歐洲時報》法國版平日 12 版、周末 20 版。本刊翻查過往多期報章，內容主要以中國相關的國際新聞為主（例如《促进中欧、中法经贸合作 与中国合作推动俄乌止战和谈：马克龙、冯德莱恩 4 月 5 日访华》、《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是美国污名化中国奥媒：只有中国能成为俄乌冲突调停者》），此外就是一些華僑活動報道（《第二届欧洲英语区中文教学技能总决赛举行》），以及有關兩岸四地（中、港、澳、臺）消息，如《港医管局伦敦招聘兩日吸引逾 500 人》等。

這類型報章，居於海外一段時間的港人相信都會在「華人超市」、「唐餐館」、「唐人街」之類的地方見過——無人問津，被冷落一旁。所以，如果《歐洲時報》只是一份被冷落的實體華文報紙，其影響力確實有限。然而不是。在四十年間，這份報章已經從初期單純一份實體報紙，發展成號稱「歐洲最大的中文文化傳媒集團」的「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Guang Hua Cultures et Media，下稱『歐時集團』）」，業務涉及報章、雜誌、書籍出版、電視製作，以至電影發行。到底其影響力有多大？問題的答案始終因人、族群、年齡層而異，難一概而論。不過，以網絡為例，以下數字或可供參考：根據中國官媒「中國新聞社（中新社）」與中國傳媒大學發布的「世界華文傳媒新媒體影響力」排名，《歐洲時報》在 2022 年下半年全球排名第 18 位、全歐洲第 2（僅次於《星島日報》（歐洲版））；上半年更是全球第 12、全歐洲第 1。整個集團管有最少 6 個 Facebook 帳號、3 個 Instagram、7 個 Twitter、5 個 YouTube、5 個微博、11 個微信公眾號、5 個抖音和 2 個 TikTok（見【圖 1】），其中



《歐洲時報》在其文化中心展示各刊物的創刊版 | 莫莫 攝

《歐洲時報》的微博「粉絲」數達 83.7 萬、抖音帳號「歐時視頻」粉絲數 48.1 萬；以其微信公眾號《道德經》（隸屬《歐洲時報》德國版）為例，過去一周最多人閱讀的帖文為《微博一话题竟然火到德国，德媒都看呆了！「想不到，中国年轻人是这样」》，三天內錄得 15,000 次瀏覽量。

雖然「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是在法國註冊，但如此龐大的資訊輸出量，固然不只是來自法國。根據該公司商業登記資料，集團旗下共有 8 家子公司。報社本身於德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和奧地利設有分社，並於斯洛伐克、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匈牙利、希臘、冰島、挪威和比利時等最少 17 國設有聯絡處或辦事處，負責該國的編務工作（見【圖 2】）。此外，歐時集團在北京還有一個代表處，而集團旗下微信公眾號的 IP 屬地，時而在歐洲，時而則標註在中國，意味有部分內容是從中國發布。

而若傳播業務之廣，還沒能反映歐時集團的規模，該集團除了辦報，還涉獵旅行社、網購、市場策劃和經理人業務。

【圖 1】《歐洲時報》出版物及平台概覽

■ 報紙 ■ 網站 ■ 雜誌

中文	外文	出版社
· 《歐洲時報》	· <i>LE9</i> 法語月刊	· Editions Horizon Oriental
· 歐時網	· <i>China Rundschau</i> 德語月刊	· 東方書局出版社
· 《歐洲時報·英國版》	· CHINA MINUTES 歐洲時報英語網站	
· 《歐洲時報·意大利版》	· chine-info.com 歐洲時報法語網站	
· 《歐洲時報·中東歐版》	· de.china-info24 歐洲時報德語網站	
· 《歐洲時報·西班牙版》	· 歐時視頻 (歐洲時報·德國版旗下業務)	
· 《歐洲時報·德國版》		
· 歐時代		
· 《食尚亞洲》生活雜誌 (已停刊)		

《歐洲時報》旗下社交平台

Facebook	YouTube	微信公眾號
· China Info 24 (舊版歐洲時報英語網站的 Facebook，惟 2020 年已停用)	· Nouvelles d'Europe	· 歐時大參 (歐洲時報主帳號)
· Chine-info.com (以法語轉載 chine-info.com 內容)	· China Minutes	· 想法 (歐洲時報新媒體信息分享平台)
· China Minutes (新版歐洲時報英語網站的 Facebook)	· 歐洲時報德國版	· 英倫圈 (歐洲時報英國版)
· China Rundschau (歐洲時報德語月刊)	· 《歐洲時報》西班牙版	· 道德經 (歐洲時報德國版)
· Le9 (歐洲時報法語月刊)	· 歐時代	· 意槍 (歐洲時報意大利版)
· 歐洲時報		· 西聞 (歐洲時報西班牙版)
Instagram	微博	
· chinaminutes (KOL 平台推廣中華文化)	· 歐時代	· 維城 (歐洲時報中、東歐：奧地利、瑞士)
· chineinfophotos (發布中國人文、風景照片宣傳中國)	· 英倫圈 (歐洲時報英國版)	· 向東向西 (歐洲時報中東歐版／僑界新聞)
· le9magazine (Le9 法語月刊)	· 歐洲時報德國版	· 微歐時代 (歐時代：專營網絡行銷)
	· 歐時代	· 歐時文旅
	· 想法哥 - 法國生活家 (歐時代旗下帳號)	· 食尚亞洲 (介紹飲食平台)
Twitter	抖音	其他網站
· @oushi1983 : 歐洲時報	· 歐時視頻	· 歐洲時報文化中心 (https://www.culture-oushi.com/)
· @ChinaMinutes : China Minutes	· 想法	· 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德國分社 (http://www.oushi.de/cn/info)
· @SpainZone_ : 歐洲時報西班牙版	· 西聞西班牙	· Ligo Groupe 立購 (https://ligostore.com/)
· @oushitzv : 歐時 tv	· 維城	· 歐時文旅 (http://www.ecvoyages.com/cn/)
· @le9magazine : Le 9 Magazine (歐洲時報法語月刊)	· 英倫圈哥	· 歐洲時報旅行社 (http://www.oushivoyages.com/)
· @europe_nouvelle : China Rundschau (歐洲時報德語月刊)		· China Minutes 商業行銷顧問 (http://chinaminutes.co.uk/)
· @Chineinfocom : Chine-Info		
TikTok		
	· oushivideo : 歐洲時報	
	· chinaminutes : China Minutes	

該集團的「歐時文旅（又稱：歐洲時報旅行社）」，工作包括代辦簽證、承包各類中資機構的公務考察，以及舉辦語言培訓和夏令營活動等，在第 13 區鬧市設有辦事處。「歐時」集團另一子公司「Ligo Groupe（立購）」則於 ligostore.com 售賣各類國貨，包括華為、小米，以及被揭協助中共監控特定社群的海康威視（Hikvision）的產品，以至貴州茅台和口罩、探熱針。歐時集團的網紅育成分支「華時星盟」，聲稱「專注於孵化跨平臺、跨領域、跨國家、跨文化的優質紅人」，而英國分支 China Minutes (chinaminutes.co.uk) 則稱會為企業客戶提供市場方面的「一站式服務」¹。

順帶一提，早在 1985 年《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之初，《歐洲時報》已經是其歐洲印刷、發行總代理。以上所述就是「歐時集團」全貌。根據 2021 年底公司申報資料，歐洲時報文化傳媒集團的總資產值為約 700 萬歐元（約 5,882 萬港元），該年利潤為約 127.6 萬歐元（約 1,072 萬港元）。

¹ 編註：歐時集團持有兩個「China Minutes」的網站，其一為上述者，另一個是以英語發布中國新聞的《歐洲時報》英語網站 (www.chinaminute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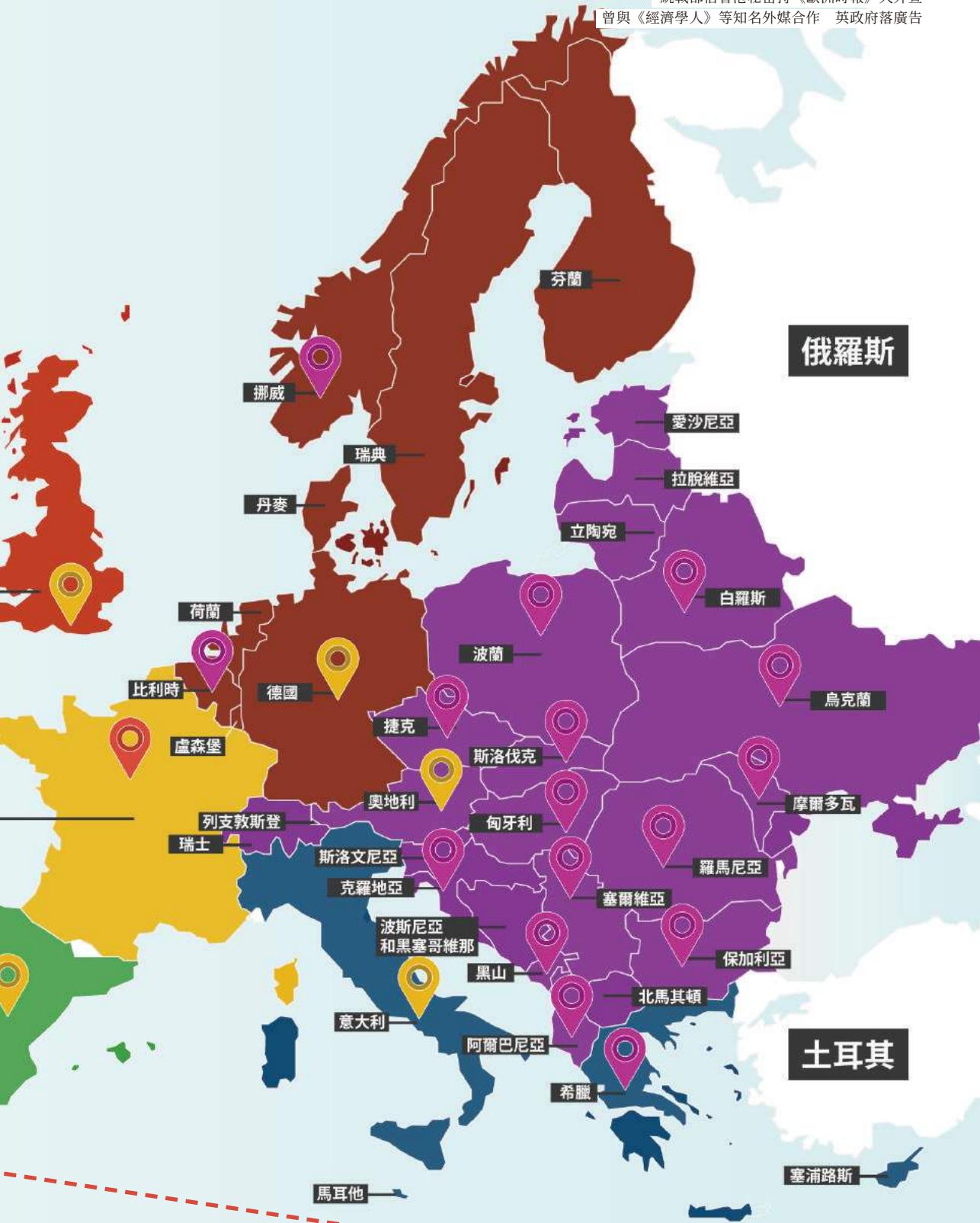
【圖 2】 《歐洲時報》分布版圖

- 《歐洲時報》總部
- 《歐洲時報》分社
- 《歐洲時報》歐洲聯絡處／辦事處
- 《歐洲時報》中國代表處

《歐洲時報》發行範圍

- 德國版
- 英國版
- 法國版
- 西班牙版
- 意大利
- 中東歐版





自稱獨立傳媒 實中共操控

《歐洲時報》自稱為獨立傳媒機構。該報早於 1983 年的創刊辭中已明言其立場和態度「不偏不倚」。2011 年，該報英國版創刊，創刊辭謂「身為『小眾』媒體的我們，堅持秉承獨立、客觀、理性的專業精神，做一個關懷和推進社會和諧進步的負責任的媒體」；2013 年，德國版創刊辭：「我們將 . . . 對中歐關係的走向做出獨立的思考，採集您所需要的各類新聞，揭示您關注的事實真相 . . . 」。至於《歐洲時報》前社長楊詠桔，2017 年在中國接受傳媒訪問時曾這樣引述華人華僑的話：「《歐洲時報》登的消息我們才相信，別家說的我們不信。」

結果，恐怕並不令人意外的是，《歐洲時報》不僅與中共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是由中共直接操控。

首先，其高層人員大多都與中共關係密不可分。現任社長張曉貝之父張香山（1914—2009），生前是中共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也曾任人大代表及政協常委。而張曉貝本人於 1992 年加入《歐洲時報》前，也曾於中宣部旗下官媒《中國日報》英文版工作 10 年。《歐洲時報》常務副社長鍾誠，則是官媒《中國新聞周刊》的前總編輯及「中新社」巴黎分社社長。就算是中層以至低層員工，根據《如水》調查，亦有不少人士曾於官媒任職或發表文章。

當然，人物背景與中共相關，並不代表集團本身由中共操控，然而《如水》發現，「歐時集團」在架構上亦可見到中共明顯的角色。

如果從《歐洲時報》的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等的註冊主辦單位看，我們會發現它們超過九成是由「北京中新唐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中新唐風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掌管。只要稍為翻查中國企業登記資訊，即不難發現這兩家公司中，中新唐印是由中新唐風 100% 擁有，至於中新唐風的上級機關則是「中新社」，中國國營通訊社。「中新社」原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僑辦）持有，2018 年，國僑辦被併入中央統戰部，由後者統一管理僑務工作。

而看集團架構的話，除了能看到中共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另一點關鍵——香港在這個架構的角色。

要說明這個角色，需要從集團的源頭開始講起：1983 年 1 月 1 日，《歐洲時報》創辦。起初這份報紙僅是由一批來自東南亞的華文使用者創辦。可是翌年，由於股東不和，報章於 7 月易手，由「光華報業公司（Guang Hua，下稱『光華』）」承接。便是從這裡開始可以看到中共的影子，因為光華的大股東兼社長楊詠桔，是前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的女兒，此外，楊永直同時是中



《歐洲時報》的微信公眾號主帳號「歐時大參」，其 IP 屬地今年 6 月一度從法國轉為中國北京 | M.Y. 攝

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即黨媒）《解放日報》的前總編輯。

1992 年，光華股權大幅變動，正是中共操控的最關鍵角色——一家香港註冊、名為「Ya Zhou Wen Hua Enterprises, Limited（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亞洲文化』）」的公司持有光華 9 成股權。根據香港商業登記資料，「亞洲文化」早在 1980 年已經成立，其最初的三名董事分別為張毓芬、張帆及胡勞江（在後來的公司文件，胡勞江改稱為吳魯江）。調查發現，國僑辦曾有一名幹部亦名為張毓芬，而一名「中新社」前總編輯名為張帆。

《如水》暫未能發現有無中國僑務相關的人員名為胡勞江／吳魯江。不過，從胡在商業登記中申報的地址，亦或可推斷他與中共僑務部的工作有關。資料顯示，其申報地址為 1 Wang Da Ren Lane, Beijing, China。現時北京並沒有一條街道名的英文名稱為 Wang Da Ren Lane，不過根據網上資料，昔日的 Wang Da Ren Lane，中文名為「王大人胡同」，後易名成今日的「北新橋三條」；該處從過去至今都聚集了許多海外歸國華僑，還有一棟「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王大人胡同二號是「中國新聞社」大樓，而一號，則便是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大院，又稱為「僑委大院」，現同時為「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的北京辦事處。據網上一名自稱曾於王大人胡同居住的華僑指，當時「附近僑務系統機關的職員，每天中午都會到僑委大院的食堂去吃飯」。

除了始創人之外，翻查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自 1980 年代的股東與董事變動，發現許多人物均可能與中共、尤其是僑務工作部門有關。當然，今日亦然。

根據最新的商業登記資料，現時亞洲文化的最大股東為邱建新及王苗，秘書為許曉麗，



《歐洲時報》前社長楊詠枯 | 網上圖片



已故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 1994 年曾到訪歐洲時報文化中心，並留字表揚 | 黑黑 攝

其他股東包括郭錦玲、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及南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兩家公司皆由國僑辦持有）。現任董事則有張曉貝、郭錦玲、邱建新、王佳斌、王夢黎、殷路長和謝添。上述名字，幾乎每一個都可以在中國僑務工作相關機構和部門找到。

邱建新在香港的親中派算是名人。他是香港選舉委員會成員（自動當選）。他不單是中國「華僑大學」——中共統戰部直屬事業單位的校董；也是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董事，同時是在香港的華豐國貨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華豐國貨，根據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1993 年出版的《中國大陸研究》，是中共在香港的貿易戰線「主要機構」之一。

王苗是中共黨員，1986 年來港於「香港中國



中國問題學者葉飛立 | 受訪者提供

旅遊出版社」旗下雜誌《中國旅遊》工作，現為該出版社總編輯及副社長。郭錦玲曾任中國國僑辦宣傳司司長、新聞發言人等職。王佳斌是「中新社」香港分社社長兼另一在港官媒「香港中國通訊社（中通社）」社長。至於王夢黎，除了是華豐國貨的總經理外，也曾於國僑辦工作，任華文教育處副處長、文化司副司長等職。殷路長任職中央統戰部辦公廳。謝添則是南海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高層，亦曾為國僑辦宣傳司宣傳處處長（《如水》整理人物及關係，詳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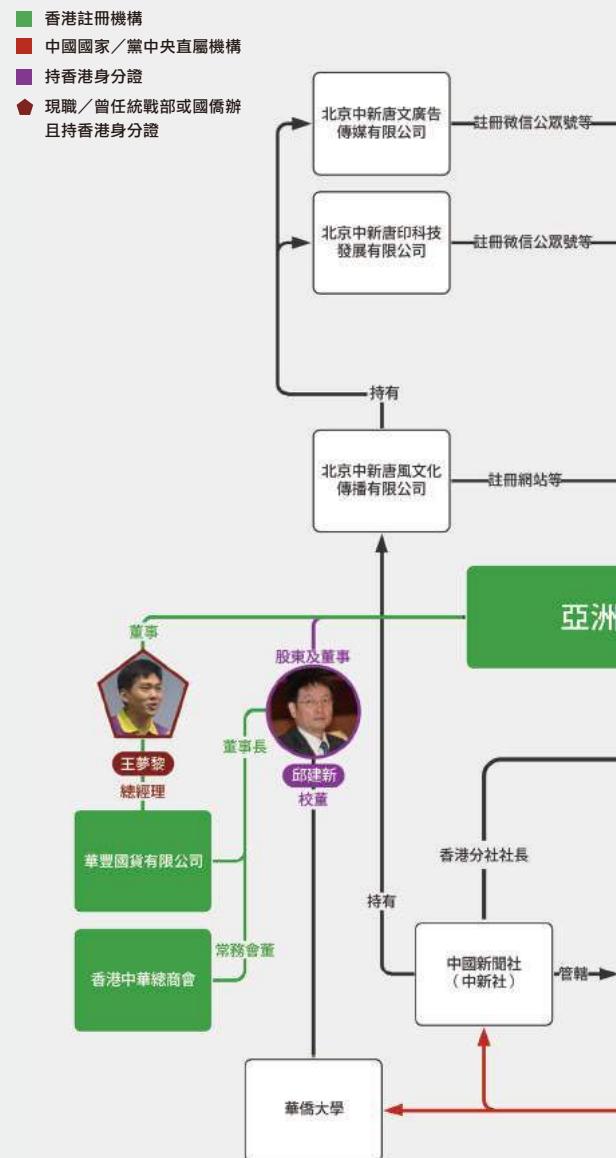
上述是否意味中共早於 1980 年已經派僑務工作人員來港，以其個人名義開公司，為輾轉持有《歐洲時報》一類海外傳媒機構鋪路？我們無法證實。不過，中國問題學者葉飛立 (Filip Jirouš) 接受《如水》訪問時，就明言對亞洲文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80 年感到毫不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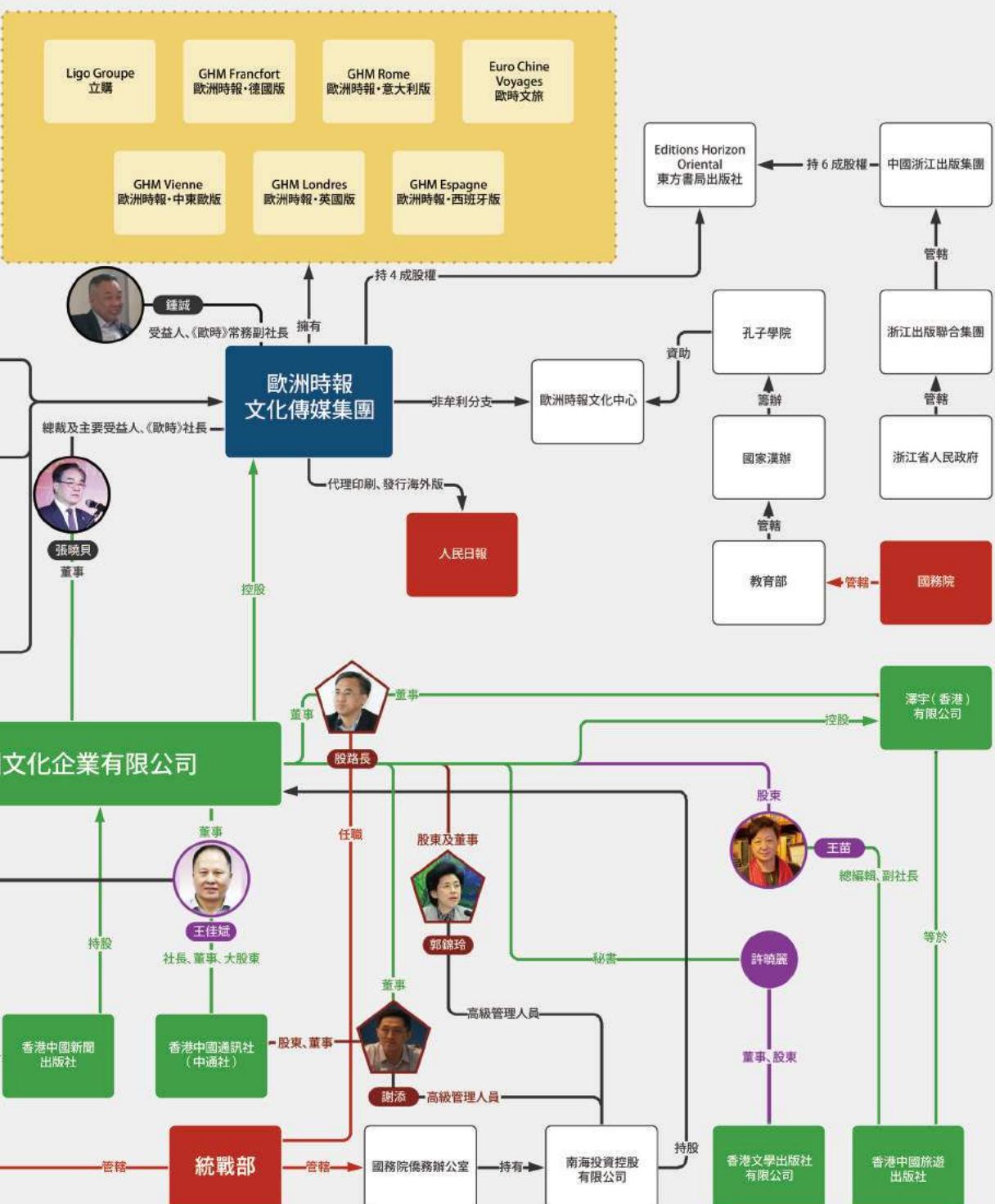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建國時，曾獲美加等地中國流散社群的大力支持。因此，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49 年成立後，它就發現自己處於外交孤立狀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取得海外資訊，就得主要依靠『僑報』。當然，我不是說每個海外華人都是間諜，但黨國機構（party-state）確實依賴僑報去取得資訊。」

除了透過海外華文媒體取得國外資訊，葉飛立指出，中共染指海外華文傳媒機構的另一目的，就是監控華人華僑：「因為當時有許多（中國）人移民歐洲，黨國機構對這些人接觸自由民主感到不安，擔心這些（歐洲）國家可能會向他們灌輸一些思想，令他們對黨不忠誠。而這對於中共來說，當然是不可接受。」

葉飛立又指，由於上述做法涉及政治目的及情報工作，牽涉的機構須避免與中共有直接

【圖 3】 《歐洲時報》相關機構及人物關係圖





關係。「如果這海外傳媒網絡是由一家北京公司持有，這就會引起許多關注。」或許正因如此，早在 43 年前，中共選擇以香港作為操控海外傳媒機構的基地。即使時至今日，亞洲文化的大多股東與董事，包括郭錦玲、王夢黎、王佳斌、邱建新、殷路長、王苗、謝添，均持有香港身分證。

葉飛立說：「香港這麼多年來，尤其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之後，都一直被國家企業和機構用作進軍海外的渠道。基本上，透過香港公司控制海外資產和人員，是令這些公司看起來更合理，且是民營、非牽涉到國家的手段。」

「這種做法令到西方政府更難看清這些公司的真面目，因為香港在商業與投資領域，一直被視為合法而且管治優良的地方...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企業和人員的背景上，則較容易引起更多關注。」

葉飛立表明，中共這種幕後操控媒體的手法令人擔憂。其一原因，雖然歐洲諸國政府有審查機制，確認在本國運作的企業是否與外國政府相關，但這些機制通常只調查直接持有人，而「它們（中共）創造了一個複雜的網絡，令歐洲政府難以發現這些媒體其實是來自黨國機構，而不只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流散媒體，也不是為流散社群有機地服務。」

多管道推大外宣

如果不是為流散社群服務，那麼《歐洲時報》到底是為誰服務？其實答案顯而易見。

從上述架構關係，不難看出具體掌管《歐洲時報》業務的中共機構是國僑辦。國僑辦過去多年一直是國務院的機構，但在 2018 年，它被併入統戰部，而統戰部的僑務工作主要職責包括「統一領導海外統戰工作」和

「統籌協調有關部門和社會團體涉僑工作」等。中國問題專家周安瀾（Alex Joske）分析，這種體制上的變化，反映中共加大力度直接控制海外華人。正如習近平 2015 年曾在一個統戰部工作會議上說：「留學人員是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 要加強和改善對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經常性聯系渠道，加強線上互動、線下溝通，讓他們在淨化網絡空間、弘揚主旋律等方面展現正能量。」

這些任務，自然落在聲稱「獨立」的《歐洲時報》身上。

《歐洲時報》在不論華文及外語的內容上，都不遺餘力宣揚中國政治觀點，其中在中文版面，它們為人大會議開專版是例牌菜，訪問洋人說好他們的中國故事也是家常便飯；在遇上政治敏感議題，《歐洲時報》也積極發聲。比如在 2021 年，該報就刊登了題為《法國政治學者：「香港回歸現實」》的文章。該文章由法國學者 Bruno Guigue 撰寫，劈頭第一句便是「以『西方民主』為幌子的分裂主義傾向不是香港的未來」。

原文首段如下：

以“西方民主”为幌子的分裂主义倾向不是香港的未来。这种分裂倾向将被消灭、根除，因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情况是不可逆转的。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制度运作良好时，还非得去采用外国的政治制度？西方各国凭什么要求中国遵守它们的命令？为期 100 年的外国殖民统治都未能将这个几千年来都属于中国、完全由中国管辖的领土从其祖国剥离，因此，来自美国国会的一纸文件（依据国际法，这属于非法文件）就更达不到这个目的了。

關注香港議題外，《歐洲時報》當然也關心

德国，其实是美国的第51个州？？？

欧洲时报德国版 道德经

2023-03-13 17:22 发表于德国

欢迎点击上方“道德经”关注我们

对于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人们已习惯用“盟友”这个词来形容。不过，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酵，世界“头号大国”和欧洲“头号大国”之间似乎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近日，有德国记者即在“焦点在线”上发文，质疑了当前德美关系的发展。这篇文章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难以置信，原来德国不是美国的第51个州吗？”

微信公众账号截图

臺海問題，例如歐洲時報德國版微信公眾號《道德經》，就在2023年3月發布《26年來首次有德國部長窜訪台灣，竟被自家外交部打臉？》；又不忘向歐洲諸國社群宣揚美國是多麼「惡毒無恥」，例如《德国新闻 | 美国评价德国政策：丢脸，白痴，懦弱，别想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德国，其实是美国的第51个州？？？》、《美国人有多不厚道，德国总算“开始懂了”！》。

這些偽裝獨立的中文報道，有時又會被其他官媒「引用」作境內宣傳。例如「中新社」就曾在Facebook發文指，「法國《歐洲時報》近日表示，中美貿易問題複雜且影響廣泛，處理不好將會導致『雙輸』，甚至拖累世界經濟。合作是兩國最好的選擇，磋商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

《歐洲時報》的中文文章大概甚少有機會接觸到香港讀者，因此對香港讀者而言可能無足輕重，然而葉飛立指，對某些國家的華僑

社群來說，中文仍是他們接觸資訊的唯一途徑。他們可能只是生意人，本來無意閱讀政治訊息，但當《歐洲時報》這種媒體將政治觀點與評論摻雜到商業資訊裡面，這些資訊或會對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再者，《歐洲時報》的內容並不全然是中文。該集團亦有多個使用英、法和德語的多個媒介，包括法語月刊 *Le9*、法語網站 *chine-info.com*、英語網站 *China Minutes*、德語月刊 *China Rundschau* 和德語網站 *de.china-info24.com*。這些媒介會聘請外國人負責編務工作，發布的內容並非將華文報道直接翻譯，而是為外語讀者度身訂造。而結果，這些內容亦在社交媒體上獲外語社群討論、轉載。比如今年5月初，就有一篇題為 *Les Chinois, les plus heureux du monde d'après un sondage Ipsos*（根據 *Ipsos* 調查，中國人在全球最快樂）的文章發布於 *chine-info.com*，得到法語網民的關注。

這些外語媒體的影響力有多大，難以定論。就算看數字，也未必能夠反映現實（*China Minutes* 的 Facebook 專頁多達 98 萬人讚好，但許多帖文只有數個讚好，甚至只得 0 個。《如水》曾去信《歐洲時報》查詢專頁



《歐洲時報》法語月刊 *Le9* 今年4月出版的刊物 | 黑黑 摄

是否有「買 like」，惟未獲回覆。）。然而，透過偽裝成獨立機構，《歐洲時報》也可以與外國知名大型媒體合作，以提高其影響力。

這裡說的「大媒」，是真正地位舉足輕重的「大媒」。例如法國的《巴黎競賽周刊》(Paris Match)》。這本文化時政雜誌在法國全國的報攤和書店都買得到，是法國流通量最高的雜誌之一，2020 年數字接近 57 萬。而在 2000 年，《巴黎競賽周刊》與《歐洲時報》合作，出版介紹中國的法語刊物《中國專刊》。有報道指，當時合作是為了「讓法國讀者欣然接受的中國走進了主流社會讀者的視野」，合作方式是「由中方負責一些選題的策劃和採訪聯絡，法方負責出版發行」，《歐洲時報》並曾安排法國記者前往中國雲南等地採訪。既然《歐洲時報》實際上是由中共操控，這種合作方式自然讓人憂慮會否影響《巴黎競賽周刊》的編採自主。確實，《歐洲時報》前社長楊詠桔曾在一個訪問中坦言，雙方確實曾因編採角度有過爭議：

楊詠桔：那幾年，我們和《巴黎競賽周刊》合作時，幾乎每一期都會講一點關於毛澤東主席的小故事。但是每次法國記者都會撒點「胡椒面」²進去，為了這些東西我和法方「鬥爭」了很久。

有一次我真火了，我說你要是真想研究毛澤東，你完全可以進行學術討論，但你在每篇文章裡都灌「胡椒面」，你明顯對他有成見。那個法國編輯也生氣了。他說，你是甚麼人？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法國人？你們家在“文革”受了那麼大的摧殘，你為甚麼還要替毛澤東講話？

我立刻回他，你想知道我為甚麼替毛澤東講話？因為是毛澤東讓我站起來跟你講話。他一下子就懵在那個地方了。第二天，他給我寫了封信，說「尊敬的夫人，請你原諒我昨

天的失禮。」

——《专访解放日报前总编辑杨永直之女：站在东西方之间，我如何在巴黎办好《欧洲时报》？》



曾與《歐洲時報》合作的《巴黎競賽周刊》雜誌 | 黑黑 攝

我們無法證實《巴黎競賽周刊》的人員是否確實曾向楊詠桔道歉（《如水》曾就此向《巴黎競賽周刊》查詢，未獲回覆），惟無論有無都好，也可以肯定《歐洲時報》曾對《巴黎競賽周刊》的編採方針有一定影響。

而在英國，《歐洲時報》的合作夥伴名單就更加出名。比如說，訂戶數字高達七十多萬的（2022 年數字）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該報從 2014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曾在《歐洲時報》英國版每周推出 2 頁中文版。又例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他們曾與《歐洲時報》合作，於旗下的生活雜誌《1843》，每月選出原稿翻譯中文，並在《歐洲時報》英國版介紹予中文讀者。此外還有《泰晤士報》(The Times)》，他們曾於 2013 年與《歐洲時報》合作，讓《歐洲時報》英國版推出四個整版的《泰晤士報》中文版，是該報「首次和華文媒體合作推出中文版內容」。當時《泰晤士報》總編輯 John Witherow 曾在中文版創刊致讀者信中說：「《泰晤士報》非常興

²「撒胡椒面」為北方方言，比喻主力過於分散，做事沒重點而導致問題無法解決。

《1843》授權《歐洲時報》

从碧昂丝到大银幕（下）



《歐洲時報》英國版曾獲《經濟學人》旗下生活雜誌《1843》授權，將原稿翻譯成中文刊登
| 翻攝自《歐洲時報》電子報

奮可以與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分享我們的文章，有機會向中國——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政治強國展示我們的一流內容。」對於上述合作，《如水》均有向相關傳媒機構查詢，並獲現時已成為《泰晤士報》主席的 John Witherow 透過助理回覆：「在 Witherow 先生於 2013 年成為《泰晤士報》編輯的時候，本報已經與《歐洲時報》有合作，容許他們出版部分《泰晤士報》內容。然而，他並不認為這安排對《泰晤士報》有利，故在接手後不久取消合作關係。」

除文字以外，電影與電視製作也是《歐洲時報》宣揚中共意識型態的重要手段。在德國，歐時集團就曾發行多部電影，包括吳京的《戰狼 2》（2017）、較為港人熟悉的徐克作品《狄仁傑之四大天王》（2018）；該集團又在歐洲十多國獨家發行中國 70 週年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更稱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實現在全歐範圍內同步發行」。

同樣以「歌頌祖國」為主要任務的作品，還

有《築夢——獻給中德建交 50 年（*Leben Jenseits Der Heimat: Deutsche und Chinesen erzählen*）》紀錄片。此片是由央視（CCTV）總台、德國製作公司 spindoco 和《歐洲時報》德國分社聯手製作，於去年（2022 年）德國總理朔爾茨首次訪華時，於「漢堡 1（Hamburg1）」、「首都電視台（Hauptstadt. TV）」、「地區電視台（Regio TV）」和「薩克森電視台（Sachsen Fernsehen）」播出，內容講述 4 名在中國的德國人，和 4 名在德國的中國人，如何「克服己難，將激情傾注於自己的夢想上，用不同的方式築固中德交流的橋樑」（《歐時》語）。

類似合作關係，有時也會引起當地輿論關注。據《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 4 月底報道，柏林、漢堡等多間地方私營電視台每天傍晚都播放一集時長 15 分鐘的《中國信息（*China Info*）》「廣告」影片，主要宣揚中國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經濟科技，「說好中國故事」。而據《南德意志報》指，《中國信息》是「德國地區電視（Deutsches

Regionalfernsehen, DRF1 ）」與歐時集團旗下媒體 Guang Hua Media 聯合出品。DRF1 在

《南德意志報》的報道中聲稱，對歐時集團與政權關係密切「一無所知」，還指「歐時」保證，其總部及所有分支機構都是由私營部門組織和資助。

除了利用傳播業務介入西方輿論，《歐洲時報》另一種手段——教中文。1992 年，該集團於巴黎成立非牟利機構「歐洲時報文化中心 (ASSOCIATION DES AMIS DE NOUVELLES D'EUROPE，又稱為『歐洲時報之友協會』）」，並於往後十年內於維也納、倫敦、法蘭克福、羅馬和馬德里增設文化中心的分支。根據文件顯示，歐時文化中心至少在 2014 至 2020 年，每年獲得孔子學院 (Institut Confucius) 撥款一至兩萬歐元資助營運。歐時文化中心的主要業務之一便是教中文。2008 年，該中心的「歐洲時報中文學校」與中國「國家漢辦」³簽署協議，於翌年成立法國第一家「孔子課堂」。孔子課堂有別於坊間較為熟悉的孔子學院，後者以大學與社會人士為教授對象，而前者則針對中小學生，某程度上影響可謂更加深遠。

除教中文外，「歐時文化中心」也開辦其他課程，比如廣場舞、木蘭拳、書法、氣功、太極和功夫等。此外，該中心也辦展覽、講座和論壇等活動，比如 2014 年的「文化中國・名家論壇」。《歐洲時報》亦不時會以自己的名義，與海外華人或當地人、以至當地政府合辦文化節類型的活動，例如每年在德國和意大利舉辦中國電影節。以 2022 年在意大利的電影節為例，該活動由《歐洲時報》社長張曉貝任「電影節主席」，閉幕時還邀得舉辦活動的意大利拉科阿梅諾市 (Lacco Ameno) 市長 Giacomo Pascale 致辭。據《歐洲時報》報道，Pascale 稱電影節「對當地是一個重要機遇，也是極富意義的文化交流活動。他期待未來能與意大利中

國電影節繼續展開合作，也藉由電影節讓中國進一步了解美麗的斯基亞島」。

這類型的活動，對外國社會影響可以有多大？居法港人組織「居法港人撐香港 Le Comité pour la Liberté à Hong-Kong (CLAHK)」發言人 Ken 及成員 John 就如是說：

「這些（中文和興趣）班可以吸引多些鬼佬，又可以吸引這裡 60 萬的中國籍移民……他們的小孩，在這裡的學校被排斥或被嘲笑的時候，很容易會接受『感召』，學習甚麼中國文化……就在這些時候，他們開始被灌輸中國思想。可能他們最後都不是很會說中文，但終有一天他們會去中國『尋根』。而中國見到你有點錢，就會給你貴賓式享受，然後你就會上當……我想，這並不只是針對法國（華人）的手法，對全球其他國家比如加拿大也是這樣。」

「如果是純粹《歐洲時報》（報紙）或者其他出版物，那是浪費金錢。唯獨是這些文化活動，才可以看出影響力所在。」

葉飛立亦指，中共利用海外「獨立」媒體進行大外宣，對歐洲社會甚至各國政治，有一定影響力。他認為，中共的做法反映一套政治概念，即「任何血脈裡含有中國成分的人，包括已經移民到美國（或其他國家）、甚至從來沒有踏足東亞、不講普通話和廣東話的人，都是中國流散社群的一分子，並應該對中國大陸效忠」。葉飛立提到，當一個已經入籍外國的華人仍被中國視為一分子，甚至利用一些手段（例如透過脅逼他們在大陸的家人），要求他們效忠中共，便會產生許多複雜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他說，輕則是居於海外的華人為中國政府進行情報工作。從外國政府的立場看，他們無法分辨本國華人中，哪些人有與中共緊密聯

³ 根據中國政府、百度網站資料，「國家漢辦」為孔子學院總部，是中國教育部直屬事業單位，於 1987 年成立。

肯定华媒对发展中关系与友谊的贡献



《歐洲時報》高層獲前法國總理 Jean-Pierre Raffarin (右三) 頒發「法中友誼貢獻紀念獎章」
| 摘取自《歐洲時報》微信公眾號

繫，哪些人沒有，卻又不可以對所有華人採取提防措施，否則會造成種族歧視。葉飛立說，現時為止各國還未能找到應對方法。

而更嚴重的，則是這些受中共操控的外國籍人士，直接參與外國政治活動，甚至成為議員或政府官員。葉飛立說：「他們當中一些人是受到中共黨國機構的支持，與中共在意識型態上一致。因此，在一些關鍵的議題上，他們可能會為中共黨國機構著想，而非考慮他們本身代表的社群的利益。」

對此，葉飛立提出一個具體事例：陳文雄 (Buon Tan)。1967 年生於柬埔寨華人社區的他，在 1975 年隨父親陳源順（生前曾為《歐洲時報》顧問）來到法國。2008 年當選巴黎第 13 區區議會議員兼副區長（第 13 區是《歐洲時報》其中一個辦公室所在地），進而分別在 2014 年及 2017 年，分別獲選為巴黎市議會首位華裔議員及法國本土首位華裔國民議會議員。陳文雄亦因此在 2016 年獲中國國務院等政府部門評選為「中華之光」年度人物，被形容為「讓中西文化和諧共生的巴黎首位華人議員」。

在當選國民議會議員後，陳文雄及後再當選國民議會中法友好小組主席。此後，他與中共的微妙關係漸漸受到外界關注，包括被指是多個中共相關組織成員、多次邀請中國官員於國民議會演說，及多次陪同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他甚至曾與習近平握手，那是 2019 年的事。2022 年 1 月 20 日，法國國會就是否譴責中國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進行表決，陳文雄是唯一投反對票的議員⁴。

葉飛立說：「有一份報告就談到，有些人可能成為中國文宣機器的目標……因此有時候，他們會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服務。」

在香港，大概沒有人會反對《蘋果日報》對於香港民主意識型態發展具重大影響。然而若要你說具體而言到底怎樣影響？這卻又相當困難。畢竟你很難找到有哪位民主派人物會說「我因為讀了《蘋果日報》所以從政」。所有媒體對社會的影響，都是潛移默化的。《歐洲時報》也一樣。沒有人能說清它動搖了多少歐洲本土社群和華人社群的思維，又

⁴ 同年 6 月，陳競選連任失敗，此後似乎在政界絕跡，社交媒體再無任何更新。

在各大小選舉中為親共政客贏得多少選票，但它確實影響著歐洲社會，以至政局。

葉飛立說：「我會說中國文宣在『直接影響』外國人方面，並不是十分有效。更多情況是，它們試圖利用親共或中立的言論淹沒資訊空間。於是，就算你（異見者）在這個空間發出批判的聲音，這些聲音也只會成為眾多聲音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僅僅是因為這些正面或偏頗的資訊流通，已經可以改變人們閱讀新聞的方式。他們（民眾）會對批判的聲音抱有更多懷疑。」

尤其是，當這些「正面或偏頗的資訊」是來自看似獨立的媒體，公眾就更加容易受到影響。

西方國家對《歐洲時報》的底細到底有多少掌握？《如水》曾就此議題向部分 IPAC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成員，以及英國、法國等國家政府查詢，惟均未獲回覆。不過從英國政府多次於《歐洲時報》購買全版廣告、倫敦市長 Sadiq Khan 曾手執歐洲時報英文版特刊「推銷式」拍照、前法國總理尚一比耶·拉法蘭 (Jean-Pierre Raffarin) 曾頒發獎章予《歐洲時報》總編輯及副總編輯等高層表揚他們對「法中友誼的貢獻」、前社長楊詠桔更曾獲法國政府授予「法蘭西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來看，他們不是刻意為中共黨報背書，就是對《歐洲時報》的真身不知情。比較有可能的，大概是後者。

葉飛立說：「我不認為歐盟國家對（《歐洲時報》由中共操控）這件事有足夠關注...或許不應用『關注』一詞，而是歐盟國家的利益和優次考慮問題。他們傾向關心戰略性的領域，例如科技與關鍵基建。」

然而，如果一家背後受中共操控的傳媒集團，可以影響社會輿論、其他外國大型媒體的編採，甚至有機會將親中華裔政客送入議

會……傳媒的影響力，又怎會無法與科技與基建相比呢？

就算是從歐盟的角度而言，中共操控海外傳媒影響歐洲輿論的手法，也是「混合戰爭 (hybrid warfare)」的一環。葉飛立和另一名學者 Petra Ševčíková，2021 年於捷克有關中國研究項目 SINOPSIS 發表的報告指出，在歐盟外交部及軍事統籌機構歐洲對外事務部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的定義，「混合戰爭」包括「戰鬥人員及非戰鬥人員或明或暗採取的行動」，而「混合戰爭」當中的其中一種，是「資訊戰爭 (information warfare)」，包括可操控政治家與社會的「否定或扭曲事實」行為。兩名學者認為中共文宣符合這一定義，因為其工作「鎮壓異見，以捏造及扭曲的正面內容淹沒傳媒空間」。

葉飛立與 Petra Ševčíková 的報告主要探討「中新社」如何影響海外傳媒生態，然而，兩人對歐盟國家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議，亦同樣可以套用在《歐洲時報》身上，當中包括鼓勵歐洲公私營媒體停止與「中新社」及其網絡合作、歐盟各國政府應尋求方法支持真正獨立的華文流散媒體，以及要求受外國政治影響的機構進行登記，以加強透明度，監察這些機構會否影響民主制度運作。

葉飛立說：「既然歐盟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競爭對手，而且中國試圖干預環球民主國家政治的意圖愈趨明顯，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審查相關機構，特別是接受外國資助的一群。」

「其實就算非牟利機構接受西方國家的資助，也應該要申報。這並不是針對華人社群或中國資金的倡議，而是當我們有合理理由相信，許多來自某個黨國機構的資金，是具有影響國內政治的意圖，我們就應該要求他們申報與資金來源國的關係。」

美國早在 1938 年已經設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要求



《歐洲時報》總部 | 黑黑 攝

以「政治或准政治身分」代表外國利益的代理人，公布他們與外國政府的關係。澳洲、印度等國亦有類似法例。本月（2023年5月）初，傳媒亦報道指加拿大將於今年內提交審議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類似的法案亦曾在英國和歐盟有過討論，然而要走到立法一步，仍有不少政治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說，怎樣才算是「外國代理人」？如果所有收取外國資金運作的機構都要登記，會否亦會影響到一些因避免政治風險而希望匿名運作的人物和機構？又會否影響到人民結社的自由？

但無論如何，怎樣防範中共以幕後操控媒體的手段影響輿論，恐怕終將會是各國須共同面對的問題。事實上，《歐洲時報》並不是孤例。

根據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2020年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澳洲同樣有一家「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名為 Ya Zhou Wen

Hua Enterprises (Australia) Pty Ltd，並由香港的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持有9成股權。與《歐洲時報》同樣，澳洲版的「亞洲文化」操控著當地一些華文媒體。

另外，在相距香港不遠的臺灣，亦有一個名為「旅讀」的媒體（orchina.net），出版人為王苗，自稱是「全臺唯一專注兩岸四地生活文化報道的月刊」。根據《如水》調查，「旅讀」由「英屬維京群島澤宇文化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經營，而該公司是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中國旅遊》月刊的臺灣發行代理。無獨有偶，香港亦有一家澤宇（香港）有限公司，其商業運作名稱之一是「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其大股東，卻又是香港「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在這龐大而複雜的網絡背後，世界各地還有多少家華文媒體的真身未有現形？■

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 流散媒體如何 在緊絀資源下生存？

文／M.Y.

經營媒體是一件非常燒錢的事，就連主流傳媒都長年錄得虧損，更何況近年在海外紛紛冒起，且規模「蚊型」的香港流散媒體？

今期《如水》訪問到在這波流散媒體中，相對較早、較遲成立的《同文》及《棱角》，還有從做眾籌支援香港組織發展到跨界做新聞的「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下稱：香港民主女神）」。他們的成立的緣由為何？在緊絀的資源下，又能做些甚麼？¹

¹ 編註：本刊曾邀請其他香港流散媒體受訪，惟對方以不方便為由婉拒。



成立日期	2021 年 10 月
成立地點	臺灣
特色	《同文》認為在臺灣運作，與香港時區相同，比較可以即時跟進香港發生的事
成立緣由	希望透過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字，統整及發放資訊，做到類似「同聲同氣」的平台，連結本地及海外的香港人
新聞類型	起初多做香港、國際即時新聞，今年初逐漸轉型做「有聲同文」，以類似電台的方式，講述海外港人日常生活的專題故事
社交媒体 (截至 2023 年 5 月中)	: 2.6 萬人讚好, 4.2 萬人追蹤 : 1,776 則帖文, 2.1 萬人追蹤 : 67 部影片, 1,900 人訂閱, 近 10 部影片平均約 900 人次觀看 : 逾 2,500 人訂閱
備註	設有 Patreon 訂閱計畫，提供付費閱讀內容 讀者主要居於香港

(三)



THE POINTS

成立日期	2023 年 1 月
成員分布	澳洲、英國、加拿大
特色	《棱角》利用成員分布不同國家的時區優勢，24 小時無間斷出新聞
成立緣由	見到在海外的中文媒體絕大部分已「染紅」，同時想為已移民海外的新聞行家提供平台繼續為香港人做新聞
新聞類型	香港、國際即時新聞，關注不同國家的民生、社區新聞 平均每日出約 10 則即時新聞
社交媒体 (截至 2023 年 5 月中)	: 2.4 萬人讚好，4.6 萬人追蹤 : 1,333 則帖文，2.8 萬人追蹤 : 21 部影片，逾 3,900 人訂閱， 近 10 部影片平均逾 1,000 人次觀看 : 逾 2,600 人訂閱
備註	設有 Patreon 付費支持計畫，每周向會員發放電子報，惟在 Patreon 的所有文章均無上鎖 讀者主要居於香港

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主要成員現居地	日本
成立緣由	由街頭抗爭而生，以文藝角度為香港及其他受到極權迫害的人權議題發聲
目前業務	眾籌搞香港抗爭藝術展覽、支援港人組織，另在社交媒体做新聞報道
幾時開始做新聞	2022 年 2 月
跨界做新聞的原因	想填補《蘋果》、《立場》遺留下的資訊缺口，關注被其他傳媒忽略的議題
新聞類型	軟性新聞為主，亦有香港／國際新聞
社交媒体 (截至 2023 年 5 月中)	: 5.4 萬人讚好，6 萬人追蹤 : 911 則帖文，逾 4 萬人追蹤 : 7 部影片，273 人訂閱， 平均每部影片逾 1,800 人次觀看 : 765 條推文，近 2.7 萬人追蹤

(圖片由香港民主女神提供)

流散媒體做新聞有何局限與困難？

《棱角》總編輯 Jane Poon、《同文》受訪代表總編 YC，以及 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ex 都一致提到，雖然他們可以在做香港政治新聞時相對沒顧慮，彈性比較大，以及可報道在海外的社區、民生新聞、海外港人的聲音，甚至能跟進海外港人活動，但他們均認為，在海外做港聞有一定的難度與局限。

YC 指，海外的流散媒體無法如香港傳媒一樣快速、在現場報道即時情況，亦要依賴香港傳媒的第一手報道。Jane 也說，畢竟人在海外，能取得的新聞資料已是第二、三手，但相信仍可做到一些香港傳媒受國安法「紅線」所限而無法選取的新聞角度。

而 Alex 面對的，則是另一種困難。首先，香港民主女神團隊中，他與另一名做新聞的成員皆非做傳媒出身，在經驗上難免不足；此外，他們的資源亦不及其他流散媒體多。Alex 表示：「我們與其他流散媒體不同，我們是無任何機構資助，純粹靠眾籌，但內容上則相對沒有制肘。」他在這樣的背景下仍想做新聞，是希望能提供平台為港人帶來不同角度觀察社會議題。

當然，身在外地，亦令他們無法在香港做細緻的報道。Alex 就提到，早前香港有一則報道，是說一個炒栗子的婆婆因把攤檔交給非持牌人看管，而遭食環署票控，後續有輿論指該婆婆違規將小販牌出租。Alex 說：「這則新聞都很值得探討，為何一個年逾 90 的婆婆還要出來炒栗子；二來，究竟將小販牌租出去，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現象呢？... 我希望有記者能跟進，究竟是甚麼驅使香港還有那麼多老人家要用這種方式生存，這是我在日本無法做到的新聞，感到比較可惜。」

此外，Alex 亦指他們團隊缺乏做新聞的人脈，還特別提到《棱角》的新聞出得快，亦有角度講一件事背後的來龍去脈，並可以找到相關專業人士評論。他指，這方面香港民主女神很難做到，「一來他們（評論人）可能不認識我們（新聞團隊），同時他們或許覺得應該讓 creditable 的新聞機構去做」。現時他們做新聞的形式，主要是參考外國通訊社的新聞，翻譯、轉述，再自行做 research 及找人回應，製成報道。

在海外如何用第四權監察港府？

至於身在海外，傳媒機構還能否發揮作用，以第四權監察香港政府，3名受訪者皆說不能。Jane 直言「香港政府都唔會聽你支笛！」對於海外媒體報道，就算港府可能會關心，但都不會「聽」，因為「它望的方向都是望向北（中國）」。

YC 亦指，第四權是建基於政府在乎人民，然而，今時今日的政府基本上就不在乎，甚至故意作對，所以他認為，香港媒體在民生議題方面或許還能夠行使第四權，迫使政府改善或回應，但民生以外的議題例如政治，不論本地還是海外媒體，監察的能力都非常弱。同樣，Alex 也說，在海外他們能做到的，只是提供更多角度讓香港人思考，監察政府需要實地調查，所以在海外做不到。





《棱角》報道「大舊」死訊被批態度輕浮，事後承認報道不當並將之下架 | 網上圖片

《棱角》始營運即遇信譽危機

《棱角》的特色是人員分布在澳洲、英國、加拿大，會利用各地時差無間斷 24 小時發布新聞。不過，營運新聞媒體，除了講求報道出得夠快、內容範疇夠廣，準確度與信譽都攸關重要。

然而，《棱角》才剛營運不到一個月，就遇到首個危機——被指以輕浮態度報道「大舊」死訊。根據該帖文，《棱角》將社運人士、曾參選 2015 年區議會選舉的「大舊」劉偉德，與人稱為「大噃」的前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混為一談，配圖寫著「網上瘋傳『大舊』死訊，陳偉業：未死得！知道有人想我死！」而帖文並無明確標示傳出死訊的實為「大舊」劉偉德。

帖文一出隨即引起各方怒轟《棱角》缺乏專業操守。涉 47 人案、前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盈批評《棱角》涼薄，在劉偉德親友的傷口上灑鹽；亦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指《棱角》「擺死人嚟玩好賤」，表示要 unfollow。《棱角》其後發啟示道歉，承認報道不當並將之下架，「日後會審慎查證，謹此向『大舊』劉偉德的親友鄭重致歉，願逝者安息」。

即使已經道歉，但網上對《棱角》的批評仍未停止。亦有網民把批評延伸至其他海外流散媒體，指已離開香港的人不知香港發生甚麼事，或將此事理解為已離開的人不知香港內部有多痛苦、沒有資格談香港等。

Jane 對此不以為意，「我不會逐個去睇這些留言，我覺得任人講都無咩所謂」。她說，無睇是因為工作太忙。再者，早在 2019 年，她已經從不同政見的朋友口中聽過類似說法：「你都已經移民咗去澳洲，香港嘅事關你咩事？」她反問，難道香港人離開了香港，香港的事就

不能再關心，或無資格關心，而且「香港人」的身分便就此卸下？「我覺得唔可以咁講囉。海外的英文、其他語言媒體，他們不是香港人、或者不是紮根香港，為何他們可以報道香港的事？反而流散媒體無資格報道？」

Jane：傳媒總有犯錯時 有修正才最重要

她又告訴記者，「大舊」的報道發布前，並未有經過作為總編輯的她與其他《棱角》成員審閱。她事後看這份稿，亦認為撰稿同事處理上有問題。「咁但係，啲刻出咗，社運圈很大反響，我哋都即刻檢討。」她語氣加重說，「如果你有留意我們的公告，我們已經即刻採取了措施，（檢視）如何做審稿工作」。她又謂，《棱角》才剛開始運作，所有程序正在逐一修正，「我們從事傳媒工作很多年，傳媒總有犯錯的時候，但有無做修正，才是最重要」。

Jane 說，在事件告一段落後，《棱角》就開始有互相審稿的做法。她說，如果《棱角》在澳洲、英國及加拿大 3 地均人手充裕，會是同一地區成員互相審稿，惟現時資源不足，各地人手僅「一個多啲」，只能靠每個時區人員的辦公重疊時間，跨地區審稿。她強調，她雖然是總編，但不會一個人審所有的稿。

《棱角》總編輯 Jane Poon | 受訪者提供



《同文》：當初未料流散媒體遍地開花

選址在臺灣的《同文》在這一波的香港流散媒體中相對較早成立。YC 坦言，「一開始無想過會出現那麼多的流散媒體」，因為他沒想過香港的新聞自由惡化得如此急速，後來看到香港時局變差，他就預料到「好多媒體人離開香港，而且他們一定會各自找方法（繼續做傳媒工作），不論是營運自媒體，抑或找人贊助、資助以至眾籌等方式成立新的媒體」。

YC 說，《同文》成立之初的做法，與現在的《棱角》有相似之處。他說，當時會找很多在英國、加拿大等地方的海外香港人為《同文》做訪問及活動報道，「那時候是希望可以在海外資訊方面做『大包圍』，做到類似 24 小時不同時區去報道香港人的資訊」。

為免定位重疊 《同文》積極轉型做語音訪問

隨著愈來愈多流散媒體出現，而且大家都在做類似的事，《同文》選擇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以避免與其他媒體的力量互相抵銷，並嘗試關心其他被大眾忽略的議題。

至於會否視其他流散媒體為競爭對手，YC 思索片刻後指，「我覺得有競爭，而且是良性競爭，一定是好事」。他續稱，當愈來愈多流散媒體出現，去蕪存菁必然會發生。當一些資源比較豐富的流散媒體，可以進行比較主流的報道時，「我們就不要跟他們有甚麼衝撞，嘗試去找新的市場定位，例如從小事入手，報道一些海外港人舉辦、但又不太多人留意的活動」。YC 指，雖然做小眾報道比較難得到大眾關注、點擊率較低，但這仍是可以找到《同文》的價值及生存辦法。

現時《同文》積極在 YouTube 及 Patreon 做「有聲同文」系列，即以語音方式，做海外港人生活為主的新聞報道或訪問，一星期發布 2 至 3 條片段，其中一個欄目名為「說好香港故事」，相信故意與李家超常掛口邊的一句打對台。YC 在 4 月初受訪時提到，因人手所限，未來會大幅減少做主流國際、政治「炒稿」的文字新聞。然而，據記者觀察，4 月底起文字報道已幾乎絕跡。

俄烏戰爭下曾派記者赴烏克蘭採訪

儘管《同文》現時避開做主流、即時的報道，但在去年俄烏戰爭初爆發時，《同文》卻派記者赴烏克蘭實地採訪，還花重本讓記者在當地逗留大約一個月。會有這個決定，YC 談到，除了當時資源比較多，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震驚了全球外，因為當時的香港人，非常關心烏克蘭的情況，更指港人的關注度「以我認知，是比很多地方都多」。

他指，這是因為大家都聯想到港、中之間，以及烏克蘭、俄羅斯之間的抗爭有些雷同，故對烏克蘭感同身受。「香港及烏克蘭都是在爭取

港人專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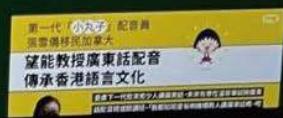


【有聲同文】《說好香港故事》「原味食堂」活動發起人及合作夥伴（下）！發起人琳琳：期待活動會帶來更多文化衝擊
農夫 Yu Wing、寶：與英國農夫一同交流種植心得



專訪「思家·士多」居英港人Luci 分享創業苦樂 以多種方法為香港繼續付出

專訪「思家·士多」居英港人Luci 分享創業苦樂 以多種方法為香港繼續付出



MacBook Pro



《同文》現時積極轉型做港人專訪 | YC 提供

獨立、民主、自由，對抗極權、獨裁、專制、用武力鎮壓的國家」，《同文》因此認為，既然事件引起了香港人的共鳴，加上全球化的理念，支持同一信念、價值的人都稱得上是「手足」，以及想透過派記者赴烏克蘭，展現香港人會關心一個狀況比香港更嚴峻的國家、當地人的故事，同時告訴全世界香港人不只是會關心自己，同樣會支持其他國家追求民主自由，「我認為香港傳媒親赴烏克蘭報道有其重要價值」。

民主女神跨界做新聞 Alex：想做軟性新聞連結在港港人

香港民主女神則是在這個訪問中，比較特別的受訪對象。團隊 2019 年 8 月在反送中的背景下廣為人識，當時他們在港製作了一個 4 米高的民主女神像，並帶她參與集會。2020 年 4 月，團隊正式在日本註冊為非牟利機構，除了做義賣、眾籌等協助一些港人組織外，大約在 2022 年初展開新領域——做新聞。

Alex 說，有這個轉變，是因為目前很多香港人不論在香港還是在海外，都對政治感到疲倦，「莫講是民主運動抗爭，就連對社會現況都感到好効，去到那種『唔想知、唔想理、唔想聽』的地步」；加上《蘋果》、《立場》停運後，團隊認為香港輿論方面，很多資訊上的空白須要填補，因此覺得與其一直做硬邦邦的抗爭和倡議工作，不如試著做較容易接觸公眾的新聞，以連結本地港人，讓他們知道海外的香港人仍然支持他們。他又言，民主女神團隊可以做一些比較人性化的新聞，去講海外香港人的動態，不必與 RFA 一類做主流新聞的海外媒體定位相撞。

他舉例，早前他們做了一篇有關「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下稱：細葉榕）」創辦人的專訪。Alex 指，這篇報道就以「人」為切入點，介紹「細葉榕」正在做甚麼、為何要這樣做。「如果很直接地報道，很多香港人都未必有興趣睇。」Alex 說，這個專訪出街後反應正面，很多人主動問「細葉榕」有甚麼可以幫忙，「所以我覺得這個角度，香港人仍是有興趣的」。

起初製港版民主女神像想聲援港人

回顧香港民主女神的開端，Alex 指，當時在反送中運動的不同集會上，看到有人搬出 89 年天安門事件的民主女神像，他就認為，既然當時已經有《願榮光》歌曲，那麼視覺上也應該要製作一個真正屬於香港人、有香港人象徵符號的民主女神像。於是他在連登發帖徵設計，經網民投票，再眾籌得 20 萬元，並花了一個星期時間製作了一個 4 米高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原訂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遮打花園的集會亮相，惟最後因警方無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遂改至中大揭幕，且暫存中大學生會外的空地一段時間。「港版」民主女神像復刻了反送中時期大部分示威者的裝束——戴著頭盔、眼罩、「豬嘴」，右手持有把雨傘，左手則高舉旗幟。

香港民主女神像在同年 9、10 月期間，曾參與 6 至 8 場大大小小的集會，「既然都製作了一個民主女神像，不如帶她出來，同香港人一起見證這個歷史時刻」。然而，這尊民主女神像參與幾次集會後開始損壞，「畢竟當初製作過程倉猝，也沒有預期會長期展示及移動，所以最後決定用比較轟烈的方式處理——將香港民主女神像搬上獅子山



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ex
|受訪者提供

頂」。Alex 說，雖然民女在山頂第二天已被「藍絲」破壞，但將雕像搬上獅子山的行動成功引起香港人，以至十多間外媒注意，「其實我們都覺得幾抵（值得）」。

民女被毀後，香港民主女神團隊的工作並無因此終結。Alex 說，他們聚焦在藝術及文化方面，繼續支持香港抗爭運動，在香港、東京及臺灣辦過幾場藝術展覽，將香港抗爭藝術帶出外國，並在藝術展上拍賣由香港民主女神團隊及香港藝術家 crossover 的作品，為協助抗爭者的港人組織籌款。除此以外，其團隊自 2019 年起亦製作、義賣 12 cm 版本的香港民主女神像，至今已賣出過萬尊，收益分別用於團隊營運，以及捐給有需要的組織。他們還有跟香港漫畫家「阿塗」合作出版漫畫《登山讀書會》講解公民教育，「民主是甚麼一回事、香港發生甚麼事，就想用比較輕鬆的方法教育下一代」。

Alex：未來或想關注中國不公義議題

Alex 坦承，做新聞工作，確實無辦法連結至香港民主女神的主要業務。儘管如此，而且人手只得 2 個人，他們仍堅持去做。至於未來在做新聞方面有甚麼方向，Alex 則指仍在探索，但會想做一些有關中國不公義、而且現時流散媒體無觸及的議題，例如維權律師被政府打壓、民運人士被消失等。

他直言，在現今香港社會，中港關係如此惡劣，做中國新聞簡直是「吃力不討好」，很多人根本「唔想知、唔想睇」，一些媒體亦為了跟從讀者的口味、社交媒體的點擊率，因而減少報道。「以前這些是支聯會做的，《蘋果》、《立場》都會報道……但我覺得仍然需要有人做這些工作，何況這些中國維權律師、民運人士都長期支持香港人」，故認為香港人也應關注他們的景況。

香港民主女神像在獅子山頂 | 受訪者提供





《同文》、《棱角》缺資源裁人手

訪問途中，3名受訪者都談及營運資源不足，其中《同文》、《棱角》也不諱言因此裁減人手。

YC 說，不單是《同文》，許多流散媒體都要面對收支平衡難的問題。原因之一是流散媒體報道多牽涉政治敏感議題，故不太會有廣告商落廣告。面臨困境，如何開源節流？YC 說，《同文》今年有開設Patreon 接受公眾捐款，儘管收到的款項不算多，但至少可以補貼一部分支出。他指，有賴《蘋果》當年推出訂閱制，讓港人慢慢接受付費閱讀，現在大家都比較願意捐錢給與民主自由有關的組織及媒體。而節流方面，則只能是削減人手。他指，《同文》早期人手較充裕，在不同國家都有記者，而今則只有分布在臺灣和英國的三名人員和一些Freelancer。此外，《同文》未來亦會嘗試另一個節流方法——在臺灣聘請員工。「當然是與當地薪金水平有關。假設在英國請記者，因為要顧慮當地生活水平，人工支出是高很多。」

Jane 則談到，《棱角》也是靠讀者訂閱，雖然現時亦未做到收支



平衡，但期望一年後能達成，甚至為更加容易達成目標，「無辦法啦，（目前）只有 cut（人手）啦……大家同事都明白 … 因為大家都想做到落去」，又言「但唔知啊，理想和實際唔係一樣喎嘛！」

《棱角》願成平台集合各家 擴大流散媒體生存空間

Jane 說，雖然現在的流散媒體很碎片化，令大家獲分資源很少，但她認為流散媒體一定有其存在空間。她又謂，《棱角》最想做到的，是成立一個平台，去集合各家的新聞報道。這不但有多一個媒介給不同的流散媒體、公民記者發放新聞，也可以幫助他們找到更多資源以供生存。

Jane 又認為，香港人的能力其實很強，一定會找到生存方式，問題只是要有過程，「無理由搞唔掂嘅」。 ■

【專訪】

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

文／編輯部



國安法下，香港多間傳媒被查封、倒下，仍在運作的媒體則因為受「紅線」壓迫，無法如以往做「敏感」新聞；至於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香港流散媒體，亦因為資源匱乏、人手不足，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今期《如水》訪問到 RFA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亞洲電台) 粵語部副主任 (Cantonese Service Deputy Director) 胡力漢，以在香港設有辦公室的外國媒體角度，談談對香港流散媒體，以及對目前香港傳媒環境的看法。胡認為，現時的香港本地傳媒難免退後，而新開的流散媒體也不敢去得太盡。那麼，RFA 比起香港本地與海外媒體，能多做些甚麼？



RFA 1996 年由美國政府資助成立，隸屬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簡稱 USAGM），是一家「面向無法接觸自由新聞媒體的亞洲聽眾播放新聞以及資訊的非營利私營公司」，以短波、衛星和互聯網提供普通話、藏語、粵語、維吾爾語、緬甸語、越南語、老撾語、高棉語（柬埔寨）及韓文（北韓）9 種語言的廣播服務。除此之外，RFA 設有網站及社交平台，為上述各語言觀眾報道新聞。

從 RFA 網站可以看出，他們投放較多資源在中文語系，不單在網站設有粵語部及普通話部，分別報道以香港、中國為主要受眾的新聞，電台廣播方面，每日做 12 小時普通話節目，為各種語言中最多（粵語為每日 2 小時）。此外，RFA 在 2020 年初還設立了一個針對中國年輕族群的新聞網站「歪腦（WHYNOT）」，發布一些與中國、香港議題相關的深度新聞、紀錄片，其中歪腦去年 7 月製作的《〈蘋果〉消失一週年，劫難之後的香港記者》紀錄片，獲得 2023 紐約電影電視節（New York Festivals TV & Film Awards 2023）新聞報道領域榮譽提名。

今期《如水》聚焦 RFA 粵語部。他們的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及 YouTube，其中 Facebook 每日發布約 8 則新聞，有逾 30 萬人追蹤；YouTube 頻道則有近 25 萬人訂閱，該頻道每逢周一至五發布一段長約半小時的粵語新聞報道，還會有一些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等人主持的評論節目，相關帖文及影片都會有不少網民留言表達意見。

回顧 RFA 粵語部的過去，胡力漢提到，1998 年成立之初設定是傳播訊息給在香港及華南地區講粵語的人，「例如廣西、廣東那些人」，但去到 2019 年經歷「反修例運動」之後，RFA 粵語部的受眾就有所改變，大部分集中在香港。胡指，根據社交平台的數據，現在有七成流量都是來自香港。至於這個轉變的原因，他認為，其中之一是本地主流媒體相繼變質，包括 RFA 在內的外媒相對不受政治審查影響，成為香港人獲得新聞資訊的來源。

他又稱，現時整個 RFA 粵語部的員工九成都是香港人，都是想堅守以往香港擁有的價值，繼續以香港人角度「做正常時期的香港的新聞」。



胡力漢 2017 年最後一次到大陸採訪（受訪者提供）



為避風險 RFA 在港決策人員全撤離 自言仍能覆蓋大部分港聞

胡力漢說，RFA 的特色是會派人員去最前線，以外媒角度做當地新聞。然而，在國安法下的香港，RFA 不得已改變在港運作的方式，將在港負責決策的員工撤離到海外以規避風險，現僅剩少量人手在香港。

據港媒報道，去年 8 月，有團體向香港警方報案，稱 RFA 的報道觸犯國安法。警方派代表接收舉報信。

「我無法畫條線話你知（RFA）點樣去保護同事，其實好靠我們整個 editorial management（編輯部管理）的決策，即每一單事件我們都會衡量」，胡力漢說，「現時留在香港的 RFA 員工，只剩下一些前線、年資淺的記者、攝影師及技術人員，而且主要是做一些官方消息報道，至於比較敏感、批判港府的報道，則由一班已離港的同事負責。比如我們在美國有一些人權新聞，主要是用美國的 byline 去做，或者用臺灣同事的 byline 去做」。

胡力漢坦言，因為在港人手縮減，一些細緻的社會新聞 RFA 做不了，「（例如）『去捕』（花時間捕捉的新聞）、狗仔隊」，然而他強調，「撇除人手問題，以編採方面來說，其實香港傳媒可以做的，我們都可以做，而且還可以比香港媒體行前一步」，因為作為美國政府資助的外國媒體，面對「紅線」，「我們可以企得硬啲」。

不過，如今在香港做新聞，當然也有外媒也無法「企硬」的時候。

胡力漢則稱，國安法後已不太容易、且不能隨便找人受訪，「在香港基本上做唔到啲」。他解釋，2019 年進行訪問時，往往「只要變聲、訪問時不出樣（露臉），用化名就 ok」，但國安法後，「現在監控的程度如此高，我們都恐怕就算用這些方法，都未必做得好（全面），就如在手機上用 WhatsApp、Signal、Telegram 去聯絡，或者去做訪問，都可能成為被監控的目標」。他提到，最近甚至連一些民生議題，「（想在香港）搵人評論吓，都無」。

國安法紅線難觸摸 胡：本地傳媒退得好後兼自我審查

講到國安法對本地傳媒帶來的後遺症，胡力漢說，「我覺得現在香港媒體有好多自我審查……不該說他們自我審查，而是大家都不清楚紅線在哪，所以香港媒體會退得好後」，他又說，香港同行處理新聞的方式因著國安法而改變，「（現在香港行家是）將新聞 merge 去國家安全法，甚至乎 merge 去國家利益，但是我們以前那套新聞理論不是這樣子的，新聞自由就是新聞自由，不會 merge 其他的利益」。

他亦提到，許多香港的傳統媒體已「歸邊」，「大家知咩事啦，已經跟黨走了，大家打開電視、睇報紙都知道，這些媒體通通落入後面有班 manipulator 控制所有的新聞宣傳」。

而 RFA，胡認為就不會出現這個情況。「因為 RFA 是以外媒身分去做當地新聞，向當地人提供一些人權、獨立資訊，我們的報道不是 responsible to 當地政府，而是根據美國那套嚴格新聞工作作業守則（code of ethics）運作。」他強調，「（RFA）是以外國媒體的定位、美國媒體的標準去處理新聞……不容易受當地政治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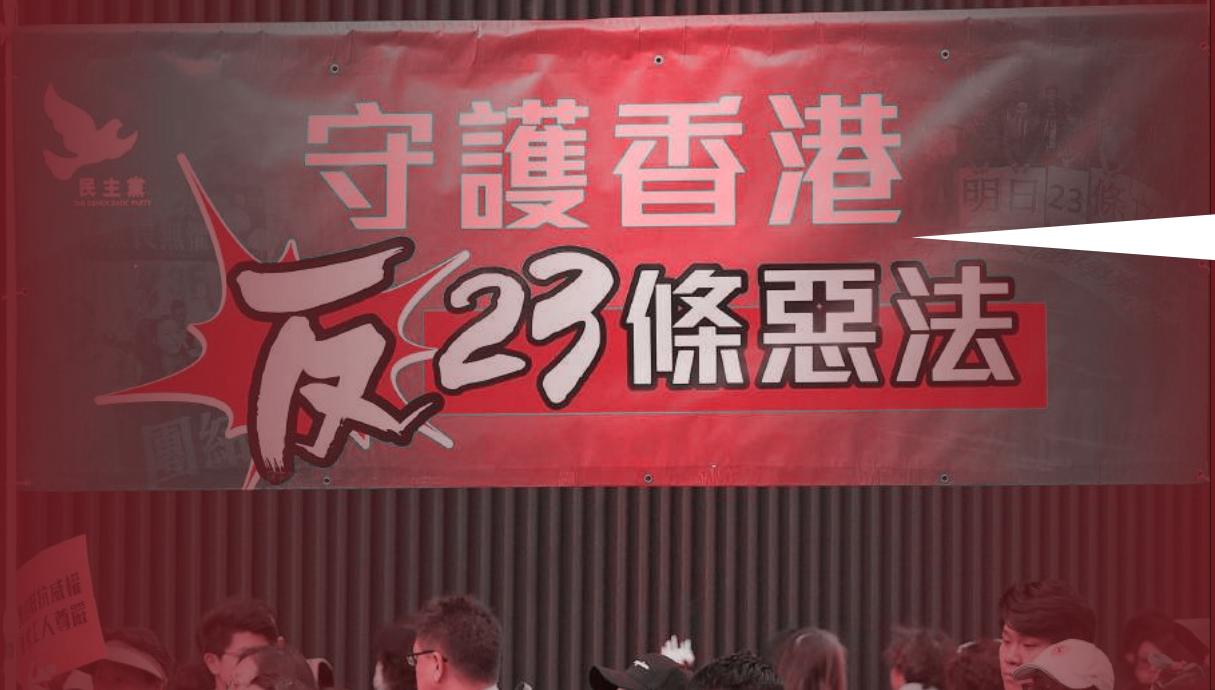
論流散媒體： 為避國安法不敢去太盡 可「擦邊球」做敏感議題

至於國安法、香港多間傳媒被迫停運後，不少傳媒人選擇離港另起爐灶，創辦不同的流散媒體，他認為流散媒體做的新聞與 RFA 有些不同，前者會做一些比較民生、仔細的新聞，「譬如《綠豆》做得好仔細，而 RFA 做的是很直接的新聞」，但他認為，「現在香港的流散媒體，在很多事件上都不敢去得太盡，因為始終驚國安法，就算不是留在香港的媒體，編採上也不敢行得太前，不敢講得太直接」。

既然如此，那麼流散媒體還能做甚麼？

胡力漢認為，流散媒體可以「擦邊球」，做一些好 raw、利用官方的數據去演繹一則事件，「例如現時（中國）的經濟數據，官方講到已經正在復甦，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找數據出來，『其實唔係咁喎，數據另一面係咁睇喎』，（因為）數據本身都可以有很多不同角度，即大家要學習去用『擦邊球』的方法（去做新聞），繼而反映一些社會問題」。

胡還點出流散媒體的前景問題，「始終他們的資金來源、組織其實好有限，加上營運不是很固定」，所以他認為，「相對地，RFA 有比較固定的資源，雖然不是說有很多，但至少可以說是有規模的一個外國媒體專做香港的新聞，或以香港人角度做新聞」。



2018 年的元旦大遊行反對「23 條」|圖片來源：Etan Liam@flickr

RFA 有信心國安法下仍能在港運作 惟憂未來「23 條」針對外媒

胡力漢在訪問中講到 RFA 有信心在國安法下，仍有辦法在港運作，「我們暫時相信可以盡量避開風險」，但真正令他們感擔憂的是聲言即將立法的「23 條」，「條文會不會針對外媒呢？」他更明言多間有駐香港辦公室的外媒都在觀望情況，「以我所知（若然立法後）有很多外國媒體都……都咩嘅啦，都摺嘅啦、都走（苦笑），多間外媒都收縮得很厲害」。

「23 條」溫故知新

根據《基本法》網站，「23 條」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早在 2002 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首次提出就「23 條」立法，原定在 2003 年 7 月 9 日在立法會通過二讀，但條例被指侵犯港人自由。因反對「23 條」而成立的民主人權陣線（民陣，已在國安法後、2021 年 8 月 13 日解散），當年舉辦了自回歸後最大規模的七一大遊行，逾 50 萬人參與。其後，時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在民意壓力下，表態反對「23 條」且辭任行政會議成員；政府亦因為自由黨倒戈，沒有足夠票數通過法案，最終在同年 9 月 5 日宣布撤回。至於當時負責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七一遊行後的一個月內（7 月 25 日）辭職，董建華則在 2005 年「腳痛」下台。

自此以後，「23 條」立法成為每屆特首的燙手山芋。及後上任的曾蔭權、梁振英及林鄭月娥，都先後指「23 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但都無再次正式提出立法建議。時隔 20 年，直到今年 4 月，身兼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的現任特首李家超，在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訪港行程後，引述對方指「國家安全風險仍然潛伏」；李家超重申，特區政府希望最快今年內完成「23 條」立法。

縱使 RFA 的宗旨是在無新聞自由的地方做報道，但此前亦有在極權國家「摺台」的經驗。據 RFA 的自家報道，2017 年，柬埔寨在翌年（2018 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前為控制言論，以違反稅務及行政規定等理由，打壓在當地的外媒及獨立媒體，迫使最少 18 間電台關閉，當中包括運作 20 年的 RFA 金邊分社。那麼香港「23 條」立法以後，屆時 RFA 香港辦公室會像在柬埔寨一樣，因被打壓而完全停運嗎？

胡力漢回應道，「所以我們視乎香港政府『23 條』立法的進展，細節如何，以及政府如何執行」。他及後補充，「看『23 條』條文，一句『國家機密』就甚麼都無得做，這個『國家機密』誰定義？就是政府，所以係無得做 . . . 你是外國媒體又如何（意指處境可能比本地媒體好一些），『國家機密』四字根本就可以無限上綱，疫情數字都可以是『國家機密』」。



胡力漢 2017 年最後一次到大陸採訪 | 受訪者提供

2018 年從《有線》跳槽： 因駐京察覺治港方針將大改 唔想「衰收尾」

在訪問後段，焦點回到胡力漢本人，記者好奇為何在 2018 年香港還「天下太平」的時候，他會毅然離開香港主流傳媒，從《有線中國組》跳槽至 RFA，明明該節目的質素人所共知。記者當年才剛在港入行做兩岸記者，正經歷香港媒體最後的美好光景，而《有線中國組》是每晚必睇節目。

胡力漢回應道，在他決定加入 RFA 之前，最後一個在大陸的採訪，是 2017 年的「十九大（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他那時候因為駐京，接近權力中心，因此感覺到中國政策會轉向：「黨管一切，香港無例外」，故認為香港將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我收到訊息，知道以前我們在香港做新聞的方式，好快在香港就不能持續下去，一定唔可以」。

胡提到，在採訪完「十九大」回港後，正值《有線》持有人變動的時期，「永升（亞洲）」入主，而九倉則全面退出。「這更加強化了我（以上）的想法。」他補充道，北京對香港的態度轉變，香港傳媒老闆只能跟從北京的指令，永升也毫不例外。當他與永升管理層接觸後，發現對方「口中的所謂營運策略就是等指示」，令他心灰意冷。他還說，九倉經營《有線》二十多年間，經營困難的問題早十多年已經出現，但九倉都無放棄，直到 2017 年才突然轉變態度，「很明顯是政治原因」。

正因如此，胡力漢選擇了離開香港的主流媒體。他認為，當初留下的話，一貫處理的新聞原則只會被迫改變，「咁我就唔想，因為我唔想『衰收尾』（他講完也笑），做了幾十年，想維持自己的做法，剛好 RFA 有這個機會讓我跳槽」。他感嘆，在 90 年代、2000 年初，香港新聞冠絕亞洲，但如今香港新聞行業式微，「我可唔可以……在現在這個平台裡面，以有限資源維持這樣的運作，堅守香港以往擁有的價值，例如基本的人權及自由？」

胡力漢說，離開前線後，他有一個掙扎依然無法解決，「我驚我會 out（脫節）」。他補充，「我最初來 RFA 最大的掙扎，就是我不能夠經常返大陸，接觸、感受到前線，因為好多的事，是需要臨場感，才可以找到做新聞的方向，始終『炒稿』缺乏現場感受，對報道事件是有偏差」。

雖然不能再親赴前線，但胡相信，RFA 長遠能夠提供讓他堅守這套原則的空間，儘管遙距做新聞有很多制肘，同事又分布在世界各處，「不再是傳統媒體有一個好大的 news room，老總坐曬喺度，下面是編輯、再一班記者，大家坐曬喺度每日開會……而是很 virtual 的」。他坦言，現在每日都要 connect 亞洲、美國時區去協調工作，24 小時沒甚麼作息時間，「好辛苦，但無計」。■

海外、居港港人 有幾信任、支持香港媒體？

文／M.Y.

國安法之後，《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及《傳真社》等香港媒體逐一停運，與此同時又有一些新的媒體誕生。在這種傳媒生態的轉變下，香港人接收新聞資訊的習慣有無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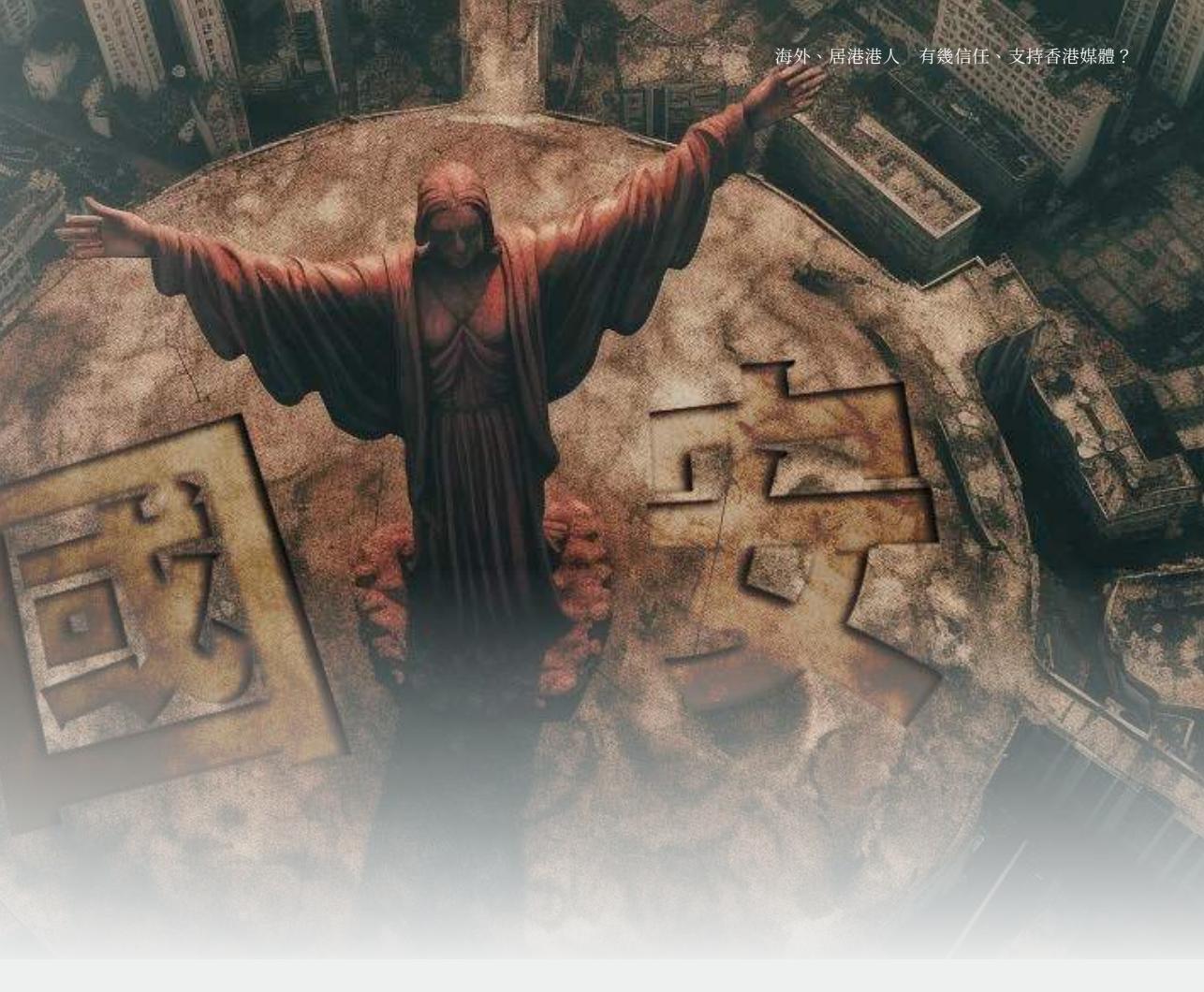
為回答此問題，《如水》在今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8 日期間，於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及 Telegram 發文，請公眾分享對於香港媒體的可信度，以及每月願意花費多少錢訂閱等資訊。為確保調查能跳出《如水》追蹤者的層面，我們於社交媒體買廣告，令帖文能廣泛發放給在香港及海外的港人，最後收到 377 個回應，有 371 人回答自己是香港人，其中 274 人居於香港，96 人則在海外，另有一人在問卷填寫「N/A」拒絕回應。《如水》感謝所有網民參與。

本次研究《如水》揀選了 33 間媒體，名單主要參考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2022 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所載傳媒機構，並加入在國安法後成立、較多港人閱讀的新媒體作補充，列表如下：

國安法前已成立的媒體（附成立日期）

南華早報 1903/04/01	香港電台 1928/06	星島日報 1939/08/01	明報 1959/05/20	商業電台 1959/08/26
TVB 新聞 1967/11/19	東方日報 1969/01/22	香港經濟 日報 1988/01/26	有線新聞 1993/10/31	獨立媒體 2004
頭條日報 2005/07/12	am730 2005/07/30	Now 新聞 2006/03/20	晴報 2011/07/27	巴士的報 2013
HKFP 2015/06	香港 01 2015/06/10	端傳媒 2015/08/03	誌 HK Feature 2019/04	

國安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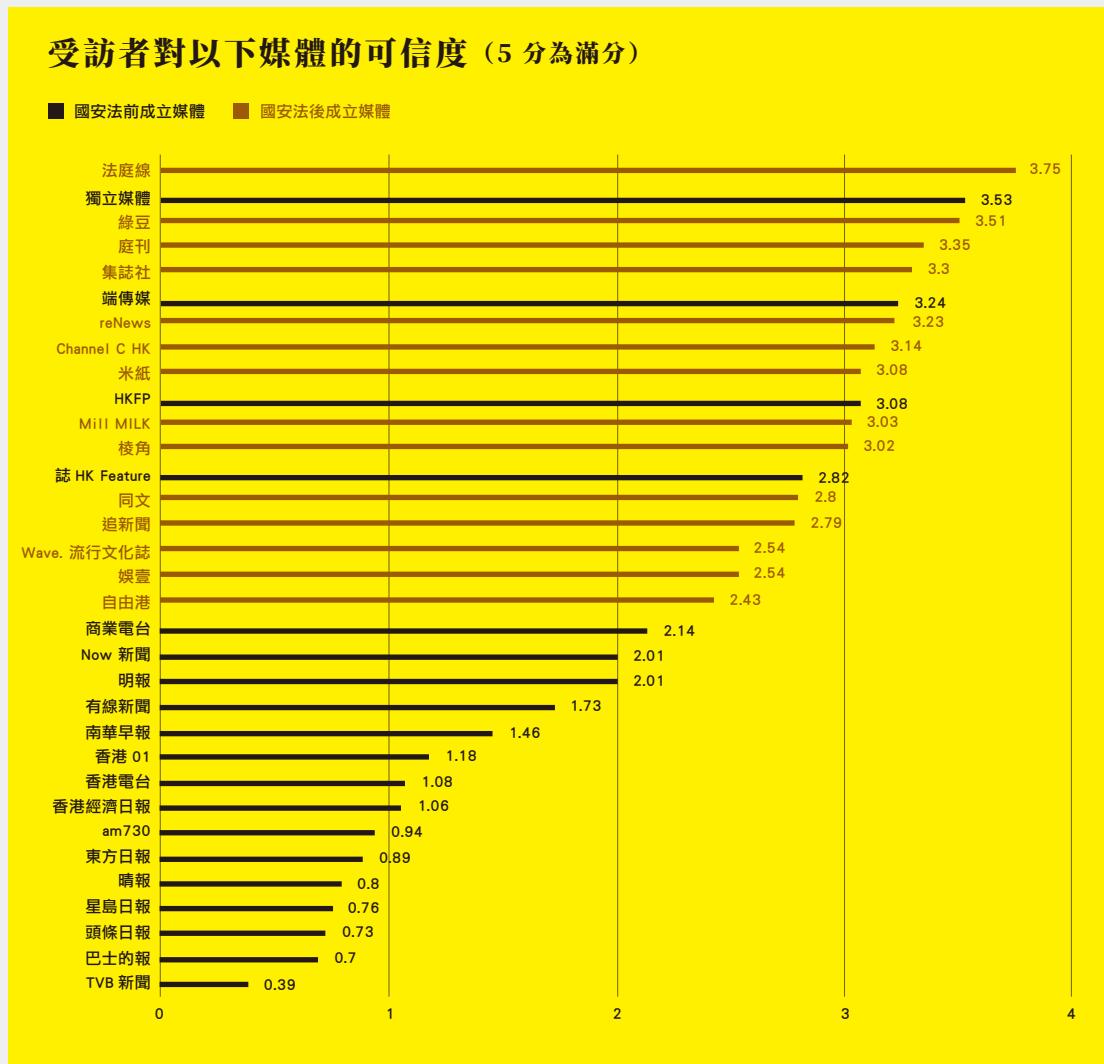
國安法後成立的媒體（附成立日期）

自由港 2020/09/15	Channel C HK 2021/07/12	娛壹 2021/07/13	米紙 2021/07/18	Mill MILK 2021/09/07
同文 2021/10	追新聞 2022/03	reNews 2022/04/28	法庭線 2022/05/16	Wave. 流行文化誌 2022/06/10
綠豆 2022/07/04	庭刊 2023/01/01	棱角 2023/01/13	集誌社 2023/0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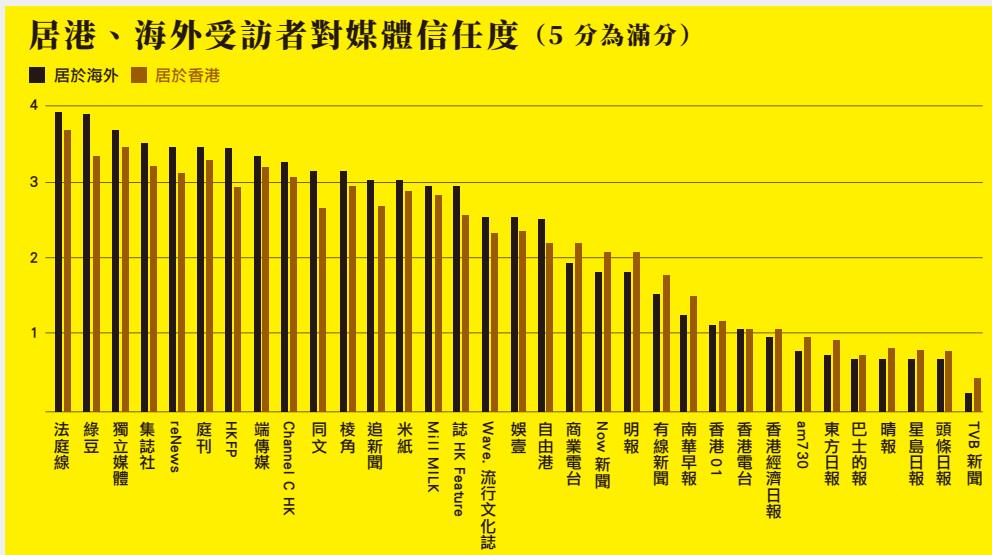
■ 在海外成立

調查後發現，只有三成受訪者表示曾於過去一星期有閱覽國安法前成立的傳媒機構資訊；而國安法後成立的機構方面，則有約六成表示有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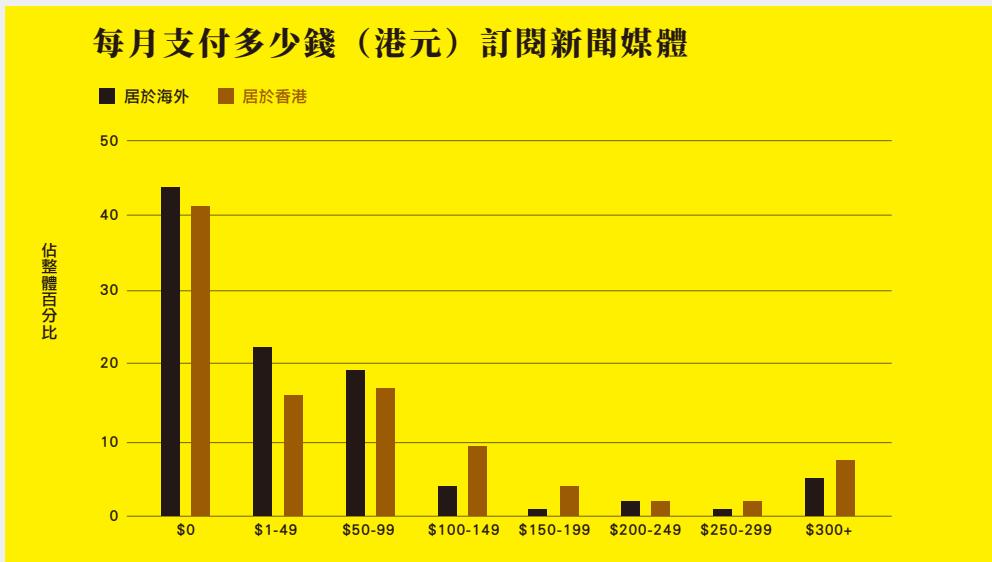
至於受訪者對上述傳媒的可信度排名（5 分為滿分，最低為 0 分），最高分者為《法庭線》，獲得 3.75 分，「TVB 新聞」則以 0.39 分居末位；海外成立的新媒體中，《綠豆》以 3.51 分居首（總排名第 3）。值得留意的是，受訪者普遍認為新辦媒體較可信，分數大多在 2.5 分以上；而國安法前成立的媒體當中，《獨立媒體》以 3.53 分最高，其次是《端傳媒》，3.24 分，其他「主流媒體」大多只有 2 分或以下。



分拆居港港人、海外港人的數據看，我們發現，現居海外的受訪者對新成立媒體的信任度較高，然而，數據亦顯示，在港受訪者相對比較信任國安法前成立的媒體。



今期《如水》報道《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絀資源下生存？》內，受訪媒體均提到資源緊絀難收支平衡。那麼，有多少受訪者願意「課金」看新聞？



調查顯示，不論在香港還是海外的受訪者，無「課金」者皆超過四成，而願意每月付費者當中，分別有 57% 及 75% 人報稱每月支付金額為港幣 99 元以內。

我們並發現，願意每月付費的居港受訪者，普遍比海外受訪者更願意支付較高金額支持傳媒機構。在居於海外的受訪者當中，每月支付超過 100 港元訂閱新聞媒體的比例只佔約 14%；而居於香港的受訪者方面，同一比例則高達 25%。■

2月
►

04/02 國際

中國證實民用氣象氣球誤入美國領空，布林肯押後訪華行程。

05/02 香港

《給十九歲的我》紀錄片暫停公映。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林景楠 | 圖片來源：林景楠 Facebook

3月
►

01/03 香港

香港全面撤銷口罩令、社交距離措施；《禁蒙面法》續生效。

08/03 香港

香港警方調查在波斯尼亞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將《願榮光》播錯為國歌的事件。

09/03 香港

警方國安處拘職工盟前總幹事、李卓人妻子鄧燕娥。

採訪・報道／化零為整

香港・世界大事回顧

文／編輯部

2/2023-4/2023

《如水》自第七期起設有此欄目，旨在記錄上一季環球發生不同事件時，香港又在經歷甚麼事。

06/02 香港

47 人初選案，伍健偉、林景楠改為認罪。16 人拒認罪。

06/02 國際

土耳其、敘利亞發生 7.8 級地震，逾 5 萬人死亡。



土耳其災區情況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4/02 香港

28 歲香港名媛蔡天鳳遭前夫一家分屍烹煮，涉案人士先後落網。



習近平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0/03 國際

習近平全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及軍委主席。

10/03 國際

伊朗與沙特達成建交協議，將互設大使館。

16/03 國際

中國國務院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為黨中央辦事機構，不再保留單設國務院港澳辦。

18/03 國際

國際刑事法院向普京發拘捕令，俄拒絕承認；普京翌日突訪由俄控制的頓巴斯地區。



普京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3
月
▶

21/03 香港
何俊仁被指涉嫌在保釋期間干擾趙家賢家屬，再被國安處拘捕。

23/03 香港
醫管局引入大灣區醫護來港交流，首批 9 名專科醫生及 70 名護士，4 月起在公院工作。

26/03 國際
洪都拉斯宣布與臺灣斷交，並轉與中國建交。

21/03 國際

法國馬克龍政府不信任動議被否決，繞過國民議會、具爭議的退休改革法案正式生效，多地爆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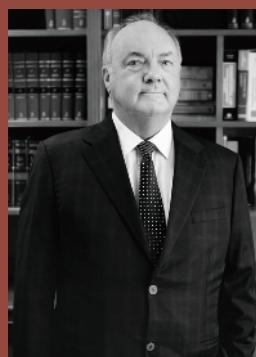
何俊仁 | 貝貝 攝



法國示威現場 | 圖片來源：Jeanne Menjoulet@flickr

4
月
▶

03/04 香港
祈顯義（Patrick Keane）獲任命為終院非常任法官，為國安法首名新加入終院的海外法官。



Patrick Keane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04/04 國際
芬蘭成為北約第 31 個成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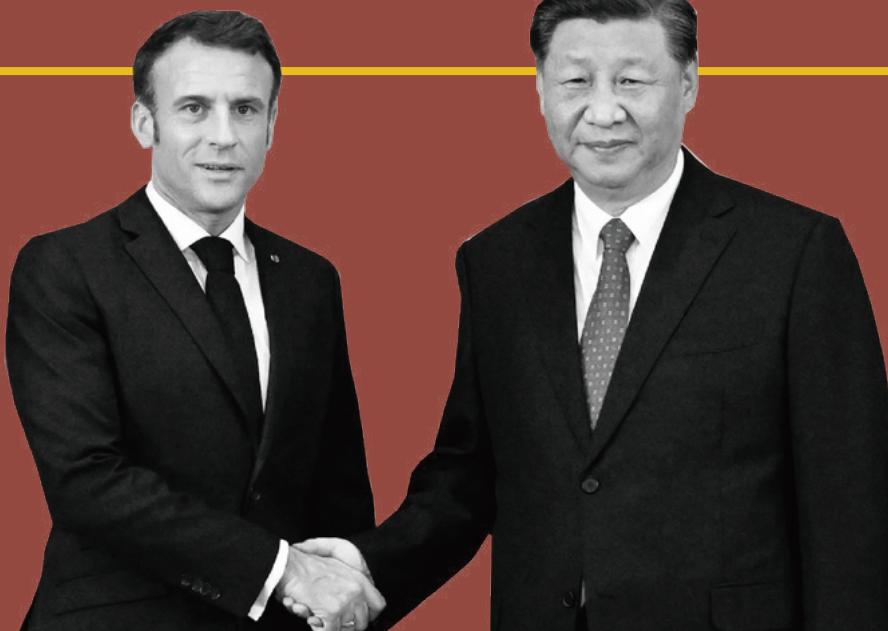


盧沙野 | 圖片來源：中國政府

23/04 國際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稱，前蘇聯國主權未定，引東歐多國抗議。大使館其後指其言論屬個人意見。



朱銘作品「地獄在人間·人間有天堂。問君何處去，但憑一念間。」 | M.Y. 攝



馬克龍訪華 | 圖片來源：中國政府

10/04 國際

馬克龍訪華後指歐洲應避免捲入臺海局勢下的中美衝突，其言論引發外交風暴。

14/04 香港

一名在日本留學女學生疑涉網上談及「港獨」，回港更換身分證時遭國安警拘捕。

15/04 國際

英、美、法、德、澳、加等最少 15 國以及歐洲議會禁止公務員在公務手機安裝 TikTok。

17/04 香港

浸大學生會新內閣「滄溟」被校方指政綱偏頗，禁掌管學生會並遭懲處，最後內閣全體成員請辭。



Tiktok | 圖片來源：Alpha PhotoFollow@flickr

25/04 國際

聯合國指印度今年 4 月將取代中國成為最多人口國家。香港生育率位列全球最低。

26/04 香港

勞聯、前職工盟成員分別以個人名義，先後申請在勞動節遊行，惟均在遊行舉行前撤回申請。

27/04 香港

最後一屆通識科文憑試開考。

2 - 4 月

外媒觀點整理

文／編輯部



二月末，香港社交名媛蔡天鳳疑被前夫一家謀殺並遭肢解烹屍，眾多外國媒體皆有報道。日本學者阿古智子網上撰文披露一名留日香港學生返港時因國安法被捕的事件，亦引起了國際關注。

阿古智子 | 劉言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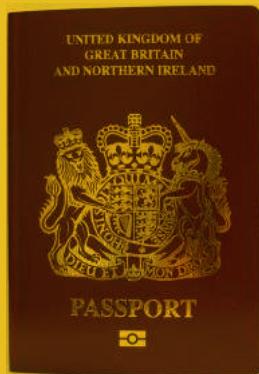
B B C

BBC 英國廣播公司

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網紅李梓敬接受 BBC *HARDtalk* 節目訪問，跟主持人 Stephen Sackur 就香港的民主自由狀況激辯二十多分鐘。主持人質疑香港沒有民主，指北京在香港強制實施國安法令廣受尊重的黎智英面臨終身監禁。李梓敬則堅稱香港跟美國的自由程度沒有分別，質疑為何美國可立國安法而中港不行。BBC 電視新聞節目《新聞之夜》(*Newsnight*) 記錄了香港國安法下反對派被噤聲的情況，談及香港政府指控 47 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涉顛覆國家面臨終身監禁的案例。《新聞之夜》還採訪了仍然在街頭抗議的社民連成員陳寶瑩和曾健成，講述在香港抗爭的困境。

此外，BBC 亦持續關注黎智英案件，報道英國議會跨黨派香港小組 (APPG on Hong Kong) 發表報告，譴責英國政府對黎智英被中國《香港國安法》起訴的態度冷淡。報告形容黎智英案「展現了專制最糟的一面」，而英國政府對這位英國公民的遭遇，表現出「連竊竊私語都談不上」。報告引起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激烈反對，批評這是在「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大肆破壞香港法治」，並質疑英國此舉是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黎智英三子黎崇恩 (Sebastian Lai) 亦在 BBC 第四廣播電台《今夜世界》(*The World Tonight*) 指出，英國政府對其父親的處境幾近毫無作為。英国外相祁湛明 (James Cleverly) 在接受 BBC 訪問時回應稱，英國有就黎智英的處境發聲，但要做到持續發聲，就必須與北京持續接觸，與中國建立更具建設性的關係。他並強調，孤立中國不符合英國利益。祁湛明稱，他不會許諾會晤黎智英家屬，相信政府已有團隊與黎家保持聯絡，他也將確保自己清楚了解案件進展。

WSJ



BNO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Wall Street Journal 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評呼籲從「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活動獲得免費機票的旅客，須小心有否觸犯國安法。文章羅列中共在香港的各種打壓行為，例如移除政治敏感雕塑、強行關閉六四紀念館、禁止政治敏感的電影公映、拘捕民主派人物及打壓傳媒等。社評文章諷刺地反問，訪港的免費機票是否包括參觀監獄的行程。文體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去信批評文章內容誤導，對港區國安法的論點毫無根據。楊又稱，國安法實施令香港的民生和經濟活動復常，國安法明確規定4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無論是旅客、投資者還是港人，只要遵守香港法律，就不會誤墜法網。

《華爾街日報》另一篇社評又提到，近年以「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移英的港人，欲以「永久離港」為由提早領回強積金（MPF）時遭拒絕。文章形容離港潮觸怒政權，港府則以沒收資產的方式，利用強積金脅迫港人留港，並形容港人的退休金被「綁架」。積金局發聲明批評文章誤導，並強烈譴責《華爾街日報》的說法，損害強積金制度的可信度，要求刪除相關錯誤內容。積金局重申，香港政府於2021年1月發表聲明，不再承認BNO護照為有效旅行證件和身分證明，因此強積金計畫成員不能依賴BNO護照或其相關簽證作為「永久地離開香港」的理由，申請提早領取MPF。



李梓敬接受 BBC HARDtalk 節目訪問 | BBC 截圖

Bloomberg

Bloomberg 彭博通訊社

《彭博》資深專欄作家 Matthew Brooker 發表評論文章〈香港的新常態無法欺騙任何人（*Hong Kong's New Normal Isn't Fooling Anyone*）〉批評香港政府即使取消防疫限制，推出「你好，香港」、「開心香港」等宣傳香港的計畫，仍然無法改變在疫情期間，北京以共產中國的方式重塑香港的負面影響，包括關閉新聞機構、逮捕政治活動人士、強迫工會解散，在學校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等。他認為，即使香港的商場和餐廳熱鬧，也永遠不會復常，只要這座城市繼續禁止香港人行使政府曾經承諾的公民權利，社會就只會處於一種「新反常」。

針對香港政府計劃在今年 6 月 1 日開放居民自由買賣加密貨幣，並實施虛擬資產服務的發牌制度，《彭博》則認為，香港一改以往限制加密貨幣交易的作風，銳意把香港轉變成數碼資產中心，背後源於中央政府的支持。報道引述知情人士稱，在過去幾個月裡，中聯辦的代表和其他官員一直是香港加密貨幣聚會的常客，他們在聚會交換名片和微信，態度正面。知情人士認為官員是在趕進度，向北京政府交差。報道並稱，中國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和交通銀行等幾家中國銀行已開始接觸香港加密貨幣公司以提供金融服務。



Hello Hong Kong | 圖片來源: 香港政府



Financial Times 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報道，北京當局為消除外國影響力，並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逼迫香港政治菁英放棄西方護照，否則阻止他們獲選為人大代表。報道引述一名新任中國人大代表、一名前代表及一名知悉遴選過程的人士指，至少有一名尋求連任的人大代表因持有 BNO 護照而遭拒絕連任。《金融時報》指，北京當局的「愛國者治港」政策，是針對香港領袖的密集審查，試圖令與西方關係密切的香港政治人物無法取得重要職位。

另外，《金融時報》自二月起發表數篇分析文章，比較香港與新加坡誰更有能力爭奪亞洲中心之位，成為亞洲的開曼群島。《金融時報》從房地產價格、航空及其他數據分析，在嚴格防疫政策及政治環境不明朗的雙重打擊下，香港相對新加坡已漸失優勢。例如自 2021 年中以來，新加坡的外幣存款增逾 1,000 億美元。反之，香港銀行存款自 2022 年初持續減少，直到 11 月才停止下滑。國際企業辦公室亦開始從香港轉至新加坡，截止去年底，新加坡市中心的甲級寫字樓空置率為 2.3%，而香港則為 11.1%。但報道亦指，香港因與中國關係緊密，仍有一定優勢，在金融基金、股票投資方面勝於新加坡。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編輯部發表長篇評論文章，批評全球專制政權大規模逮捕政治犯。文章其中一部分提到 2019 後香港有超過 1,000 名政治犯，大約四分之三的被囚者為 30 歲以下；超過一半的人不到 25 歲。文章呼籲自由國家應該運用他們的外交影響力，對獨裁政權施加懲罰。例如《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就是一種超越國家層面的廣泛制裁機制，可針對控制警政系統的個人實施簽證禁令和資產凍結，令獨裁者明確意識到，他們的野蠻行為不會被忽視。

《華郵》另外發表社評關注香港 47 人案，批評未經任何協商就起草和實施的國安法，廣泛和任意將異議、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定為犯罪，形容國安法是令香港就範的鞭子，使學校、媒體、立法機關和法院等機構蒙上陰影。文章指，47 人的審判標誌著民主運動在過去十年中寄予的希望最終破滅。



CNN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道，杜拜或香港的空殼公司可能有分參與俄羅斯利用超過 600 艘神秘油輪出口石油至世界各地的行動。報道亦指，香港的空殼公司可能從歐洲購入船隻，或利用即將被廢棄的船隻，服務俄羅斯的出口石油業務，以避免俄羅斯與西方託運人合作。但報道仍未發現上述油輪船隊的經營者和擁有者。



圖片來源: CestLaVibe.com



Reuters 路透社

《路透社》報道，其上海分社主任 Brenda Goh 和駐港記者 Jessie Pang 被盜用身分，在 Instagram 和 Telegram 開設帳號。偽冒者用 Jessie Pang 的香港記者身分，並以記者證和報道為佐證，接觸身在澳洲的異見政治漫畫家巴丟草，試圖套取資料。此舉引起巴丟草懷疑及揭發事件。據報至少三人被假冒者接觸。綜合巴丟草透露的資料和其他媒體跟進報道，除「白紙革命」相關的公民團體被套料外，假冒者亦曾刺探持 BNO 護照且希望在英國參軍的港人消息。

《路透社》亞洲編輯 Una Galani 發表評論文章，指即使疫情過去，中美之間緊張的政治關係仍然阻礙香港復甦。評論引述統計數字顯示，香港適齡工作人口正在外流，認為原因之一是北京干涉香港教育制度和實施國安法。不過文章亦指，有跡象表明，來自亞洲其他地區的專業人士，如中國大陸的金融家和愈來愈多的印度人，將香港視為與其本土市場相比更奢華、更高效的替代品。另一方面，文章亦指香港坐擁新機遇，可將自己塑造成中國投資者投資、追蹤外國指數或公司基金產品的市場，但前提是得到一直擔心資本外逃的北京當局允許。文章指，隨著中美關係惡化，若香港未能遠離西方資本，將處於更加脆弱的位置。 ■

2 - 4 月

流散港人 社群活動紀錄

文／編輯部

儘管離開了香港，但港人毋忘自己的身分，並定期舉辦活動讓更多不同國家的人，知悉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

《如水》作為第一本流散港人的實體雜誌，我們有必要製作一個記載香港流散港人社群活動的列表，記錄上一季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港人活動。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活動，我們都希望能為港人留下見證，作為歷史的一部分。由於港人在全球舉辦的活動眾多，因此《如水》只能訂下以下幾項原則，作為紀錄：

- 須由香港人舉辦，或是以港人為主要對象；
- 涉及與港人公共利益相關；
- 必須是在香港以外地區舉行的實體活動；以及
- 容許公眾參與。

今期《如水》整理了 2023 年 2 月至 4 月期間舉辦，且符合上述條件的活動，總共有 58 項，遍布 9 個國家共 63 個城市。我們亦誠邀各位一同成為記錄者。特別是活動主辦單位、參加者，請不吝將你們所知的活動，用圖中的 QR code 向我們報料，只要能記載的，我們都會盡力記載。



港人流散
活動報料
←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紅磚危城》放映 University of Ottawa	2 月 3 日		Canada	Ottawa	-
Community Forum 社區共融論壇	2 月 4 日	3 月 5 日	UK	Belfast Manchester Southampton Edinburgh Derby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 與多倫多港人對談	2 月 4 日		Canada	Toronto	Toront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re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Copenhagen Milk Tea Festival 2023	2 月 4 日		Denmark	Copenhagen	Copenhagen Milk Tea Festival Demokrati Garage Støt Hong Kong 支持香港 Support Hong Kong
Discussion on Hong Konger's Hybridity of Identity	2 月 6 日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Hong Kong Public Affairs & Social Services Society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就業工作坊： 專為香港人而設	2 月 11 日	2 月 21 日	UK	Tunbridge Wells	-
雙島 A TALE OF TWO ISLANDS —— 台港文化交流日 Hong Kong X Taiwan Fair	2 月 11 日		USA	San Leandr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Hong Kong Affairs Association of Berkeley Artual Club US Hongkongers Club 美國香港人會館 Hong Kong In San Francisco & Bay Area 舊金山灣區香港人
「不割席」 紀錄短片放映會 X 社區對話	2 月 11 日		Canada	Richmond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Book Talk "Hong Kong RIP" with Simona Mohamsson	2 月 11 日		Norway	Oslo	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憂鬱之島》電影放映	2 月 12 日		Canada	Ontario	-
香港本色 Black Bauhinia 電影放映會及導演對談	2 月 13 日		UK	Edinburgh	-
「香港出路」會議	2 月 19 日		Australia	Sydney	Aus-HK Connex 港人匯坊
關注「47人初選案」 街站	2 月 19 日		Canada	Vancouver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香港人職業展覽 + Potluck 聚會	2 月 25 日		Canada	Toronto	Toront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re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反對中國海外警署」行動 (溫哥華)	2 月 25 日		Canada	Vancouver	Hong Kong Defense Initiative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憂鬱之島》電影放映 (Q&A with Director Chan Tze Woon in Person)	2 月 28 日		USA	New Haven	-
「偉大工程」#1 - 由細洗到大	3 月 4 日		USA	Fremont	Artual Club
HONG KONG MARCH 香港三月文化節系列活動	3 月 4 日	4 月 16 日	UK	Birmingham Brighton Bristol Bury Cardiff Edinburgh Exeter Glasgow Leeds London Manchester New Malden Newcastle Nottingham Reading Sheffield Solihull Southampton Surrey Sutton Swindon Tenby Trowbridge Tunbridge Wells Wakefield	Hong Kong Umbrella Community 香港協會 Hong Kong March
Hong Kong Mixtape 放映	3 月 10 日	3 月 11 日	UK	Glasgow	-
香港本色放映會	3 月 11 日		UK	Sutton	Sutton Hong Kong Culture & Arts Society
2023 North west programme launching day	3 月 11 日		UK	Manchester	Hong Kong Student Alliance CIC
對話王丹	3 月 11 日		USA	Fremont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Hong Kong Affairs Association of Berkeley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Stockport 香港人就業資訊會	3 月 17 日		UK	Brinnington	-
《香港本色》 電影放映	3 月 17 日	3 月 23 日	Canada USA	Toronto New York	Montreal Hong Kong Taste 滿地香港味
倫敦、多倫多聲援 香港政治犯集會	3 月 18 日		UK Canada	London Toronto	-
「釋放政治囚犯」 燭光集會	3 月 18 日		Australia	Sydney	港人匯坊 Aus-Hong Kong Connex Page
2023 自由路上藝術節	3 月 18 日		Taiwan	Taichung	-
錦鯉有咩高見？新 港式 Open 啟 Forum	3 月 18 日		Taiwan	Taipei	Hong Kong Outlanders 香港邊城青年 再聚 Reunion Place
香港電影節 (英國) 2023 · 香港與香港 的距離	3 月 18 日	3 月 31 日	UK	London Manchester Bristol Nottingham Birmingham Cardiff Edinburgh	Hong Kong Film Festival UK
《因為愛所以革命》 電影放映	3 月 19 日	4 月 30 日	UK USA	Chester Birmingham Philadelphia Seattle	Hong Kong in Chester - HKIC Philly4HK HKG movie PHL SEArious For HKG 西雅圖香港民主監察小組 港匯映 KONGcentric Lamp Of Liberty
Support Chow Hang Tung & HK 47	3 月 22 日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 Capital Hong Kong Association 澳洲首都香港協會
The Fight for Human Rights &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 Forum for Activism	3 月 24 日		UK	London	-
《窄路微塵》 電影放映	3 月 24 日	3 月 25 日	Australia	Melbourne	Victoria HongKongers 澳洲維港
多倫多香港人社群 中心 3 月份聚會 - 求職工作坊及招聘 攤位	3 月 25 日		Canada	Toront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和你學習～英國政府架構及政治制度學習日	3 月 26 日		UK	Birmingham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Overseas Hong Konger City Forum 海外港人城市論壇	3 月 26 日		USA	New York	HKDC -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US
黎智英紀錄片 The Hong Konger 放映會	3 月 29 日		France	Lyon	Le Comité pour la Liberté à HK (CLAHK) 香港邊城青年
「走了，還可以 流散港人自述」分享會	3 月 30 日		Taiwan	Taipei	Hong Kong Outlanders 香港邊城青年
學中文 (聽說讀寫) 識文化 大坑舞火龍 中文工作坊	4 月 1 日		UK	Warrington	Global Kids 港講廣
《時代革命》周冠威導演 倫敦映後談	4 月 2 日		UK	London	-
曼徹斯特 兒童發展課程	4 月 4 日	4 月 15 日	UK	Manchester	Bonham Tree Aid 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
政治暴力在中國及 香港講座	4 月 8 日		Taiwan	Taipei	The 29 Principles
VAHK 溫哥華手足一 「私人放映會」：「少年」X 「外國代理人」諮詢問卷填寫	4 月 15 日		Canada	Richmond	Vancouver Activists of Hong Kong 溫哥華手足
初選無罪 - 聲援香港 47 人案聯合行動	4 月 15 日	4 月 23 日	UK USA Australia Taiwan Canada Netherlands	Birmingham Bristol Edinburgh Leeds London Manchester Nottingham Reading Sheffield Sutton San Francisco New York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Perth Taipei Vancouver Halifax Calgary Toronto Amsterdam	全球多個組織

活動	日期 (開始)	(結束)	國家	城市	主辦單位 (香港相關)
抗議許正宇 到訪集會	4 月 17 日		UK	London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格拉斯哥 華語團契 暨《難民拒絕法》 簡介會	4 月 21 日		UK	Glasgow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英格蘭東南部社區 共融論壇	4 月 24 日		UK	Wokingham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How Hong Kongers can get involved in civic activities: panel and Q&A 《香 港人如何參與公民 活動》研討會及問 答環節	4 月 25 日		UK	St Albans	Hong Kong Watch 香港監察
罩住香港九五九日 ——記錄城市街道 上九百五十九天口 罩蒙面日子的攝影 展	4 月 27 日	5 月 21 日	UK	Birmingham	Be Water HongKongers CIC
銀幕 · 香港電影節	4 月 28 日	4 月 30 日	USA	Los Angeles The Bay Area San Diego	Hong Kong On Screen
「偉大工程」#2 - 偽史洗腦術	4 月 29 日		USA	Fremont	Artual Club
市議員和你傾 + Potluck 圍爐	4 月 29 日		Canada	Toronto	Toronto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re 多倫多香港人社區中心
「乜嘢係香港 ?」 座談會	4 月 29 日		Canada	Markham	Hong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The Points 楼角
大逃港 全球港人社群的下 一個十年 論壇	4 月 29 日		Canada	Toronto	Canada-Hong Kong Link 港加聯
《時代革命》伯明 翰放映會 及 周冠威 導演映後座談會	4 月 29 日		UK	Birmingham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英國議會選舉制度 座談會	4 月 29 日		UK	Nottingham	Hongkongers in Britain 英國港僑協會
愛丁堡迎新工作坊	4 月 29 日	7 月 8 日	UK	Edinburgh	Scottish Hongkongers 蘇格蘭香港人
曼城週日福音主日： 周冠威導演與你	4 月 30 日		UK	Manchester	Good Neighbour Church England 英倫好鄰舍教會



2/2023 - 4/2023

香港研究進展

文／編輯部

今期香港研究進展聚焦於 2023 年 2 月至 4 月期間刊登的文章，包括與反送中運動相關的概念、香港與其他城市的關係，以及城市自身的文化產物。

在反送中運動中，不少示威者都會揮舞各式各樣的旗幟，當中包括殖民時期的港英旗。此現象引起部分學者關注，思考為何香港示威者會以前壓迫象徵（former oppression）的龍獅旗（Dragon and Lion flag）作為 2019 年爭取民主、權利和自治的旗幟。*Can a colonial flag become a banner for democracy? The Case of the Dragon and Lion flag and the 2019 Hong Kong protests* 就試圖解釋，揮舞旗幟時，會產生非線性的時間（non-linear temporal）以及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換置，同時引起對於香港核心價值觀、國家主權和文化認同的矛盾解釋。而旗幟本身以及其換置（displacement）則代表了香港這座城市對過去的不安、現在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

亦有文章分析黃色經濟圈，指出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被廣泛認為與公民及政治參與有關。過往大多研究都是著重於黃色經濟圈與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的關係，指出這是一種新的政治參與，而 *Digital activism and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yellow" food influencers and political consumerism in Hong Kong* 一文則以另一角度出發，透過訪問 KOL 及分析社交媒體上的帖文，希望瞭解在後社運時代中 KOL 與消費者的關係。研究指，光顧黃店的意義由表達支持變成一種集體抗爭的回憶保存，是表達香港人身分的一種新手法。在民主運動無法再如以往進行的時候，這是實行民主價值的另類方式。

An Alternative Macanese Public Sphere: Discussing Portuguese Macau's Problems in British Hong



龍獅旗在英國港人集會飄揚 | 《如水》資料圖片

Kong 一文則討論澳門與香港兩地之間的連繫。1840 年代第一批澳門移民來到香港，所反映的除了葡萄牙殖民政府對澳門的高壓統治。澳門人在英屬香港找到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來討論澳門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並且可以遠離嚴格的新聞審查制度。研究透過探索澳門傳媒人如何在英屬香港挑戰葡萄牙政府的政策和行政不善，分析英國對其亞洲殖民地的新聞控制情況，並且展示跨種族流散社群的活動，如何促進了香港和澳門之間的互動。

香港是世界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有限空間下，建築物普遍以垂直方式發展，*The Vertical Street as Everyday Place in the High-Density City: A Case Study of Mong Kok, Hong Kong* 一文以旺角作為對象，利用敘事式城市漫步、空間調查、實地觀察和訪談的方式，發展和推論「垂直街道作為日常場所（vertical street as everyday place）」這個概念。研究發現，垂直街道的類型形式（type-form）是一個在城市中垂直延伸的多層次及分段式空間，並且是一種日常場所，容納了各式各樣的城市生活。文章最後指，研究結果可以為城市規劃帶出新的角度去思考街道，並且可以推廣垂直式城市的宜居性。

Chinese Killer King: trespassing the boundaries of crime fiction and Cantonese literature 聚焦三十年代的作家、導演，任護花（Yam Wu-Fa / Ren Huhua）。任護花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文化人，曾在廣州擔任記者，後來到香港創立報刊《先導報》及《紅綠日報》，亦曾以筆名「周白蘋」創作小說《中國殺人王（Chinese Killer King）》，共有約三十輯。研究指，作品挑戰了現今在香港文學和華語文學討論中明顯存在、受地域限制的政治身分，並且探討以



澳門 | 圖片來源: Hwan Hyeok Kim@flickr

「粵語文學」作為批判框架 (critical framework) 來歷史化及理論化粵語性 (Cantoneseness) 及其跨維度的可能性，同時討論了該系列在世界犯罪小說中的定位。

Minoritising process drama for teaching Cantonese to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in Hong Kong 是一份關於以「過程戲劇 (process drama)」教導香港少數族裔學前兒童 (preschoolers) 廣東話的研究。研究旨在重新概念化 Joe Winston 所建立的「過程戲劇」方式，並發現要令少數族裔兒童成為廣東話用者，「過程戲劇」與語言遊戲 (language play) 都需要少數化 (minoritorisation) 及去領域化／再領域化 (de-/re-territorialisation)。

集體回憶反映了城市空間的變遷以及歷史發展，而活化則可以保存集體回憶。*Different Pattern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Cases of Columbia Circle and the Blue House Cluster* 一文以上海的「上生 · 新所 (Columbia Circle)」以及香港藍屋作為研究對象，運用了比較研究、調查和文獻研究三種方式，去比較兩者在活化及對保存集體回憶的不同之處。此研究提供了嶄新視角，分析制度與文化遺產活化之間的關係、文化遺產如何套入合適的現代化用途和相關用途，以及集體回憶如何透過活化而得以保存。

Performativity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art: the case of Hong Kong Atlas 一文透過分析一個把董啟章《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視覺化的新媒體藝術項目，瞭解當代藝術中表演性 (performativity) 與符號翻譯 (intersemiotic translate) 的交集。研究希望為視覺及符號翻譯的討論提出新方向。 ■



藍屋 |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Bibliography

Chan, C.S. (2023). An Alternative Macanese Public Sphere: Discussing Portuguese Macau's Problems in British Hong Kong.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51(2), pp.244-264.

Chen, Y. & Lu, S. (2023) Different Pattern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Cases of Columbia Circle and the Blue House Cluster. *Space and Culture*, pp.1-26.

da Silva, F.C. & Rogenhofer, J.M. (2023). Can a colonial flag become a banner for democracy? The Case of the Dragon and Lion flag and the 2019 Hong Kong protests. *Current Sociology*, pp.1-17.

Lam, N.L. (2023). Chinese Killer King: trespassing the boundaries of crime fiction and Cantonese literatur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4(1), pp.36-51.

Mak, V.S. & Poon, A.K. (2023). Digital activism and citizenship: a case study of "yellow" food influencers and political consumerism in Hong Kong. *Food, Culture & Society*.

Poposki, Z. & Todorova, M. (2023). Performativity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in contemporary art: the case of Hong Kong Atlas. *Visual Studies*.

Tam, P. (2023). Minoritising process drama for teaching Cantonese to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in Hong Kong. *Pedagogy, Culture & Society*.

Wang, W. (2023). The Vertical Street as Everyday Place in the High-Density City: A Case Study of Mong Kok, Hong Kong. *Space and Culture*.



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y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 敘利亞媒體對香港記者的啟示

文／Jacky

隨著中國政府不斷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部分傳媒人被迫離港，並在海外成立不同的流散媒體，《如水》為了探討這些流散記者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策略，訪問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VUB）媒體及傳播學客席教授 Yazan Badran——他是一位專注於中東和北非（MENA）地區新聞和政治活動的媒體學者。憑藉 Yazan 對敘利亞流亡記者的研究，是次訪談闡明了流散媒體如何繼續報道原居地的新聞，以及散居海外的記者與各持分者（如海內外讀者）的關係，並從宏觀角度研究區域和全球格局中的流散媒體。

訪問探討了流亡記者如何與原居地保持聯繫和確保報道準確，並深入研究記者使用匿名、透過加密通訊、共享資源及建立信任的方式；還討論流散媒體在國際層面上的協作網絡。Yazan 強調，流散媒體與國際組織保持緊密聯繫的重要性，以及背後的政治考量。

此外，我們也探討了編採過程中，流亡編輯、記者與原居地線人三方的緊張關係。Yazan 認為媒體必須接受某種程度的不信任，三方可以通過會談，令流散媒體對原居地的社會情況有更細緻的理解，他還提到在此過程中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的重要性。

流散媒體在海外運作遠離了原居地的主要讀者群，加上敘利亞長年戰爭且經濟動盪，以致當地流散媒體難有穩定、長遠的營運資金。Yazan 總結出這些媒體現行有三種營運模式，一是如 *Enab Baladi*¹ 依靠多項資助營運；其二是如 *SyriaUntold*²，根據所獲資助金額調整運作規模；其三是依靠單一資助者。但他認為，這些營運方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媒體根本無法財政獨立和維持穩定營運，故迫切需要變革。

Yazan 亦提到流散媒體、收留流亡者的國家和資助者之間的張力。這通常會導致流散媒體迫不得已作出妥協，或與理念不一的組織合作。例如一些流亡敘利亞的媒體人，因依賴土耳其的居留許可和媒體營運資金，故對該國政府囚禁當地記者的惡行噤聲。

此外，Yazan 深入探討了媒體銜接更大語言文化圈的文化政治，例如敘利亞媒體應如何觸及更廣大的阿拉伯世界讀者群，以及將文章翻譯成不同語言和文化交流的價值。通過比較和參考庫爾德和敘利亞媒體的經驗，他強調與更廣大讀者群接觸的重要性。他還說到，雖然理解港、中問題矛盾嚴重，但認為香港流散媒體與敘利亞媒體均需要進行雙語出版，以便吸納更廣泛的受眾，為不同的觀眾服務，這樣才可以避免固步自封和產生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憑藉敘利亞記者的經驗，Yazan 為在中國權威陰影下堅持報道的香港流亡記者上了寶貴一課。

¹ *Enab Baladi* 是 2011 年在敘利亞 Darayya 成立的非營利媒體，以阿拉伯語和英語出版。

² *SyriaUntold* 為 2012 年成立的敘利亞阿拉伯語和英語網絡新聞平台。

Q : 《如水》雜誌 A : Yazan Badran

註：本次對話經過編輯和重組，以便讀者閱讀。

資料收集和協作網絡：流散媒體的基本戰略

Q : 海外記者如何與原居地保持聯繫，以收集並核實準確的新聞材料？

在敘利亞，不同勢力零散地控制部分地區，並無統一的政權，流散媒體仍可在部分地區接觸到國內的記者。然而，受政府控制的地區是最危險的——記者在這些地區採訪時，須透過特定的人際網絡來保持訊息流通，亦須符合最高安全要求。而在完成採訪及撰寫新聞後，他們則會利用高度加密方式，把資料、報道傳送到境外；也會嘗試入境黎巴嫩等附近國家，與所屬的敘利亞流散媒體見面溝通。當然，他們發布報道時亦會保持匿名。

另一方面，亦有記者認為，其所做的報道不完全涉及政治，風險較低；或者身處在反對派或庫爾德人控制的地區，相對沒那麼危險；但無論你做甚麼、說甚麼、報道甚麼，都還是有一定限制。儘管如此，國內記者其實仍可以通過某些方式獲取新聞材料，並透過特定的人際網絡保持訊息流通，即使這是非常困難、成本很高，而且行政上很複雜。

敘利亞的流散媒體，在海外或會有一個實體的新聞編輯部，但主要以一種網絡分布式新聞室來運作。通過與不同地方的協作者共同製作報道，你能夠獲得與你沒有直接聯繫的消息來源。從國內獲取資訊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每間媒體旗下有自家記者或特約記者；另一種，則是不同流散媒體之間互相交換資訊。但是，建立關係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同媒體需要有互信，才可保護國內的消息來源。



Q：你能不能詳細介紹這個流散媒體互助網絡？

那是相當有趣的。就敘利亞來說，有大量人口外流，特別是記者、媒體及社運人士，外流的敘利亞人以往主要聚居在土耳其，但隨著人們分散到其他國家，現時當地的敘利亞社群比較零散，不過，當地仍聚集了很多來自敘利亞的流散媒體，而不同的小型媒體有逐漸合併、整合的趨勢，以謀取更大生存空間。

敘利亞的新聞工作者不僅會有流散媒體組織的網絡，還會有流亡記者工會來保護記者。除了記者工會，你也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編輯工會。這些組織會有一個道德約章，作為行規自我規管。雖然這並不完善，而且相當官僚，時至今日都沒有最終定案，但這些組織提供了一個渠道，讓讀者投訴媒體的不當行為和內容，並提供了建立互助網絡的基礎。我記得若干年來，每年都有一個有關主編、記者、媒體員工和從事敘利亞媒體研究人員的會議，這使得媒體之間，有另一層非正式的網絡和互信。如果單就敘利亞流散媒體從業員而言，他們對彼此相當瞭解，而且十分信任，所以他們之間才會交換消息。

不過，無論他們在正式、非正式層面關係多友好，會尋求合作的渠道，但在不同媒體之間難免存在競爭，爭奪更多受眾、點擊率及贊助，這也造成傳媒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衝突。

流散媒體的財務策略：公共服務和多樣化的資金

Q：流散媒體面對遠離原居地的讀者群，同時在海外面臨許多政治上的限制，該如何保持可持續、穩健的財政來營運？

敘利亞流散媒體不僅與主要的讀者群有距離，而且還面臨原居地的戰爭狀態，因此他們的潛在讀者大多都是難民，一無所有，根本無法用金錢去支持這些媒體，導致這些媒體有一種經濟上的錯位。故此，媒體唯一能依靠的資金來源，就只有資助，並把自己當成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媒體，以公共服務為使命。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大多數的敘利亞流散媒體，或者說最成功的媒體，都不會將其定位放在商業化的私營媒體模式，在一個不存在的市場上追逐廣告，而是試圖轉變自己的心態，肩負一種公共服務的使命。

在實際層面，你會發現大概自 2014、15 年以來，敘利亞媒體獲發的資助遭大幅削減，以致可用的財政資源更為緊絀，還導致許多媒體倒閉或被迫合併。現在這些媒體的財政有三種主要模式：一種是像規模舉足輕重的媒體 *Enab Baladi* 這樣營運。根據我上次的調查，他們大約有 50 至 60 名全職人員，包括記者、編輯和行政人員；他們的資助模式，是將風險分散到許多不同的資助者，從幾個媒體發展組織獲得結構性資金。在此基礎上，他們還會申請用於短期項目、目標的項目資助。*Enab Baladi* 通過多樣化的資助來避免過分依賴單一資助者的資金，以降低財政風險。除此之外，他們也通過眾籌集資，因此在短期到中期，能保持穩定營運，但要建立長期計畫或者擴張則甚具挑戰。這一類型媒體被困在相同的資金水平，來回上下，無法與在財務上與資金更充足的私人媒體競爭。

除此之外，*SyriaUntold* 的做法也可作參考，就資金水平而言，它是一個規模小得多的媒體。只有 3 名全職員工，大部分資金用於委約文章，使其在架構上更加靈活，只要當月有多少資金可以運用，就出多少篇稿。然而這種模式還是會有缺點：一旦缺乏資金，營運隨時就面臨中斷。

流散媒體還有第三種模式營運，即嚴重依賴單一資助者。某個敘利亞的大型流散媒體可能依賴一個基金會的巨額資助，在未來兩年，資金或許充足，但之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NEW
IN
SIGHT

爭取流散群眾支持營運資金

現在，距離敘利亞難民大出走已大概十年。我認為，當時出走的民眾，正在過渡到一種半離散（semi-disapora）狀態。這種狀態的意思是，早已定居在別國的敘利亞移民（migrant），和正在過渡成移民的流散（disapora）敘利亞民眾漸漸聯繫起來。對我來說，流亡（exile）和移民之間是有區別的——流亡有更明顯的政治成分，並且以原居地為導向；而移民則是生活在夾縫中，他們可能面向原居地，但同樣也可能面向移居地，他們在這兩個地方都有人際關係網絡，並在兩個地方、在敘利亞人和移居地居民兩個身分之間流動轉換。

對流亡媒體來說，其中一個挑戰是在某種程度上轉向半離散狀態，需要服務已移民的受眾，因為他們具有更高的社會和經濟資本累積。如果流亡媒體僅面向原居地，當要融入移民圈子，並透過他們籌集資金就會甚為艱難。流亡群體過渡到半離散狀態的轉變，可能會使流散媒體接觸到更多有經濟能力贊助媒體的已移民受眾，為媒體提供一條商業道路，作為資助模式的一種替補方案。



流散媒體的資助與潛在的國家干預

Q：如您所述，流散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資助。這是否為實踐新聞道德帶來任何挑戰？

我們基本上是討論國家機構提供的資助。這意味著，在多個層面上，送出資助的國家，可能會干預高度敏感的政治和文化領域。在某種程度上，資助總是與外交政策相關。這是流散媒體必須疏導的一個基本難題，既然要依賴資助，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受到出資者（如美國）的外交政策限制或約束，同樣也受到接收流亡者國家的政治影響。

就敘利亞的情況而言，許多敘利亞媒體在土耳其流亡運作時，可能會因為資金和居留許可等問題，逼不得已跟理念南轅北轍的組織妥協。例如，致力於人權和新聞自由的敘利亞媒體，或被迫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政權結盟，因此必須對土耳其發生的不公義事件視而不見——像是對該政權正囚禁土耳其記者的事件上沉默，以換取政權默許敘利亞媒體在當地營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流亡者的盲點，因為他們對原居地如此固執，而且有政治傾向，他們只能以流亡政治的視角來看問題，且一切以流亡者的利益為先。

客觀性是必要的嗎？

Q：許多流散媒體可能是與原居地政府對立的媒體，或者是倡議型媒體。他們該如何確保這種立場不會損害其客觀性？或者說，是否有必要保持這種客觀性？

我認為，「客觀」一詞，目前在新聞學研究，或者傳統理解上皆面臨重大挑戰。值得質疑的是，對客觀性的要求，是否只是西方（如美國、歐洲）為本的新聞機構營運準則。現時客觀在新聞業已變得不那麼重要。我個人認為保持客觀有其可取之處，但不是在日常運作的層面，而是在概念層面，即我們不相信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存在，而是對事實的多角度觀點保持開放，然後形成一種透明度。對我來說，對於某個記者或媒體的立場保持公開透明，比起所謂「客觀」更加重要。

NEW
[QR]

Q：你提到保持立場公開透明立場的重要性，可以具體闡述流散媒體如何以此解決客觀性問題嗎？

在某種程度上，流散媒體不但面臨客觀性的挑戰，還需面對遠離原居地，在海外做原居地新聞時內容是否可靠的難題。除此之外，在第三世界的記者，難以將社會運動和新聞分割，令其他人更質疑記者的專業身分。例如，埃及的一位記者告訴我，基本的新聞工作比如走上街頭、查證某些事件或採訪某人，如此基本的事情危險程度之高，居然足以使其成為一種抗爭。流散媒體必須付出更多努力，才能獲外界認同他們所製作的是嚴肅的新聞報道，而不是簡單地通過媒體推動社會運動或是黨派政治的延伸。

要做到這一點，除了簡單地做好新聞報道，盡可能準確地報道，並提供多角度觀點外，我不知道還能做些甚麼。而這對流散媒體來說，某種程度上這更加容易做到，因為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不同的觀點和消息來源。

回到客觀和公正性的問題，我認為透明度高於客觀和公正。理想的媒體環境，會在不同議題上，盡可能為你提供愈多觀點。如果你翻閱 10 份報紙，你會不會得到 5 至 6 種不同的理解？不僅僅是正反兩面的觀點，而是議題當中的細節，和流亡記者作為來自某個社會脈絡的人，可以向讀者詳盡解釋事件的背景資料，即使那些觀點可能會偏向個人經驗或其政治立場。只要記者立場是透明的，我更願意閱讀一篇由一位記者清楚、透明地告訴我，他支持香港獨立運動，但有更多層次、更深入的文章，而非一篇由外國記者空降當地寫的無味文章，因為外國記者去了那裡，也只會看到表面。與此同時，我亦可以閱讀另一位記者撰寫的文章，他可以告訴我他反對香港獨立，但為我提供更豐富和詳盡的細節。



在數碼時代保留深度報道的掙扎

Q：您如何看待那些追隨評論型新聞的潮流，採用社交媒体 KOL（關鍵意見領袖）風格來擴大讀者群和獲取訂閱的媒體？

這不僅對流散媒體非常困難，幾乎所有媒體都受到速食文化影響，並試圖跟上這一趨勢。但事實上，他們幾乎從未成功。你也可以在敘利亞媒體中看到這一點。例如，*Enab Baladi* 在 TikTok、Podcast 等平台開設帳戶迎合市場需求，發布短片和懶人包。

我認為某程度上，你必須這樣做。基本上你必須跟隨觀眾的習慣改變，對吧？你必須做到至少與觀眾共享世界觀，並試圖與他們接觸，但這是你唯一應該做的事情嗎？我不這麼認為。這與我之前提出的觀點有關。如果你把自己定位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你可以嘗試迎合觀眾的媒體習慣作出新嘗試，惟主要任務仍然是提供詳盡、深度的報道；所以我認為媒體可轉換其他形式，以接觸更多受眾，但這只是主要任務中的附屬目標。

到目前為止，敘利亞媒體已經與其資助者嘗試通過 TikTok、YouTube 等平台拓展受眾群，然而，出資者所追求的並非只是這種創新。他們資助的是實質的新聞報道，包括日常新聞報道，以及深度、調查報道等。出資者資助媒體的動機，就像資助他們國家的公共服務廣播機構一樣，不論會有多少受眾，這某程度來說是一個時代的記錄。



彌合差距：克服流亡記者與原居地之間的距離

Q：當流亡記者對原居地情況的理解，可能不如當地人那麼準確，新聞報道如何尊重和敏感地考慮到當地的聲音？

這已經很困難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只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你在某程度上會和原居地的人，以兩種不同的軌跡發展。回到敘利亞的情況，當記者離開故國時，他們的消息來源，就是本身已有的人脈資源；他們信任的組織，也是之前已經在那裡的組織等。因此，這種依賴過往消息來源的結構，難免存在有一種偏見。除非你積極尋找新的線人、組織和其他持分者，否則這些舊的消息來源，或者經歷流亡十年後已經脫節，無法反映當地的最新面貌和局勢。

我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你必須接受本地記者和流亡編輯之間，會出現一種緊張關係。譬如身處海外的編輯，未必真正瞭解本地記者的限制，像是公眾對輿論的走向，本地和海外對某個議題的認知及看法存在差異。另一方面，本地記者可能會過於專注於自己的個人經驗，而忽略了更複雜、廣闊的視野。我們在敘利亞經常聽到的一個笑話：如果你想知道敘利亞發生甚麼事，你應該聽巴西電台。因為他們對敘利亞政治發展的消息，往往比敘利亞本地媒體更加準確。我認為你應該要理解及接受這種緊張關係，只有通過各種可行的方式，比如進行深入交流，才能解決這種矛盾。

讓我舉個具體例子：當我在土耳其做實地調查時，有身在土耳其的編輯和身在敘利亞的記者關係破裂，以致整整一個月都停止發布有關敘利亞的新聞。他們關係破裂的原因，是編輯覺得記者的報道太偏頗，這很可能是記者考慮到安全問題，自我審查報道內容而造成。而編採之間要恢復合作，唯一辦法只有雙方再次進行面對面對談，而他們得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尋找一個地方作為第三空間作緩衝。因此，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黎巴嫩和土耳其見面討論，將記者從飽受風險的位置上移開幾天或數周，以恢復聯繫和消減壓力。

流散媒體還可以嘗試一種三角的報道形式，分拆報道的分工，以減少依賴仍在當地的記者，例如整篇報道會有一些只能通過當地記者收集的資訊，如進行實地新聞採訪，但對於其他的資料內容，像是政治事件的背景資料等，你可以讓在外地的記者參考國際報道和訪問專家補充意見，然後將上述三方面的資訊來源，以更細緻的方式互相比對綜合分析。



在風險下進行報道：情感勞動和道德挑戰

Q：你能不能進一步解釋精神層面或情感勞動帶來的緊張關係？

這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不安感，是流亡和仍在原居地的人，在不同背景下必須經歷實際且多層次的不安感。流亡的人必須在流亡中重建生活，並須接受流亡的事實。他們還須重建社交網絡、社會資本等，這些都需要情感勞動。第二點，是他們必須調節自己作為記者的情緒，因為他們的專業身分常常受到質疑和挑戰。流亡編輯亦需要面對在香港或敘利亞境內冒著生命危險工作的記者。你的道德責任不僅是反映他們的聲音，而且道義上你需要承認他們已作出或有潛在的犧牲。

我可以明白有論述指，當地記者或消息來源的聲音需原封不動表達出來。然而，聲音不僅僅是一種表達，也是一種溝通，在反思你在說甚麼、試圖表達甚麼，以及你想用這種表達方式達到甚麼效果，來嘗試觸及甚麼社群。那麼，你怎樣做才能使這種聲音有效傳播？這就是流亡編輯的責任。我認為編輯需要承擔起這個責任，接受當地記者內心所感受到的眾多壓力。我們對此表示同情，但也有責任提供更細緻的報道，並進行核實。正因為當地記者的犧牲是如此之大，且對新聞媒體的工作如此重要，不希望資訊就此被白費，所以編輯須盡力做好上述的所有工作。

Q：記者在報道一些倖存的民間組織時，會否無意中令這些組織招致當地政府打壓？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道德困境？

當你報道一個如此脆弱和不穩定的社會時，你必須計算當中政治和道德的利弊，例如你為報道付出的政治代價是甚麼？這是否值得？作為一個流亡者，你必須作長遠打算。

Q：為了保護仍身處原居地的人員，媒體是否有一些衡量政治代價的標準？

如果我們談論的是保護消息來源，我認為你必須採取最安全的標準，即使只有最小的可能性會危及到消息來源，我認為你在出版前應該三思。至於在政治代價方面，我不知道可以如何劃一標準，這可能需視乎情況而定。

NEW
[QR]

香港和敘利亞流散媒體中的語言張力

Q：您的文章〈羅賈瓦的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 in Rojava*）〉提到，與政黨媒體立場相反的反對派媒體，往往會使用多種語言，特別是阿拉伯語，而不是給予庫爾德語重要地位。參照此例，就華語語系世界而言，香港媒體應該使用甚麼語言發布或出版新聞？我們是否須要與香港社群以外更廣泛的華語讀者建立聯繫？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比較庫爾德媒體和香港媒體的差異，我有兩點可以回應。

一是庫爾德媒體已經有多語言和多種族的受眾。他們在阿拉伯語、庫爾德語、敘利亞古語或亞美尼亞語人士聚居的地區運作。因此某程度上，假若他們不選用這些地方的語言，反而會有一個根本缺陷。第二，是當地有一個更大的阿拉伯公共領域。他們參與其中互動，需要有一定的競爭力。

就香港而言，首先，我想中國大陸如此龐大、資金充足，而且有國家支持，香港媒體不可能通過出版中文雜誌帶來甚麼變化。

但我認為，在另一方面，即使香港媒體只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與華語圈的其他讀者互動，但都有一個基本責任參與這個更廣的公共領域。參與意味著用不同的方言說話、盡可能翻譯多種語言出版。因為一旦你開始翻譯，你就開始在一個不同語言的語法及思考邏輯中重新思考問題，並試圖把它們翻譯成一個不同的範式，同時在該翻譯語言的文化領域中生產知識。在香港，你有責任參與、討論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無論你認為香港應否獨立，香港仍然是大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又例如，無論你認為羅賈瓦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還是敘利亞的一部分。如果純粹按地理條件來看，羅賈瓦是敘利亞區域文化連續體（continuum）的一部分。就像香港不會一覺醒來，就發現自己在海洋的另一邊，它將始終是連接中國大陸。所以我認為，特別是從一個較小地區的角度來看，不斷與鄰近的大地區，或者和更大的公共領域接觸，是非常有意義的。



Q：這可能非常困難，政治上也很敏感，因為討論香港獨立等同從根本上拒絕承認香港與中國屬於同一個連續體。你會如何應對此問題？

我明白，而這是你經常看到的一種邏輯。這種敵對關係只能通過一方同化另一方才能解決，也就是由中國解決；只有當中國以某種方式消失時，你才能感到安全。對中國來說，她們可能會想香港以某種方式消失了，或者香港從未出現作為一個獨立實體的想法。但這並不反映香港和中國矛盾的複雜性。你可從政治民族主義的演繹，說香港和香港人的福祉只能通過獨立來實現，但說成要將這兩個領域之間分離，對我來說會變得難以理解、支持或認為可行，因為這否定了很多兩地歷史沉澱的聯繫。

NEW



Q：如果香港流散媒體用英文和中文雙語出版如何？這是否有必要？為什麼？

這對敘利亞媒體來說已經成為必要，現時大多數敘利亞媒體都是以雙語出版，至少有部分報道是這樣處理。自 2015 年以來，這幾乎成了常態。

你須要從兩方面思考這問題：一方面是你的主要受眾群——敘利亞境內、流散或流亡在外的敘利亞人，你通過阿拉伯語接觸他們；在另一方面，你也試圖觸及不會說阿拉伯語的更廣泛的受眾。這也是接受資助所附帶不言而喻的任務之一。比方說，不管是丹麥、瑞典或美國的納稅人，他們政府支持的基金會共同資助了敘利亞媒體，理應有權閱讀這些媒體出版的內容。

此外，雙語出版也創造了一個有趣的機制，使得有些方面不那麼僵化。原因是假若你把自己局限於一個小圈子內，一個小小的迴音室（echo chamber），人們都說著、深信同樣的事情，你可能只會停留在同溫層，完全隔絕了與自己不同看法或有不同解決方案的人。而英文作為世界通用語言，你可利用它來接觸更多元的受眾，這也是敘利亞媒體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而，我認為香港不同的是，她本來已有大量國際媒體的關注，但用英語出版還是有意義的，因為你必然能以此觸及到更多讀者。如果本地記者用英語報道香港的新聞，或將其報道翻譯成英語，這將是一個有趣或更立體的敘述方式。我認為，用英語報道將變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國際媒體緊貼時事動態，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比如烏克蘭，故對香港的報道或關注減少了很多。用英語報道除了能吸引國際關注，在另一方面，因著中國和香港擁有悠久的移民歷史，有移民第二、三代，用英語出版亦可接觸到更大的觀眾群。這些讀者可能不太傾向與流散族群以同樣的方式思考政治問題，因為他們不是在同樣的條件、文化下長大，可能是在澳洲或美國等地成長，所以他們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構建命題，並以更創新和富有想像力的見解，助香港走出這種困境。

流散媒體在全球新聞業中的角色

Q：流亡記者使用的調查、收集資訊的方法，對全球新聞業界有何啟發？

我不想談論因果關係，但肯定有一些協同效應。你可以看到來自敘利亞或烏克蘭的流亡媒體之間，甚至在戰爭之前已經有合作。開源調查（OSI）新聞自 2014 年開始發展，這種調查方式可能借鑑類似流散媒體的報道方法。流散媒體也是外國媒體瞭解當地情況的其中一個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開源調查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合作模式，就是他們可以共同組成調查團隊。這是你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流亡記者的合作中，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因為在調查中，你需要瞭解本地情況及複雜社會脈絡的人。例如你正在查看香港某個街道的地圖，作為本地人，對當地有既定認知，自然能夠更熟練地看懂地圖。同一道理，這種對自身環境的熟悉，有助調查更容易得出一些結論或找到證據。

另一方面，大規模調查新聞的組織與流散記者也有很多合作。例如巴拿馬文件的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告項目（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這是一個全球調查記者網絡，人員分布全球。對於專制獨裁國家，記者可能無法在這些國家內自由行動，這時候主要的資訊來源就是流散媒體，他們作為當地和國際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發揮著重大作用。由於流散的狀況，流散媒體需要先進的技術，才能和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團隊營運媒體。流散媒體的整個編輯部呈「網絡分布式」。而這種網絡分布式新聞室，就是新聞業界中的一種創新實驗。我想，作為一個新聞研究者，你會發現這些創新的新聞工作手法最終會進入主流和精英新聞室。

新聞業的等級制度

Q：能否談談流散媒體在國際媒體生態中帶來的影響？

流散媒體在國際媒體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仲介角色，現在國際記者與流散媒體之間已經建立了緊密的網絡。例如，前往土耳其報道敘利亞的國際記者，會利用在流亡土耳其的敘利亞記者的專業知識及人際網絡。這創造了一種授予流亡記者認受性（legitimacy）的渠道，使這些流亡記者的工作得到認可。但這仍然是相當階級分明的，如《紐約時報》記者在一般定義上，總比當地記者更具認受性。讀者和新聞界皆認為，這些外媒更可靠、新聞內容更真實，即使他們所發布的所有數據和信息，通通都是從當地記者中獲得的。現實地，這就是流散媒體在大多數情況下扮演的角色。



Q：你認為香港媒體是否應該更積極參與這些開源的調查性新聞網絡？這是否有助他們制定長期和作更具策略性的發展？

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對於任何流散媒體而言，你除了需要與所在國家的主流媒體保持緊密聯繫，但也需要與國際或跨國組織保持溝通，因為它們是更為友好的避風港。與美國或英國等地的主流媒體相比，這些國際新聞業界聯盟內部更理解流散媒體所面臨的流動性、困難和不穩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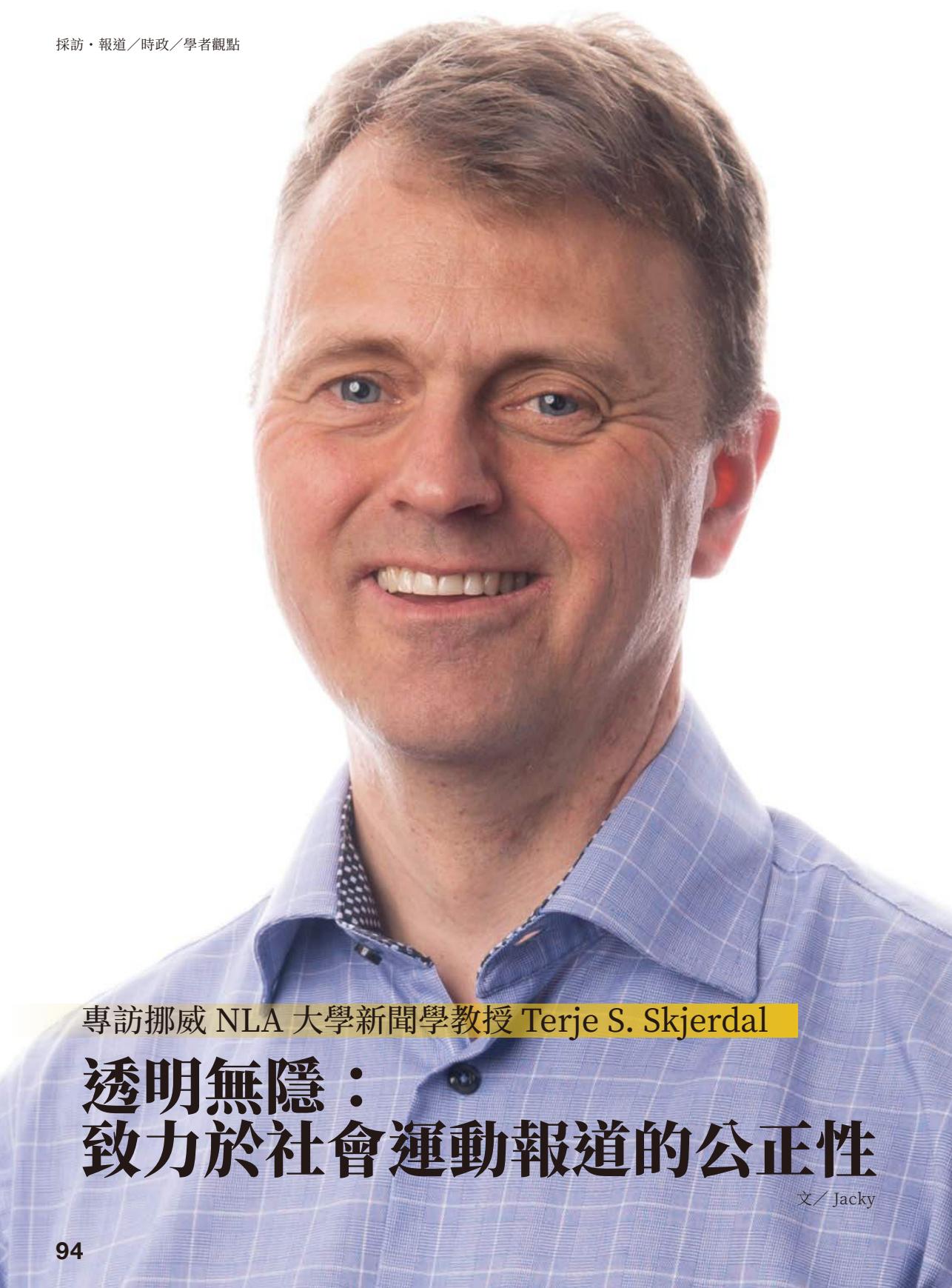
Q：你能否詳細介紹這些跨國組織如何賦予流亡記者力量？

例如，在歐洲記者聯合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或其他類型的記者工會，有一個敘利亞流亡記者聯盟作為觀察成員，因為原先擁有會員資格的敘利亞記者聯盟現在已經受政權控制。流亡記者一旦能進入這種體制結構，就會使流亡記者整體更具認受性。實際上，這亦令他們更容易申請記者證，允許他們在國際間穿梭和開展調查工作。

還有一些與就業和合作相關的例子：有一些主流、國際或地方媒體與流亡記者合作報道他們原居地的新聞。只是，這些例子很少，也不是常態。顯然，語言是一個隔閡，甚至有時候，工作流程也存在很大差異。此外，國際媒體在潛意識裡，可能不把流散記者當作真正的記者，就如剛才所提及記者認受性的等級制度。

另有一些更有趣的合作，是在大型媒體和媒體聯盟機構的層面之間展開，比如共同出版、建立聯合小型新聞室等實驗。*Enab Baladi* 之前與丹麥一間主流報紙進行了一次實驗，並將它變成一個眾籌活動：他們共同創建一個新聞室，在一周內專門報道敘利亞的新聞。或者以《衛報》基金會為例，他們主要透過資助其他媒體為《衛報》開發內容，從而促成一些合作。但同樣地，這絕不是常態。而最主要的衝突在於流散記者往往被視為「幕後工作者（fixer）」而非真正的記者。■





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 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

文／Jacky

自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以來，媒體與香港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記者報道運動的道德基準，一直都是具爭議且值得討論的議題。比如說，記者是不是「抗爭者的一分子」？

為闡明這個問題，《如水》訪問挪威 NLA 大學（NLA Høgskolen）新聞、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Terje S. Skjerdal —— 他是一位專注非洲離散民族的新聞專家。訪談中，我們論及記者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保持獨立和客觀的重要性，以及在威權政權下維護新聞專業的挑戰。

Terje 提到，新聞媒體在當今許多社會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也指出，如今的傳統新聞媒體，與其他類型的網絡和混合型媒體（如社交媒體）之間愈來愈難區分。

因為傳統新聞媒體的核心標準之一是公正、公平地呈現不同觀點。然而，網絡媒體的興起挑戰了這一理念，各種媒體開始參與政治議題和社會運動。Terje 強調，現在新聞業客觀性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到質疑，記者們亦對他們應該擔任何種角色無一致共識。

對於社運媒體（activist media），Terje 建議，應按正當性（legitimacy）將它們加以區分。不過，他也理解，在某些情況下，比如一個地方的社會受到全面打壓，記者介入並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是合理的。只是，當一個媒體機構的主要動機僅僅是推動特定政治理念，那它就不再算是「新聞媒體」。

隨著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不斷演化，記者報道社會運動的道德標準也必須相應調整。Terje 在本期《如水》雜誌的專訪，為記者現時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如何在有爭議的情況下保持獨立和客觀，提供了寶貴的觀點。

Q : 《如水》雜誌 A : Terje S. Skjerdal

註：本次對話經過編輯和重組，以便讀者閱讀。

社運時代的新聞工作：客觀性和公正性

Q : 新聞媒體能否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

新聞媒體不僅可以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有時發揮的作用還相當重要。雖然現在我們愈來愈難區分傳統新聞媒體，以及其他類型的網絡和混合型媒體，如社交媒體，但傳統新聞媒體在報道重大新聞事件方面，還是比社交媒體更為可靠，且受到重視。因此，傳統新聞媒體仍然相當重要。

Q : 正如你所說，新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那他們可以如何在報道中保持客觀，或者這是否還有必要？

對於這個問題，眾說紛紜。新聞業的傳統理念是公正性，意味著記者應該公平地呈現不同的立場。但是在過去 20 年裡，隨著網絡媒體興起，我們看到各種媒體機構直接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因此，新聞業的客觀理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質疑。我訪問過一些受到原居國政府打壓的流亡記者，他們對於新聞規範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些人堅持公平和平衡的傳統價值，認為新聞需要呈現不同立場；但也有記者認為，新聞機構可以參與社會變革並作出更多干預。所以，記者們對於他們應該擔任甚麼樣的角色，已經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了。

Q : 那麼倡議型媒體呢？他們如何有效地保持客觀性？或者對他們來說有必要嗎？

這我也想知道。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能需要區分新聞從業者的行為是否真正當性。但涉及一般的民主議題，尤其在世界各地專制政權不斷增多的背景下，媒體機構推動社會進步是合理的。這是新聞業使命的一部分，我認為記者不應害怕積極參與推動民主。但是，如果媒體機構或個別記者在每個政治問題上都表達立場，那就變得有問題了，這將令新聞撕裂讀者，而非為大眾提供信息和團結讀者。



Q：根據您之前的研究，埃塞俄比亞的記者和社運人士在界定他們的角色時面臨挑戰。《如水》也是一家有社運背景的媒體。一個社運人士如何同時運作媒體？他們如何避免成為您提到那種撕裂社會的媒體？

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堅持傳統的新聞標準。如前所述，其中一個核心標準是公正性。我們需致力公平地呈現不同立場人士的觀點。我還認為，應該小心不要讓媒體充斥著評論。我建議社評外，媒體需要包含各種類型的新聞。任何嚴肅的新聞機構都應該有一定版面的時事報道。深度新聞也應該有一席之地。此外，明確區分報道和評論至關重要。

現在，嚴肅傳媒和社運媒體其中一項共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自己的新聞報道，與網上和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明確區分開來。嚴肅傳媒應有一些認證機制，將新聞與 Facebook 或 WhatsApp 等平台上流通的資訊作出區分。另外，為新聞報道提供相關社會脈絡亦十分重要，傳媒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拋出大量意見。

另外，我想強調從現場獲取可靠資訊的重要性。如果是一家由身處不同國家記者供稿的流亡媒體，應盡力了解原居地的情況。它需要收集影片、圖像並與在國內觀察事件的人確認資訊。否則，流亡媒體可能會出版與當地情況脫節的新聞故事。

Q：對於倡議型媒體，他們在社會運動中通常具有雙重角色。他們能否在報道抗議等政治活動的同時參與其中？

首先，如果媒體的主要動機是宣揚特定政治議題或代表特定政治立場，那麼我認為媒體需要公開這一點。他們需要保持透明，盡量不隱藏自己的意圖。我認為公開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是合理的做法。

其次，對於純粹的社運媒體，如果它唯一的動機是帶來改變、干預或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我對它能否稱之為專業新聞機構有所保留。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與傳統新聞學所定義的新聞，是不同的東西。雖然，在當地社會完全滅聲，當局粗暴打壓言論自由和任何異見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做法。



Q：您提到時事評論的主導地位，這可能是由於社交媒體生態中，受訂閱者偏好驅動的演算法經濟所造成。特別是在社運或流亡媒體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的情況下，這一現象如何挑戰新聞業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

在過去 20 年，媒體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顛覆了整個媒體環境。它變得充斥著各種評論，而且有些觀點非常強烈，有時甚至不合理。大部分內容只是人們的即時感受。我對這種發展趨勢保持警惕。認真專業的媒體需要通過提供另一種新聞內容來應對這種狀況，在報道中描述社會脈絡、尋求理解、挖掘知識，並提供在地的可靠資訊。他們不應以謾罵的方式來報道新聞，而應該努力理解彼此。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專業媒體不應追求速食的標題黨新聞，而是去深入探討問題。



解決資金來源涉政治動機的方法：透明度

Q：我們談到媒體機構在經濟上的生存問題。一些流亡媒體可能依賴資助來運營。這些資金來源經常直接或間接、鬆散或隱晦地與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應該如何定位並保持客觀性？

在我看來，媒體應該盡可能地保持客觀性。以東非為例，在我的研究中，我試圖找出一些東非流亡媒體的資金來源，但他們通常都不願透露。儘管顯然，其大量資金來自特定群體，就非洲的情況而言，這往往與他們的族裔有關。對於香港流散群體來說，部族不是一個問題，但透明度是關鍵。媒體應盡可能公開資金來源。否則，觀眾會有許多猜測，這並不理想。

Q：為了進一步闡述政府與媒體機構之間的張力，讓我舉一個敘利亞的例子。有些流亡的敘利亞媒體在土耳其運營，他們有時需要對土耳其政府壓迫當地記者保持沉默，因為他們需要當地政府的默許才能留在土耳其。您如何看待流亡媒體在上述情況所面臨的道德困境？

嗯，當涉及敏感政治議題時，任何新聞報道總會有一些前設，當中可能涉及安全問題。除非你冒著風險，否則有些議題你根本無法公開談論，還有一些批評可能出於其他因素而難以發表。但我認為需要思考的是，誰提出這些批評？有沒有其他人能發表這些批評，而所冒的風險會較小？您可以選擇與其他人分享消息來源，讓處於更安全位置的人提出實際的批評。



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是獨立還是集體？

Q：在 2019 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中，許多媒體被示威者視為抗爭的一部分。記者應如何在社會運動中作出定位？

我們一開始討論了保持獨立、公正、公平地呈現不同立場觀點的重要性。然而，這並不意味媒體不能採取立場，或站在抗議者的一方。如果社會上的資訊完全向一邊傾斜，那麼這個時候，媒體需要站出來解決這種意見極度不平等的情況，並參與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媒體對示威活動僅作平淡報道，反而是不公正的。但我仍然認為，最有力的新聞通常是那些嘗試如實地描述事發時的報道。除了簡明扼要描述引發抗議活動的可怕社會情況外，無需加鹽添醋。

Q：在香港，有不少案例，是當局利用新聞媒體影片作為起訴民主抗爭者的證據。在社會運動中，記者是否應該避免在報道中暴露抗爭者的面孔，甚至不報道可能招致法律風險的抗爭者行為？

自 2019 年以來，甚至更早之前，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嘗試控制輿論的大外宣運動。作為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他們利用媒體影片證明其立場合理。當媒體意識到自己的報道被濫用時，這可能會成為一個難題。但我會反問一個問題：人們被逮捕，是因為這影像被專業媒體曝光，還是因為它們被其他類型的媒體曝光，例如社交媒體上的帖文？一個媒體機構可以承擔的責任也是有限的。雖然，媒體機構應對自己的影像以及所發表的內容承擔責任，但是，就算一間媒體確實有做某件事，他們也未必會是唯一一間。此外，媒體還需面對時間壓力。在某些抗議活動，新聞壽命相對較短。如果你等到第二天才報道，其他媒體早已把消息報完了。所以，如果你花太多時間思考報道會否暴露某人的身分，你就會錯失整個新聞故事。

不過，當然，如果某個人會因為參與抗議活動而面臨被逮捕的風險，我不明白為什麼媒體不能將其臉部打馬賽克。這在某些時候是完全合理，甚至是必需的，而且並不需要花很多時間。這是為了保護個別抗爭者的安全。

Q：除了影片外，在香港有抗爭者因媒體直播時暴露了其身分，並拍攝到他們攻擊警察的行為而被捕。那麼媒體是否應在社會運動中進行直播？或者他們應該選擇直播甚麼內容？

我明白，倘若當局試圖利用媒體進行逮捕或追捕某些抗爭者時，問題可能會十分複雜。我充分理解這一點。然而，如果媒體自我審查到因此不能報道某些事件，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這是有問題的，因為你實際上沒有展示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有示威者攻擊警察，肯定是有背後原因；而真正的挑戰在於，媒體能否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社會脈絡。街頭抗爭實際上並不平等，因此，呈現社會脈絡變得非常重要。另外，不報道事件也是有問題的。在我的研究中，我遇到了索馬里的一些例子，那裡的媒體決定不報道暴力事件，以避免報道或會引發進一步暴力，但問題是，如果媒體試圖隱瞞正在發生的事情，觀眾就對媒體失去信心。為了維持媒體所依賴的公信力，媒體還是需要揭露正在發生的事情。

Q：有時，記者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也可能會有著多重角色身分，例如社運人士從事記者工作。那麼他們應該如何避免報道中有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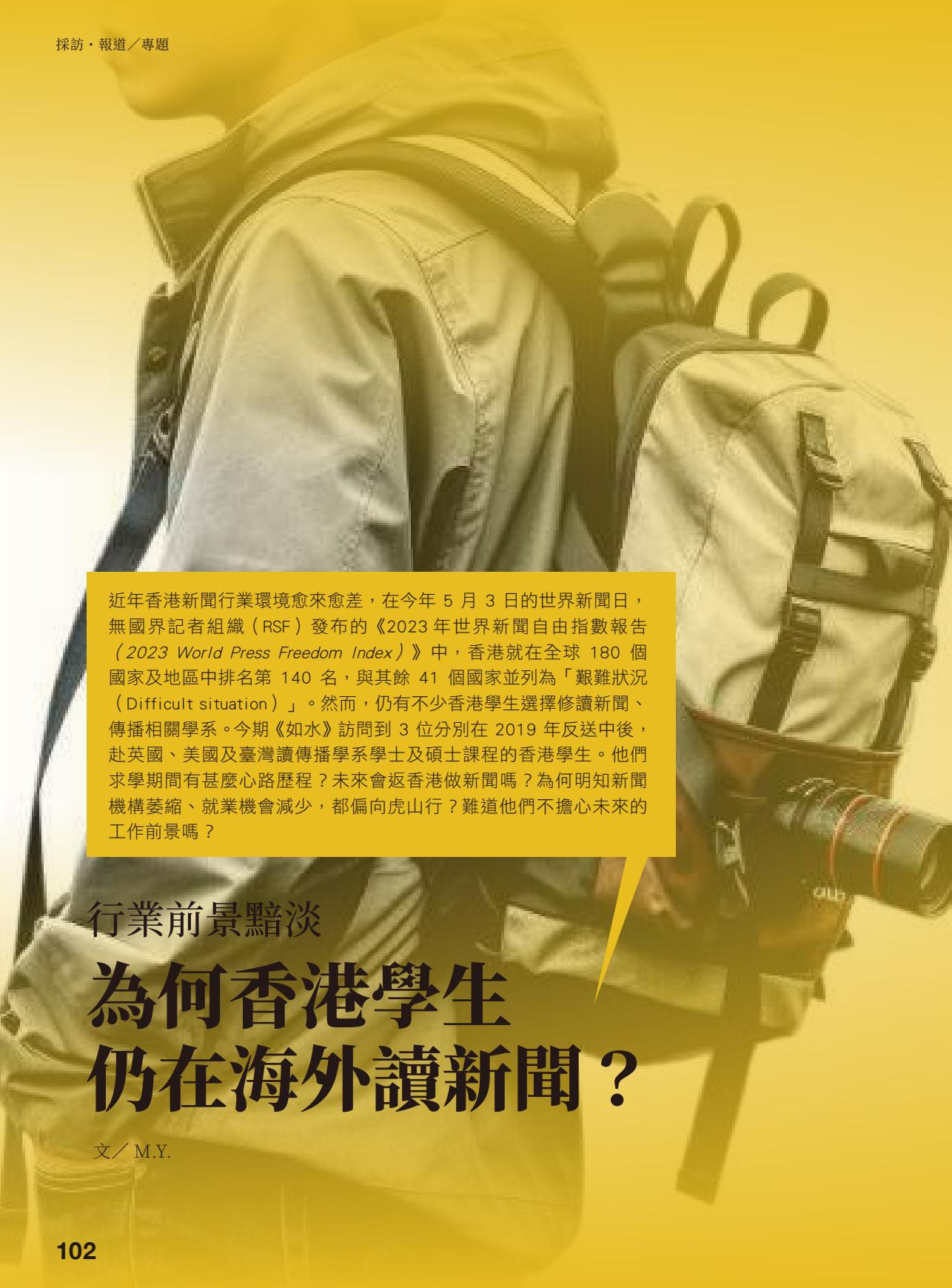
理想來說，當事人應該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在不同角色之間跳來跳去。如果你某天是記者，第二天是政治家，然後第三天又成為記者，就會有問題。但是，一如之前所說，在高壓社會中，我可以理解為甚麼媒體工作和政治參與之間會發生這種互動，這與我在非洲所見的情況一樣。我會說，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非洲流散媒體和他們的撰稿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政治有關聯，但是，當我看到媒體人變成政治家時，我仍然有所保留。在從事媒體工作時，記者對其政治立場保持透明是更好的選擇。

Q：我們應將記者的工作視為社會運動一部分嗎？這是否與新聞道德有衝突？

如果站在新聞道德是保持中立，並在某種程度上保持客觀的立場來看，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如果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和嚴肅媒體上的新聞沒有區別的，那都是有問題的。媒體面對的考驗是，是否能夠真正與公眾對話，傳達各方觀點。

除此之外，你能否代表不同的群體，而不僅僅是一個群體？這正是媒體的終極考驗。■





近年香港新聞行業環境愈來愈差，在今年 5 月 3 日的世界新聞日，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發布的《2023 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 (2023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香港就在全球 180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140 名，與其餘 41 個國家並列為「艱難狀況 (Difficult situation)」。然而，仍有不少香港學生選擇修讀新聞、傳播相關學系。今期《如水》訪問到 3 位分別在 2019 年反送中後，赴英國、美國及臺灣讀傳播學系學士及碩士課程的香港學生。他們求學期間有甚麼心路歷程？未來會返香港做新聞嗎？為何明知新聞機構萎縮、就業機會減少，都偏向虎山行？難道他們不擔心未來的工作前景嗎？

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 仍在海外讀新聞？

文／M.Y.

身處臺灣的 Patty (化名)，是 3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位曾在前線採訪反送中運動的學生。她 2016 年在香港一間大學讀新聞系，2021 年赴臺攻讀傳播學院碩士課程，即將在今年畢業。

她說，中四至中六期間開始對新聞有興趣，因為當時發生比較多社會事件，例如雨傘革命及本土派選立法會；但講到為何選擇讀新聞系，她說大學第一年是在社會科學的大類，並未細分學系，「一開頭並沒有說是因為某件事件而想讀新聞，純粹覺得好有趣而想讀」，然而，隨著 2019 年社會環境巨變，「我愈漸覺得新聞系在社會上有其價值所在，所以想維護這種價值」。

Patty 談到，現在她修讀的碩士課程雖然不完全與新聞相關，但她做的研究與兩岸三地的新聞仍有關連，「希望將大學時所讀的，繼續延續到碩士；此外我覺得未來也有可能在傳媒業界工作，故當作是自我增值」。

在英國的 Reagan，讀新聞系是源自從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他中、小學時的志願，除了想做記者，亦想做立法會議員、律師，甚至特首。而他最後選定想做記者，約莫是在中五，擔任學生會刊物的總編輯時，開始對於用文字向同學介紹一些事情感興趣。「我覺得可透過文字將以前的歷史帶給同學，從而讓他們反思及批判現狀...就算 nobody 寫的東西，都可以有改變社會現狀的力量，甚至去幫無權者發聲 (give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因而想開始做一些新聞工作」。

啟發到他想讀新聞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真社》(已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停運)在 2018 年一篇大陸邊防部隊人員擅自越過香港邊界的報道，「當時那個年紀的我覺得這單新聞好大件事，能找到這些資料的人 (記

者) 好叻喎」，雖然這單新聞最終不了了之，但他認為記者追查這些鮮為人知的事件讓公眾知道，「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職業」。

Reagan 又提到，在經歷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時，已經見到從政是不可能且太大風險。同時，他也有猶豫過，自己是否想做記者，「到底自己的身位應是參與者，還是相對抽離的旁觀者？」但當他填 JUPAS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志願時，始終都是選擇了新聞系，「因為做參與者的想法已經變得不現實，所以想懷著做旁觀者的心」。那麼為何最後前往英國升學，他說，一來因為他的 DSE 成績不足以入讀他心儀的中大新傳系或浸大新聞系；二是他目睹在香港讀新聞的環境變差。現時 Reagan 就讀的大學，新聞系在全英的排名算是數一數二。

2018 年赴美國讀書的 Ariel (化名)，則可謂是半路出家，2021 年才開始副修新聞系的她，主修科目其實是地質學。會有這偌大的轉變，Ariel 說固然跟 2019 年的事件有關，但她指的並不是抗爭運動，而是到法庭旁聽。因為法庭內不可拍照或錄影，只能靠文字記錄，她希望自己未來能用記者的身分，透過報道記錄這些歷史，「否則可能之後就無人知道入面發生過甚麼事」。

後來 Ariel 對新聞的熱誠甚至超逾其主修科目。她提到，自從選修新聞系後，直到去年畢業前，基本上所有時間都投放在新聞方面，包括擔任學校的學生報記者。她更說自己經常會為做採訪而走堂，甚至連地質學的畢業論文都無做，只停留在 research 階段 (Ariel 說即使無交也能夠順利畢業)，「因為我好想多花點時間在報道、新聞那一方面」。

Reagan：

功課為做香港議題曾與教授吵架

那麼他們在海外讀新聞及傳播學系時，有在課堂或功課上做過有關香港的議題嗎？

Reagan 說他做的功課很多都跟香港有關，例如港人示威、離散族群、香港學生面對的 English language barrier (語言障礙) 等。「我好想做多些有關香港的事，因為（作為香港人）熟悉這方面的情況，而且相較容易找到有關的資料。」

Reagan 坦言，曾被教授要求不要做那麼多香港議題，轉而多做一些地方故事，他更因此試過與教授吵架。他說，校方是想學生多做當地居民會有興趣的報道，但他堅持，只要有得選擇，他都會繼續做香港議題的報道作為功課。



Reagan | M.Y. 攝

Ari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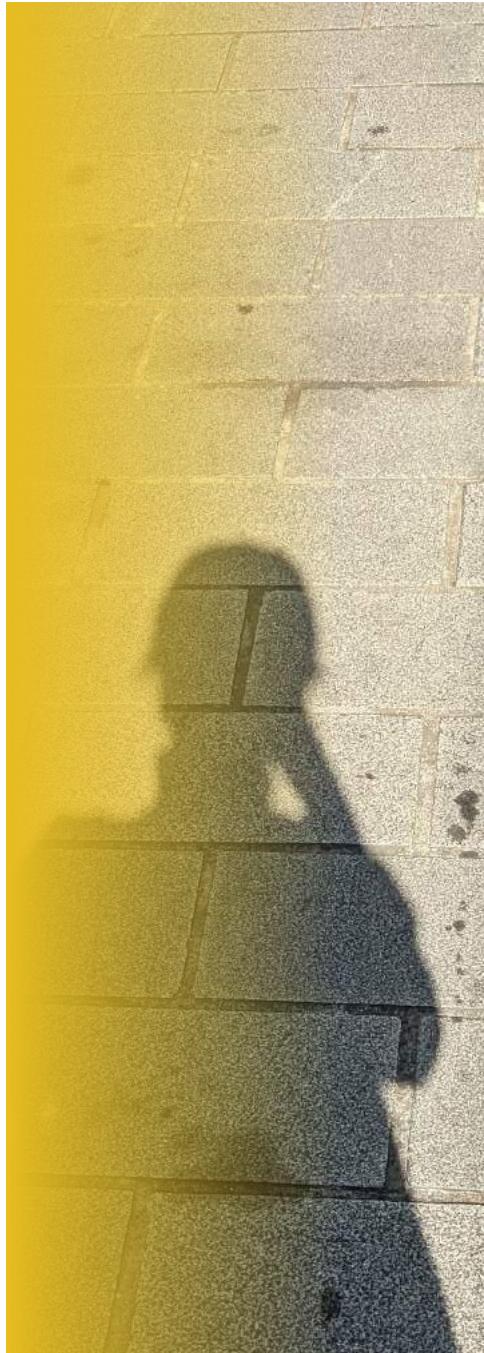
努力爭取在學生報做當地港人議題

Ariel 亦同樣關心港人社群的事。她指，只要附近有港人社群活動，她都會盡責地通報編輯，希望學生報可派人跟進，「私心地也想有多一個途徑讓更多人知道香港發生的事」。不過，因為該報主要是跟進校園相關議題及地方新聞，較少跟進周邊城市活動，加上整個新聞團隊中，只有她是香港人，其他記者相對沒那麼關心香港社群發生的事，所以她匯報的港人社群活動，很多時候學生報都沒有跟進。「不過我覺得無需勉強，我明白學生報報道的事需要符合受眾的興趣。」

但她說，雖然自己不時「食檸檬」，但都有爭取成功的例子。在白紙革命期間，校園內亦有一些相關的行動，「我主動向編輯提出可以報道，最後同另一位學生記者一起去做，訪問了中國人、香港人、西藏人及本地人，記錄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這篇稿亦成為她在學生報中，唯一一篇有關中國人權民主議題的報道。



Ariel | 受訪者提供



Patty | 受訪者提供

Patty： 研究香港獨立媒體 獲老師讚是在記錄時代

至於 Patty，她則提到在臺灣讀書時，做的研究主要跟兩岸三地有關，因此不一定與香港有直接關係。然而她最近也有做一份拍攝紀錄片的功課，內容是關於她身邊一位從香港來臺灣讀書的同學。除此以外，她亦做過一份有關香港的獨立媒體研究。

Patty 說，這份研究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 final paper，她研究了包括在臺灣紮根的《同文》，以及其他在香港境內、境外的香港媒體。她說，這份功課主要是重提香港主權移交後主流媒體生態有甚麼變化，然後以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作為切入點，觀察運動和國安法如何影響獨立媒體發展。「會選擇以香港的獨立媒體為主題，是因為《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關閉，當時見到很多傳媒人另起爐灶，各自在香港或海外成立新的獨立媒體，比如我做這個題目時，《追新聞》剛剛成立，所以我想探討這些獨立媒體的湧現情況，以及他們會做甚麼議題。」

在這份功課，她又以去年「六四」紀念活動為例，比較香港主流媒體和香港、海外獨立媒體的報道，「我發現主流媒體的報道是比較片面，可能純粹話維園無開、有人在網上煽惑『六四殺警』之類；但獨立媒體，不論是在香港或海外成立，就會比較多報道海外的一些悼念活動」。她說，這份功課後來獲老師評價為「是一篇可以記錄時代的一個作品」。

反送中對 3 位學生 帶來了甚麼轉變？

把時間線拉回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這運動會否令他們對入行做新聞卻步？還是會令他們更想繼續向前？

在 3 位受訪者中，唯一在香港有採訪經驗的是 Patty，她在香港讀大學期間曾到本地傳媒機構實習 2 個月，時期正是 2019 年中。Patty 指，在反送中運動的開頭，即是 6 月中，她還可以去前線做採訪、「扑咪」。然而，6 月尾的一場「撐警」集會，有一位同為實習記者的行家遭在場人士攻擊，自此之後雖然她們仍可以去現場，但只獲允許站在較遠的位置進行採訪。

她說，在實習的過程中也加深了對傳媒工作的認識。至於這經歷會否影響 Patty 未來入行的意欲，她則只說當時的自己未見過有如此大型的示威抗議活動，會覺得這場抗議會對香港造成好深遠的影響。她提到，同期約 40 名同學，至少有一半人入行做傳媒，自己「點都有想過入行」，但實際上仍未想清楚未來的職場規劃。

Reagan 則指，反送中運動令他更想做記者，而且對記者更加欽佩。「記者雖然是旁觀者，但同時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媒介，就如 2019 年反送中示威，警察打人，然後媒體影到相出報道講述事件，之後再有示威抗議，警察又打人……就是這樣無限 loop，令運動因而不斷升級……傳媒的角色在揭露警暴問題方面非常重要，可以令市民意識到危險」。

言談間 Reagan 還提到自己未來有想過做戰地記者，去最缺乏新聞資訊 (underreported) 的地方進行報道。他連忙補充，這只是一個

很不成熟的想法，需先認識國際時局，「（對這方面）絕對談不上是很了解」，又笑著表示如要做戰地記者，「首先一定要先減肥！否則會跑不動！」

Ariel：返美後始覺心繫香港

至於 Ariel，她加強語氣向記者表示，「當初（2018 年）過來讀書時，我一心就是走地質學這條路，所以先過來美國！」選擇地質學，她說純粹基於個人興趣。然而，在經歷反送中後返美，她卻發現自己始終心繫香港發生的事件，甚至無法集中精神應付學業，「唯一可以在這裡令到自己有點動力去繼續讀書、生活的事，就是在美國做其他方面的倡議工作，參與了很多與香港相關的事」。

但隨著 2020 年武漢肺炎疫情全球擴散，倡議工作被迫全數停擺，她解釋，「因為 lockdown，加上大家都忙著應對 Covid，根本無人得閒理會」，她更因此情緒極為低落，最後選擇休學返港。「我反而覺得，回到香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例如可以關心在香港的朋友，又可以去法庭旁聽。」

她又提到，在法庭旁聽時她還思索過，如果未來做律師、記者等不同工作，究竟哪種職業對香港未來的幫助更大。在仔細思慮後，她認為做記者是她最可行且最有興趣的選擇。

Ariel 在疫情緩和後重返美國繼續學業，並加入學生報追尋成為記者的目標，「每個星期交兩篇報道，全由自己去跑採訪、做訪問，通常一篇 500 至 700 字左右」。她說，一開始只是對新聞行業有興趣，但落手做新聞之後讓她更想在這方面發展，「雖然每天都非常忙碌，既要兼顧學業，又要趕著交稿；

有時候約受訪者，為遷就對方時間，就要經常走堂，或者一落堂就衝去廁所或其他安靜的地方做電話訪問。當遇到有人拒絕受訪時，我甚至會直接去對方的辦公室……但每一日都過得很充實，而且是在做有意義的事」。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們（學生報）不做這些報道，可能未必有其他人知道這一件事，所以每則新聞都是很重要。」



Ariel 所讀學校的學生報編輯部 | 受訪者提供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蘋果日報》、《立場新聞》（下稱：《立場》）被警方國安處大規模搜捕，並分別在 2021 年 6 月 24 日及同年 12 月 29 日停運。當時身在英國的 Reagan，其實有參與《立場新聞》英國分社（下稱：《立場》英國分社）的工作，對於正在任職的媒體突然從公眾視線消失，他有一番體會。

Reagan： 慶幸赴英讀書後於《立場》兼職

2020 年 10 月前後，剛讀大學的 Reagan，其家人在 Facebook 見到《立場》英國分社請人，並鼓勵他試一下。他指雖然來英國讀書當初是想用英文做新聞，但因為對《立場》英國分社的招聘也有些興趣，於是膽粗粗寄 CV，沒想到一、兩個月後會收到編輯的回電。「當時編輯想了一條題目，有關〈帶著黃藍去英國〉，這剛好與自己想做的題目相近，於是雙方一拍即合」。他續稱，「其實真的很開心，無想過可以加入《立場》，要知道在當時的香港，《立場》仍是很主要、很多人認識的網媒……對於 Year 1 已經进入到《立場》工作很沾沾自喜，真的感到很鼓舞」。

在 Reagan 向記者分享於《立場》英國分社工作的經歷時，10 分鐘內講了很多遍「很開心、好愉快、見識到很多（人、事、物），包括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NUJ，英國全國記者協會)……」不難看見他雙眼泛著光芒，以及蓋不住的喜悅及自豪。儘管一開頭幾個月，Reagan 因為學生簽證問題不能工作，只能義務幫忙，但他謂，「當是擴經驗、幫吓手」。

他說，在義務工作期間，甚麼類型的稿件都會接觸，「基本上編輯派甚麼題目過來，就寫甚麼」，例如他寫過在 Manchester (曼

徹斯特)、Nottingham (諾定咸) 的港人示威活動，也會寫一些國際新聞、國際新聞特寫，又會「炒冷飯」——梳理時事脈絡，提供新聞背後的基本知識。

而最令他深刻的，是有關「曼城義工隊（一班在曼城的香港人做義工執垃圾）」的一篇稿，因為「不知道為何這篇報道勁多人睇，所以很開心，就連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都特地轉載了我在《立場》的報道。她還另寫了一篇專欄，說『很喜歡這種輕鬆而有實際效用的行動』，認為活動體現到香港人關心社區、樂意服務，發揮正能量，『也是宣傳香港的好辦法』」。Reagan 說，這本來只是普通一篇報道，結果因為大受歡迎，最終發展成一個專題。

經歷完一個暑假，Year 2。Reagan 說 9 月從香港回到英國之後，編輯邀請他加入做兼職，「就很順理成章正式加入《立場》英國分社」。他有點飄飄然，「雖然不算是較量，因為無辦法直接比較嘛，但當其他同學都正在找實習的時候，我已經得到一份 part time，叫做一個幾開心的時刻」。

Reagan 指，在《立場》英國分社做兼職期間，處理新聞的範疇比之前更加廣泛，多寫了國際即時新聞：從波蘭脫歐論 (Polexit)，寫到德國「交通燈」聯盟；然後寫所羅門群島，再寫到非洲埃塞俄比亞內戰……「是真的極度跳躍」，Reagan 說，「但我覺得幾好玩，見識很多。坦白說，就當你會主動看新聞，又會有幾多時候會去瞭解國際時事，『（通常）睇完咪算囉』，但真正做新聞時，因為要撰稿，就真的看多了重要的國際新聞」。

他也說到寫稿時曾經歷過跌跌撞撞的階段，「被人 X 份稿寫得太囉嗦」。他續指，就如寫埃塞俄比亞內戰，外媒如《路透社》的報道簡而精，「我就很喜歡去解釋內戰的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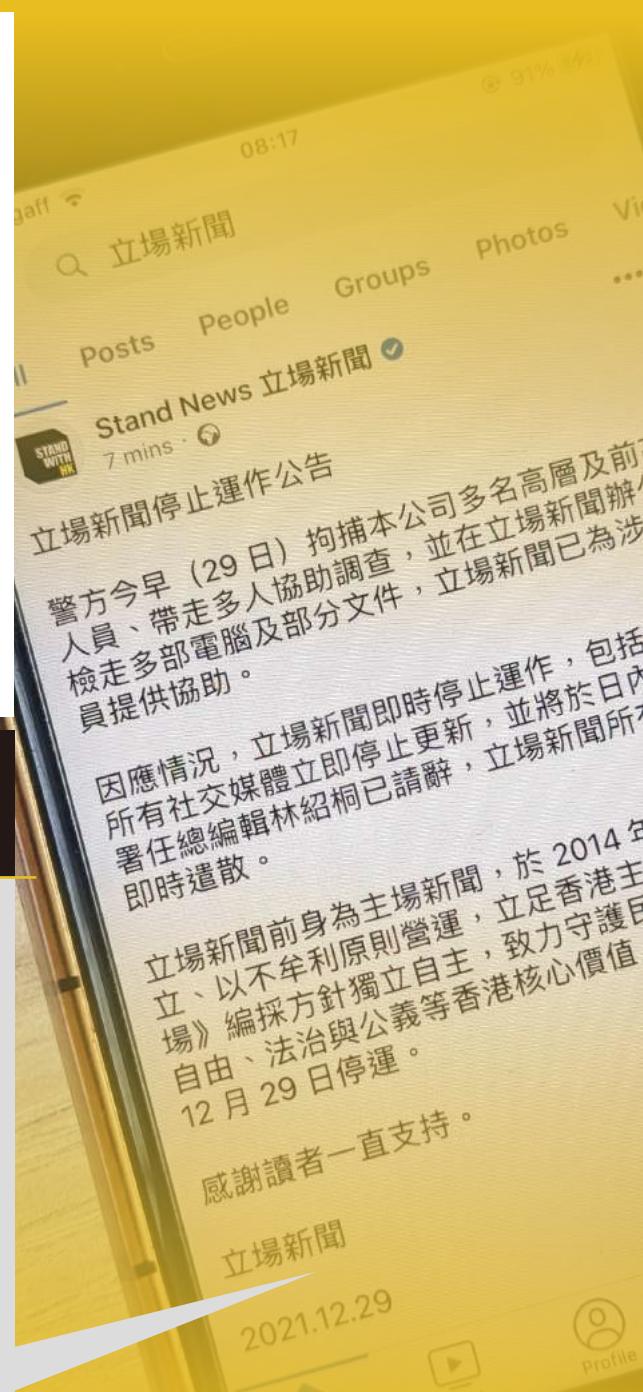
緣由，又去講解該國的政府如何……我是一個喜歡甚麼事情都要解釋清楚的人，連編輯都有說過，這些稿件未免太過簡單複雜化，好像不是一篇故事，而是一篇解說」。

Reagan 提到，這份工作不但鍛鍊到自己的文筆，學會寫得比較精簡，同時也擴闊了國際視野。他又向記者提到一條有關 LinkedIn 撤出中國的稿，獲編輯大讚甚至寫得好過《立場》的同事，令他非常開心。Reagan 還形容，這篇稿更有可能寫得好過《紐約時報》、CNN 等外媒，「因為那些記者不懂中文」。而該則新聞的特別之處，是他發現 LinkedIn 在微博的中文聲明，以及 LinkedIn 英文版的聲明內容有出入，「英文版瘋狂提到言論自由，但中文版則隻字不提，僅提及『創造職場價值』之類」，於是找了一個不同的角度寫這篇的報道。

BNO 簽證 & 《立場》英國分社回顧

香港實施國安法後，英國政府開放「救生艇」，供 BNO 護照持有人及其家屬在 2021 年 1 月底起申請 BNO 簽證，成為移民及未來入籍英國的途徑。據英國內政部數字，自簽證開放申請以來，首 2 個月就收到逾 3.4 萬宗申請；而截至 2023 年 2 月，已有約 14.5 萬名港人循此方式赴英開展新生活，佔香港總人口約 2%。

《立場》英國分社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於 2021 年 2 月下旬開始運作，透過駐英記者記錄移英港人的生活，同時支援《立場》香港總部的通宵工作，提供國際新聞報道。惟最終營運不到一年，與《立場》香港總部同步停止運作。



因應情況，立場新聞即時停止運作，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立即停止更新，並將於日內署任總編輯林紹桐已請辭，立場新聞所

立場新聞前身為主場新聞，於 2014 年立、以不牟利原則營運，立足香港主場》編採方針獨立自主，致力守護自由、法治與公義等香港核心價值
12 月 29 日停運。

感謝讀者一直支持。

偕友買酒突悉《立場》停運 Reagan：起初不信

而後續的事，大家都知道，《立場》宣布停運，《立場》英國分社也不例外。

Reagan 說，印象中在《立場》英國分社的最後一篇稿，是寫瑞士的 3D 迷你自殺艙（安樂死膠囊艙）。之後他就放假跟朋友去旅行，直到《立場》宣布停運前一日，即 28 號才回到倫敦。但他沒有想到，和一班香港朋友行去酒吧買酒時，朋友手機上突然跳出《香港 01》的新聞通知：「《立場新聞》辦公室被搜」。他說，當時他還是「勁頹」的狀態在街上亂逛，毫不知道大事即將發生，即使第一位朋友大叫「喂！《立場》收皮喎！」他根本不相信：「你咁 X 講笑啦，X！做乜 X 嘟講笑」，未料身邊另外 3、4 名朋友也隨即遞手機著他看，「真噃，X 你，自己睇啦 X！」

他接過手機一看，「哇 X 你，真噃喎！」才瞬間清醒。「當時真係極度震驚」，他對記者說。

那夜，他從本來打算開心飲酒，變成飲悶酒，「唉，X 你老尾，今晚又飲多幾罐」，Reagan 在歸途中自言自語。「震驚過後是傷感的」，他在訪問中深吸一口氣續說，「settle in 之後就是迷茫……」

他說震驚是因為看見自己寫的報道全被清空。「問心，整個網站這麼多新聞報道，雖然自己的貢獻不多，但都佔有一部分。我只是在《立場》英國分社做了一段頗短的時間，也就別說其他在香港《立場》同事的付出……當下見到連工作用的通訊軟體也即時被停權，無法再登入，感嘆一間機構倒下後，大家只能被迫四散」。

至於傷感，Reagan 稱《立場》英國分社作

為自己第一份工作，斷斷續續做了半年有多，從義務做到兼職，就突然間受到當頭棒喝，「好像（社會）跟你說（做新聞）這條路不可行……這樣就結束了在一間新聞機構的工作，甚麼都結束了……」Reagan 帶著不甘心、難以釋懷的語氣說。「是真的很無言，是很複雜的感受。」他再次提到，「雖說真的做了不久，我沒有如其他在《立場》做了很久的同事或編輯一樣，有很多很強的 attachment；但作為初出茅廬的學生，任職的公司這樣突然倒下，我是感到很無助」。

從未用過的《立場》記者證

Reagan 說他當晚徹夜難眠，「飲酒飲到清晨 6 點多」，看著已排好更表的 Google 日曆、抱著一個期待復工的心，然後就沒有然後。

說罷，他掏出 2 張記者證，一張是 NUJ 的學生記者證，另一張則是《立場》的。他指著《立場》記者證道，這張證 12 月中才收到，為了方便採訪，但最終一次都無用過，「真係好 X 諷刺」。而那個更表，他說在《立場》結業後的一兩個月，竟然未被刪除，Google 日曆上還顯示：「今日某某返工，時間是幾點至幾點」，他續稱，「係幾好笑噃一樣噃，其實間公司已經執咗……看著當是懷舊、依戀一下」。又慨嘆，「痕跡仍然在，但物是人非」。

他說，「被失業」的第二天，原本是他的上班日，他如常在「上班時間」坐在電腦檯前（編註：《立場》英國分社是以 WFH 形式工作），「真的很不習慣，一向預留了這段時間要開工的嘛……現在變得很清閒，還多了時間打機，但打打吓機，望著這張電腦檯又覺得好 X 空虛，好像好無意義，X！」同日他坐在電腦前，還不斷用鍵盤按「F5」（重新整理），直到《立場》網站刪除所有報道，只剩下一張黑底白字的公告。「直到這一刻，有『唉，真係完啦』那種感覺……不是只說

《立場》完了，而是新聞界完了、香港社會都完了。」

Reagan 還提到，在《蘋果》執笠時，自己及身邊親友都不時戲言，「唉，《立場》都無㗎啦（意指難逃被抄家的一日），做得一日得一日啦」，但他說，真正發生的時候，整個感受都很不同，「所以很震驚，也覺得很突然」。

他承認，在這段迷茫期，打機算是用來麻醉自己，以遊戲中打贏一場場比賽的快樂，去沖刷無處安放的情感，「過了一個月這樣的生活」。其間，《立場》的編輯也曾經致電關心他的狀況。此後，他唯有透過加倍努力讀書走出傷感，又會把多出來的空餘時間，放在大學學生會的雜誌上，例如寫一些地區活動報道或做多媒體報道，「之後就在 Student Publication Association (SPA) 的 National Awards 2023 獲得最佳學生攝影獎」。



Reagan 從未用過的《立場》記者證 | M.Y. 攝



Reagan 在《立場》停運後，將空餘時間投放在學生會的雜誌上，當中有報道獲得最佳學生攝影獎。| M.Y. 攝



畢業後會否入行做新聞？

畢業後，下一步就是要面對求職，以及在哪裡發展的問題。Patty 及 Reagan 均明言，畢業後不會返香港，更莫論回去做傳媒。

Patty 提到，當初選擇去臺灣進修，除了是不想在香港繼續讀新聞，另一方面是不想留在香港發展。她說，面對香港多間傳媒在國安法下執笠，「這令我反思，現在的香港是否仍有空間，去營運一個相對來說是『中立偏民主派』的媒體？」因此她認為，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如果留在香港做傳媒，「我想我會被這種白色恐怖吞噬」。

她又指，假使香港沒有反送中及之後的國安法，她覺得自己會在大學畢業後理所當然地入行，甚至沒有離開香港的念頭。

Reagan 也認為返香港做新聞並不現實，甚至連「返香港」這個動作都有風險，不敢有僥倖心理。他說，在《立場》未停運前，「我曾奢想過，假若畢業後在英國找不到工作，返香港後做中文新聞，或者在香港做《立場》，都可能是一條出路」，但現在的他覺得，「如今還有甚麼香港的新聞機構可以做？」

Reagan 指，在國安法後的香港，很多比較政治敏感的報道都不能做。他又對仍然在香港做記者的人感到非常佩服，「好欽佩他們的熱誠，仍然嘗試去對抗阻力，但我個人接受不到要望著一些事件發生卻不能寫，要被迫自我審查。我不願妥協」。

不過，Ariel 對回港任記者仍有一份憧憬，一說起就眼睛發亮，連語氣也變得雀躍。「我好想啊其實，這是我很想做到的事，目標是想加入英文網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HKFP)*」，然而，她指 *HKFP* 目前沒有比

較初級的職位空缺，而較資深的，她還不夠資歷應徵。

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 Ariel 已於去年畢業，目前在美國有一份與地質相關的全職工作。

Ariel 解釋，她並非不想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更嘗試過應徵，結果她發現其國際學生簽證，雖然可在美國工作 3 年，但附帶條件是工作必須與主修科目有直接關係，「由於我的主修科目是地質學，只能暫時打消做新聞的念頭」。但是，她仍未打算放棄，期望在這段時間裝備自己，吸收地質行業相關經驗，在滿足 3 年簽證限制「鬆綁」後，或會再次應徵傳媒工作，令自己能夠做環境相關的報道時，可以做得更加深入、透徹。

不過她對這一條路仍有掙扎，畢竟她當初想做記者，是想記錄在香港發生的事，「我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想自己的屋企變得更好，直言「暫時對海外其他城市未有這一份情懷... 所以我仍然在摸索，不是很知道自己是否應在海外入行做本地傳媒。」

Reagan 說，除了想做戰地記者，他也想做《經濟學人》的國際政治分析報道，只是他覺得自己一來非修讀國際關係出身，二來英文不夠好，即使 DSE 英文成績有 level 5，「畢竟還是要跟在本地、英文為母語的學生競爭」，因此需要裝備自己。他在 Year 1 時花了很多時間惡補，例如每日認真睇 BBC 2 小時，「甚至是讀出來」，但現在他對於寫英文報道仍有些怯，所以會偏向做多媒體報道「拍吓片、影相」，並打算以擔任攝影記者為入行的踏腳石。而在畢業後，他打算兼讀碩士課程，繼續進修。

他又說到，當初前往英國念書，就是想日後用英文來做新聞，「雖然寫香港新聞有一種親切感」，但是，對於新聞，他始終抱著一

個信念，就是為無權者發聲。他認為世界很大，有其他人或議題更值得關注。最近他有一名受訪者就提到，香港比較幸運，因為有很多香港記者在國際新聞界工作，並關心香港的情況，而很多其他國家的流散族群則沒這種運氣，力量亦因而更小。

Patty 的想法則沒那麼堅定。她認為，臺灣傳媒薪酬待遇較差，行業前景不太明朗。她亦會考量做傳媒能否幫助她未來的生涯規劃。她坦言不想在臺灣做即時新聞，只想做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然而據她所知，在臺灣這方面的空缺不常見。而若找不到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她說可能考慮做 Marketing 或者於研究中心任職。

港生嘆海外做新聞競爭大

對於在海外做新聞可能會遇到甚麼困難，3 人都不約而同說到語言問題。Patty 直言，言語上的限制，正是她不想在臺灣跑即時新聞的原因之一。Ariel 也說，英文的問題，是要克服的要點。她指自己的英文與美國本地學生相比不是很流暢，又憶述之前做學生報跑突發新聞的時候，如果對方說得太快，或者提到一些她從未聽過的詞彙、地方名，「我就已經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雖然每次做採訪前，她都會先做足功課，不過她還是會擔心，倘若突然要她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處理突發新聞，「我真的可能攏不到那些資料回來，這樣就搞唔掂啦！」

另外，Ariel 和 Reagan 也分別提到美國、英國新聞行業競爭很大，不太容易入行。「真的很難搵工」，Reagan 嘆氣道。Ariel 則提到，她有認識的朋友，在讀新聞系時成績不錯，而且有實力，但同樣難入行，「更何況我只有一年的經驗……」因此，她覺得就算不受簽證限制，要入新聞界亦機會渺茫。

除了難入行，對外地社會不夠瞭解，亦影響香港新聞系學生入行的機會和意欲。Ariel 便談到，自己只在美國生活數年，對美國國情不太瞭解，「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是適合的時機入行做新聞」。

Reagan 亦針對這方面表示，在英國做外媒不可能以香港人的角度去寫本地新聞。雖然英國的 NCTJ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ts，國家記者培訓理事會) 能夠提供文憑課程，教導記者學生認識英國的制度，例如英國國會產生組成、教育制度、NHS (國民保健署) 制度、監管機構等，讓學生知道一則新聞發生時，應該找哪方面回應，但就算這個課程獲英國新聞業界認證，他仍認為讀完後還是會與本地人有一層隔膜。原因是本地人可以建基於自己對其國家的認知，發展他們的新聞報道，「而我們就缺乏這個脈絡和社區連結，需要由零摸索」。

「當大家看到同一件事件發生，本地人可能會想到用這個角度可以做切入，但你未必可以」。他坦言，自己也在克服這個問題，正努力去瞭解、融入當地的文化，並思考未來還能怎樣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入行會想做香港議題 還是 move 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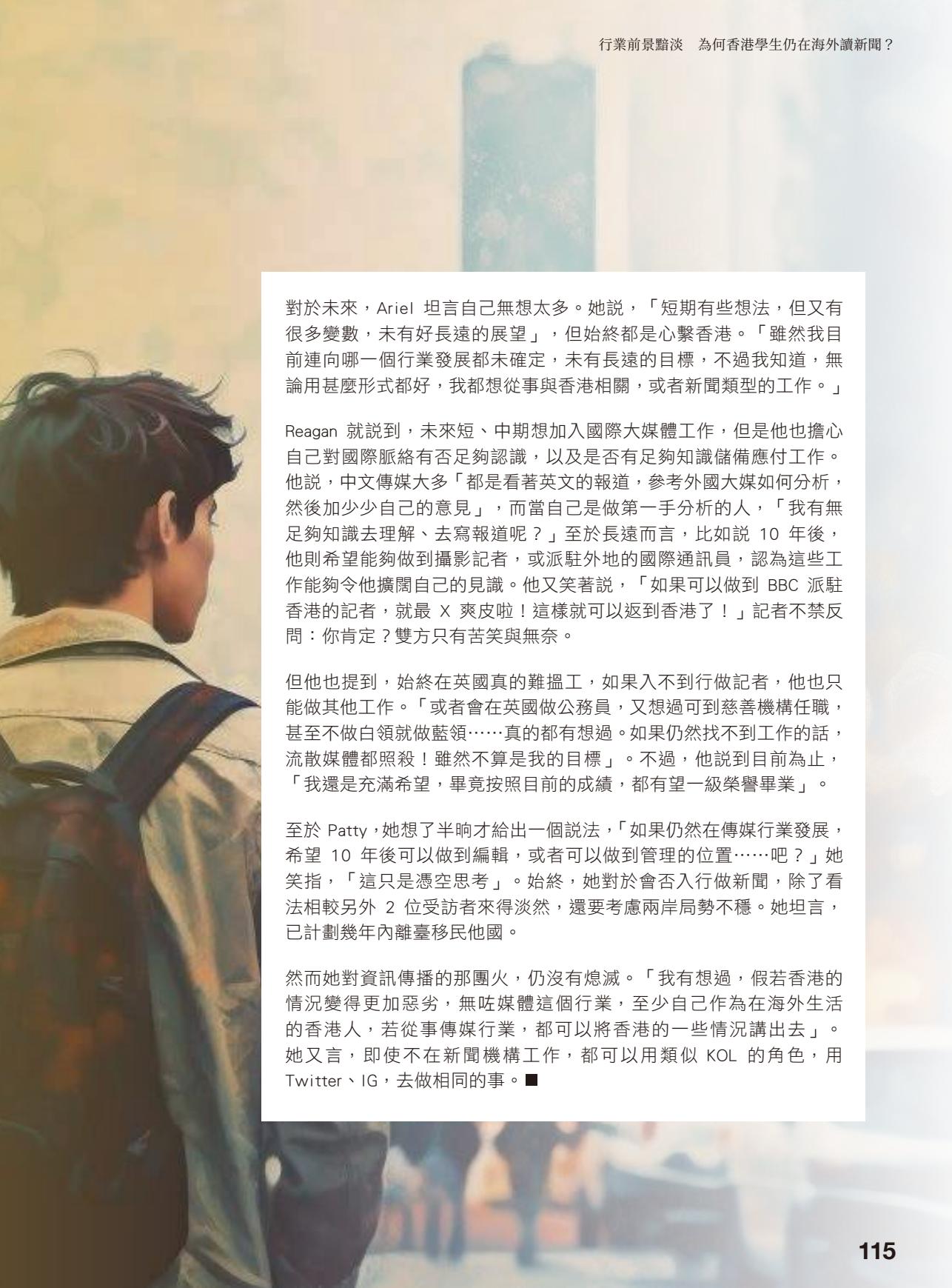
而就算成功在外國加入傳媒機構工作，也許最終或多或少也不會以香港為主要關注議題。3 名受訪者均認為，應該 move on。Patty 說，「無論如何都要融入當地文化，不可能永遠只是『做死』香港新聞」。她指，海外受眾很難時時刻刻關心香港議題，香港記者無法獨沽一味。Reagan 則認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驅使他想做記者，這只是一個起點，「我不單只做香港新聞，甚麼地方的新聞我都想做。再者，做香港新聞，受眾真的太少了」，他希望用英文做新聞能夠擴大受眾群，為更多勢弱言輕者發聲。

Ariel 就以實際的角度指，如果在外國的主流媒體工作，「就預咗報道的事情不會以香港為主，除非是在大媒體專責做香港議題，或者做駐香港或亞洲的外國通訊員」。然而，就算是做這方面的工作，她也認為報道模式亦會以外媒視角為主，而非香港人的角度。

不過，就算 Patty 認為自己要 move on，但她也覺得，主要關心香港議題的香港流散媒體還是有其存在意義，因為它們可以報道香港境內未必可以報道的題目。Ariel 則比較關注香港流散媒體做的海外港人故事，「作為一個目前在海外生活的人，有賴這些流散媒體的報道，才得知在其他地方生活的港人情況如何」。她還提到《綠豆》，「我成日都追佢哋嘅節目㗎！睇完之後我真係知道依家喺英國嘅情況係咁，我覺得佢哋可以做到個資訊性好強……所以我都好慶幸香港人可以如此厲害，適應力如此強大，那麼快就能在海外組織、成立一個個新媒體，這一種力量令我感受很深」。另外，她亦提到《如水》，「本身有關注搞《如水》那些人……雜誌內容會有深入分析，又有些報道，我認為這個時代好需要這些資訊，所以我好想推廣給其他人知道」。

而 Reagan 則不太看好近年在海外紛紛成立的香港流散媒體，覺得這些媒體很難長久營運下去。

他認為，香港流散媒體的對象，大多是對香港有依戀，或者有很強烈身分認同的人，故報道內容普遍只能流傳在一個同溫層，且很難將這種價值延伸到在這裡土生土長的港人第二代、第三代，「所以，流散族群及媒體對我來說，目前是一個只能短暫持續的事」。



對於未來，Ariel 坦言自己無想太多。她說，「短期有些想法，但又有很多變數，未有好長遠的展望」，但始終都是心繫香港。「雖然我目前連向哪一個行業發展都未確定，未有長遠的目標，不過我知道，無論用甚麼形式都好，我都想從事與香港相關，或者新聞類型的工作。」

Reagan 就說到，未來短、中期想加入國際大媒體工作，但是他擔心自己對國際脈絡有否足夠認識，以及是否有足夠知識儲備應付工作。他說，中文傳媒大多「都是看著英文的報道，參考外國大媒如何分析，然後加少少自己的意見」，而當自己是做第一手分析的人，「我有無足夠知識去理解、去寫報道呢？」至於長遠而言，比如說 10 年後，他則希望能夠做到攝影記者，或派駐外地的國際通訊員，認為這些工作能夠令他擴闊自己的見識。他又笑著說，「如果可以做到 BBC 派駐香港的記者，就最 X 爽皮啦！這樣就可以返到香港了！」記者不禁反問：你肯定？雙方只有苦笑與無奈。

但他也提到，始終在英國真的難搵工，如果入不到行做記者，他也只能做其他工作。「或者會在英國做公務員，又想過可到慈善機構任職，甚至不做白領就做藍領……真的都有想過。如果仍然找不到工作的話，流散媒體都照殺！雖然不算是我的目標」。不過，他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充滿希望，畢竟按照目前的成績，都有望一級榮譽畢業」。

至於 Patty，她想了半晌才給出一個說法，「如果仍然在傳媒行業發展，希望 10 年後可以做到編輯，或者可以做到管理的位置……吧？」她笑指，「這只是憑空思考」。始終，她對於會否入行做新聞，除了看法相較另外 2 位受訪者來得淡然，還要考慮兩岸局勢不穩。她坦言，已計劃幾年內離臺移民他國。

然而她對資訊傳播的那團火，仍沒有熄滅。「我有想過，假若香港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劣，無咗媒體這個行業，至少自己作為在海外生活的香港人，若從事傳媒行業，都可以將香港的一些情況講出去」。她又言，即使不在新聞機構工作，都可以用類似 KOL 的角色，用 Twitter、IG，去做相同的事。■

編按：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加強國內輿論管控，進一步打壓新聞業，包括要求當地媒體在報道戰爭時，只能參考官方的消息來源，又頒布新法禁止作出「虛假戰爭報道」，違者最高可被監禁 15 年；此外，俄國媒體監管機關還以「散布不實資訊」罪，起訴至少 10 家媒體，當中包括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Echo of Moscow）、反政權的獨立新聞網站 *Mediazona*、今年把總部遷往荷蘭的獨立媒體 *Dozhd TV*（又稱 *TV Rain*）和《新報（*Novaja Gaveta*）》。

其後，莫斯科法庭判決著名記者、俄羅斯航天國家集團前顧問薩弗羅諾夫（Ivan Safronov）叛國罪罪成，判監 22 年。另外，當局亦吊銷諾貝爾和平獎得獎總編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的反對派媒體《新報》的發行許可。網絡媒體 *Prospekt Mira* 因害怕網站遭封鎖或遭罰款 500 萬元盧布（約 47 萬港元），撤下有關烏克蘭城市遭轟炸的新聞。

據俄羅斯獨立媒體 *Proekt* 報道，自戰事爆發以來，最少 500 名記者及編輯在開戰後逃亡，部分媒體正在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格魯吉亞等前蘇聯國家重整旗鼓，繼續報道戰況，將戰爭真實一面傳遞給在俄羅斯的人。流亡海外的全國性新聞媒體外，流亡的地區新聞機構又該如何自處，而身處海外如何與在地民眾繼續同行？作者特意訪問已流亡海外、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¹ 喀山網上學生媒體《風暴（*Groza*）》創辦人 Marina Bezmaternykh，記錄她在「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下的媒體之路，從新一代記者的角度探問新聞初心。

¹ 韃靼斯坦共和國為俄羅斯的自治共和國。

風暴中的獨立之聲： 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 獨立學生媒體

文／凌志豪

意料之外的流亡之旅

「我的流亡經歷並不驚險，我只是買了機票然後離開，只不過機票價格略高。（2022年）2月24日戰爭爆發，三月初局勢極為不明朗，我還以為一周內就會結束，我完全沒有預料自己會離開俄羅斯，現在看來戰爭結束機會為零。」

三月初，Marina 剛搬到聖彼得堡一個月，就有不明人士不斷敲門、瘋狂長按門鈴達五分鐘，她驚慌之下刪除手機的所有通訊軟件。至今 Marina 仍不知對方是誰，她笑言可能只是速遞員，但她沒有訂購任何商品。這次經歷令她意識到，自己在戰爭中的俄羅斯從事新聞工作十分危險，也對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壓力，「100% 的時間中，有 100% 的焦慮... 如果我被拘留或搜查，這只會對媒體和我造成更大的傷害」。於是，她在事發一小時後立即購買機票，計劃在其他國家停留幾個月暫避風頭，觀望局勢會否回復平靜，甚至將其聖彼得堡的公寓，租借給認識的人幾個月，「當時我以為可以回國，但最終並不可能。」結果她先前往亞美尼亞，現時流亡到格魯吉亞。

她形容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故事，許多朋友和同僚的經歷雖然並不完全相同，但亦類似。



改變的種子：學生媒體平台的誕生

Marina 和另一位創辦人 Leonid Spirin 在政權壓力下被校方開除學籍前，都曾是喀山國立大學的學生，而且都不是修讀傳理學系。在創辦《風暴》之前，Leonid 只在當地一本生活雜誌擔任過助理。Marina 憶述，2020 年 1 月 25 日，正值俄羅斯的學生節，她和其他同學出於對周遭環境的不滿，決定創辦《風暴》。

「我們創立這個媒體的初衷是對周圍事物的憤慨。當時我和主編 (Leonid) 都是學生，我們看到大學存在很多問題，如作風官僚、課程無用、老師水準差劣等。」她續說，俄羅斯的教育體系並不高效，一半的大學應該關閉，因為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學位，「我們報道了校方的腐敗、政治壓力等問題。我們所做的，亦成功向大學管理層施壓。」

她回憶起她們的一些文章曾引起廣泛討論，使更多人關注大學生活中的問題，例如她們曾報道學校宿舍日久失修，出現大量害蟲，事件還引起了其他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的關注。最後，學校管理層撥款 9,000 萬元盧布（約 846 萬港元）翻修宿舍。Marina 說，雖然校方沒有明確表示這是因為《風暴》的報道，但她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聯繫。

《風暴》成立初期主要報道大學內部的管理問題，及後來擴大至韃靼斯坦共和國青年政策等其他議題。她認為，年輕人和學生應更關心社會政治，遂借助《風暴》希望鼓勵他們多思考這些議題，並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討論、發表意見。

「當時大家對於身邊一切的憤怒都無處宣洩。我們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人們可以分享這種憤怒。」

「我們希望令讀者承擔社會責任，告訴他們有能力影響社會，可以討論、爭取一些轉變，哪怕只是大學裡的一些細小改變。」

極權下的媒體：行動者

《風暴》營運 3 年後正思索轉型，希望從一個單純的新聞媒體，轉型成一個推動公民教育的組織。會有這個轉變，Marina 表示，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急需學會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以應對政府和大學管理層帶來的種種困境，因此她們計劃開展一個學運分子的培訓項目，推動更直接的維權教育，例如由宿舍問題到軍方動員入伍等生死攸關的課題，人們需要知道如何自保。她坦言「在現時的俄羅斯談人權是極為矛盾，儘管法律明文賦予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人權的狀況亦是如此。」

「儘管如此，人們仍有維護基本人權的方法，去保障自身安全。我們需要為青年裝備這方面的知識和工具。若果他們不知道如何捍衛自己的權利，就沒有民主的未來。比如說，假設普京明天死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會自動開始。民主的開始在於當人們意識到知道要如何捍衛他們的權利，如何成為一個國家公民。」

Marina 承認，《風暴》提倡的公民教育計畫，在傳統新聞工作中略顯爭議，因記者常主張媒體要保持中立，避免直接參與社會運動。她亦坦言，編輯團隊仍然在討論媒體的未來方向，未有最終定案。就她個人而言，她認為這種公民教育十分迫切，因為諷刺地現時只有俄羅斯政府當局在做，而當然不是那種真正的「公民教育」。

「在俄羅斯的極端環境下，媒體不能夠單純地報道和講述故事，有太多更緊迫的問題。例如怎樣令年輕人明白自己的公民權利。單純報道政治和社會事件，已難以應對俄羅斯社會當下的挑戰。我只是沒有看到比公民教育更有效的方法，就是這樣。」

Marina 就《風暴》轉型，逐漸邁向社運組織及媒體的雙重身分定位表示，每個推動社會變革的組織，都需要媒體的宣傳，「因為沒有媒體，你就無法存在，沒有人會知道你是誰，你在做甚麼。」但她認同這不是新聞工作，而記者的確需要客觀，但無奈地這就是她們正面對的處境。

全國性媒體的盲點：地區媒體的位置

《風暴》除在喀山外，去年拓展在新西伯利亞和葉卡捷琳堡的業務，在網絡發行兩地的分支雜誌。這種橫跨不同城市的架構，以及過往疫情間在家工作的經驗，編輯團隊和記者身處不同地區的工作模式已是習以為常。目前正處流亡狀態的 Marina 無改一向工作模式，每日花 8 到 10 小時在電腦面前聯絡記者和編輯文章。

談到流亡對地區新聞的影響，她認為駐當地記者和消息來源，對她們的新聞工作至關重要。在喀山，她們已營運了 3 年，已有眾多渠道收集消息，讀者也會主動提供新聞或調查報道的素材。至於她們新拓展至新西伯利亞和葉卡捷琳堡的業務，雖然發展時間短，聯繫和新聞採訪較困難，但她們正努力在當地建立關係網絡。

Marina 說，流散海外的俄羅斯全國性媒體如《墨杜薩（*Meduza*，總部在拉脫維亞）》和 Dozhd TV 報道的議題更加宏大，但各城市和大學的民眾同樣需要了解地區新聞，因此認為《風暴》的優勢，在於能深入探討各地區的重要議題，滿足當地受眾的需求。「理想情況下，俄羅斯每個城鎮都需要像《風暴》般的地方獨立媒體... 雖然她們報道大學和城市的小事，未必能夠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但這些地方議題同樣值得重視。然而，對於扼殺新聞業 20 年的俄羅斯來說，這一切只是幻想。」她指出，讀者的注意力有限，自然會集中在切身影響自己或極具爭議的新聞，而不一定是大議題的報道；地區新聞的重要性在於，「當你知道你周圍發生了甚麼，你會做出更多的知情決定（informed decision），更好的決定。」

孵化下一代記者

在討論《風暴》在專業大型全國媒體和學生媒體之間的定位時，Marina 認為《風暴》未來會更專注報道俄羅斯的教育體系議題。她指，俄羅斯的教育體系存在腐敗、低效的問題，並需要進行改革。「這影響到許多人，因為在俄羅斯，有很大比例的人口正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教育。」然而，這些問題一直以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可能因為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很難聚焦在單一議題，亦有可能這個問題不夠爆炸性，而且有些乏味，所以大型全國媒體少有焦點報道。她承認，媒體的職責並非解決教育體系問題，但由於教育體系影響著眾多人，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

至於《風暴》的另一創辦人 Leonid 在其他訪問中表示，其機構下的許多年輕記者，曾將報道投稿至《新報》、《墨杜薩》或 *Mediazona* 等全國性大型媒體，惟未獲採用。Marina 認為這是一個媒體市場的問題，媒體行業在俄羅斯本應存在，但實際上根本不成形。「因此，對於一個年輕的記者來說，如果沒有採訪技巧，又或者沒有處理過一些大議題，她們的報道若要刊登在大型媒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風暴》的首要任務是為年輕記者創造機會，以維持新聞業健康發展。我們與年輕記者分享經驗，希望她們日後能成為資深記者。」

活在真實中

談及 Marina 未來的計畫，她表示正在構想成立另一個新媒體，內容將更輕鬆，涉及軟性新聞，且聚焦家鄉喀山的生活資訊。她解釋，這個想法與讀者的需求有關，「人們對政治新聞感到疲憊，因為這些新聞，基本上都在重複相同的內容，且難以改變現狀，有知而無力之感。」面對無法改變的政治迫害，讀者開始失去興趣閱讀這些新聞。

這個新的媒體計畫旨在創造一個社區，「我認為，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些聯繫，談論一些問題或有趣的東西，能將人們彼此聯繫起來。現在俄羅斯真的缺乏這種連繫。」

「要讀者光是閱讀政治新聞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要為他們提供啟發人心的故事。例如，我們會探討學生權利，分享如何避免被大學退學的方法。我們需要報道成功案例，因為人們無法長期只接收壞消息，否則只會對我們避而遠之。」

Marina 希望透過與讀者互動，不只提供內容，而更進一步推動社區聯繫、帶起討論等。例如，她其中一個參考對象，是喀山一個有 300 多名成員的 Telegram 政治討論群組。「群組不僅是討論政治，有時他們只是互相交談 . . .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有很多 Telegram 媒體頻道只提供大量資訊，但我認為人們需要的不僅是資訊，還需要一個地方，讓他們可以被傾聽、被理解，也許還可以得到一些幫助，使他們生命有意義，不再感到孤獨。」她表示，她理想中的新聞媒體，能夠以最有效方式支持俄羅斯民眾，使他們在安全範圍內推動小幅度的改變，賦予人民主體性 (subjectivity)。她相信，媒體存在的目的，最終都是為了以某種方式幫助他人。

也許這些由居民自發推動和分享的故事，正是捷克前總統、作家哈維爾 (Václav Havel) 口中的《無權力者的權力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政治迫害的結局早已被公權力框定在國家敘事內，但社區中的生活片段則可由人民自己書寫。一單接一單的政治打壓，那些細微的差異，在反覆的新聞複述裡磨平。在高壓的氣氛下，書寫或閱讀迫害，也許會令人忘記了積極的可能。努力如常生活的嘗試，在海外媒體的筆下被壓縮成一個個面譜化的沮喪敘事。在這種扁平化的定性下，人民更需要一個空間展現他們「活得磊落真誠」的姿勢。

在《故事和極權主義 (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中，哈維爾如是說：

「故事和歷史抵制虛無化的鬥爭，正是它自身之內的一個故事，並且屬於歷史。」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要如何去講述它，因為傳統的講故事的形式在這裡對我們不適用。我們也不知道支配我們的變形故事的法則。我們甚至不知道誰或甚麼東西是故事的主要或反面人物（這肯定不是那權力中心之內的少數人：她們也是某種更大的東西的犧牲品，就像我們）。」

以新聞作道德責任

談到為何繼續堅持從事新聞工作，Marina 說：「這是為我的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和俄羅斯境內人民所做的事情，是承擔責任的一種方式。她（俄羅斯）做了可怕的事情，而我不能不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從事其他領域的工作，但在這個時候，我不認為這對我來說是可行的，因為我們正要努力確保俄羅斯社會對戰爭罪行負責。」Marina 以及她的團隊希望俄羅斯變得民主，不再對其他國家和世界構成威脅，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致力重建俄羅斯的公民社會。

「我認為這只是一種承擔責任的方式。」她說。

政治笑話看未來

最後問及 Marina 對俄羅斯新聞業界未來的看法，面對俄羅斯政權封網等一系列打壓，俄羅斯的海外媒體，亦如其他國家的流散媒體一樣，正面臨營運難以持續的艱難處境。就《風暴》而言，Google 廣告功能因封網而失效，她甚至乎不知道一年後將變成怎樣。她感到前路茫茫。

Marina 以白羅斯喜劇演員 Slava Komissarenko 在俄羅斯爆紅的笑話，概括對未來的感受：白羅斯和俄羅斯在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但白羅斯超前幾季，俄羅斯看著他們，就可知道該預期怎樣的打壓。■



白羅斯喜劇演員 Slava Komissarenko | 網上截圖



在佩魯賈，國際新聞節的海報隨處可見 | 莫莫 攝

【意國直擊】 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

文／編輯部

意大利佩魯賈（Perugia）擁有風光明媚的羅馬古城風貌。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這裡已是知名旅遊景點，每年吸引數十萬遊客。而在 2023 年 4 月，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更是人頭湧湧——來訪的不僅是普通遊客，還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學生和研究人員。他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參加第十八屆國際新聞節（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Festival）。

這項活動可以說是歐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傳媒業界盛事之一。首屆於 2006 年由傳媒人 Christopher Potter 和 Arianne Ciccone 共同創辦。今



國際新聞節會場 | 莫莫 攝

年的活動從 4 月 19 日持續至 23 日，在短短五天內，新聞節在佩魯賈的七個會場舉辦了超過 200 場講座和研討會，探討國際傳媒業界的危機與前景。研討會主題多元，涵蓋編採室內的性別與種族平等、如何客觀報道氣候變化議題，以及 AI 對新聞業界的衝擊等。而在全球新聞自由不斷受到打壓、愈來愈多記者在本國報道時可能面臨國家粗暴干預的今天，「流亡媒體」毫不意外地也成為新聞節的討論焦點之一。

在眾多關於流亡媒體的討論環節中，題為「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 (Exiled Media is Not Just a Trend)」的一節尤為引人注目。這一場由 Sudeshna Chanda、Ivan Kolpakov、Cinthia Membreno、Ole Chavannes 和 Matt Kasper 五位流亡媒體人所展開的小組討論，在新聞節的主會場之一 Hotel Brufani 舉行。活動尚未開始，會場外已排起長龍。《如水》記者估計，現場有逾一百名觀眾聆聽五位講者探討流亡媒體的各種面向，包括流散社群的角色、與原居地讀者群保持聯繫的重要性，以及流亡媒體之間如何能夠相互合作。此外，這場討論會不僅僅是意見交流，五人也藉此機會，正式宣布成立環球流亡媒體網絡 NEMO (Network of Exiled Media Outlets)。他們表示，希望這個網絡能將全球的流亡媒體連結起來，讓彼此能夠互相幫助、互相借鏡，以令流亡媒體工作者能夠一起走過艱難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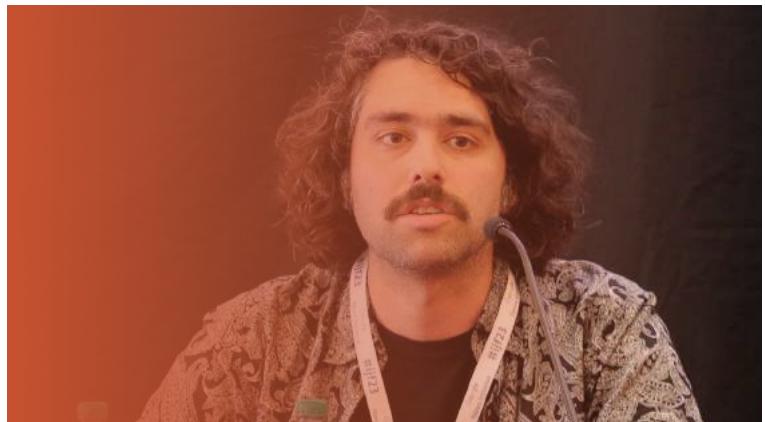


「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會場 | 莫莫 攝

五人雖然來自不同媒體，在不同國家工作、為不同國家的讀者服務，但所面臨的挑戰卻大致相同。例如在財政方面，雖然財政是全球所有媒體都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但流亡媒體具有其獨特的困境。擔任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緬甸民主之聲) 媒體發展 (Media Developer) 的 Ole Chavannes 就提到，流亡媒體工作者通常是從相對不發達的國家流亡至較為發達的國家，由於生活開支上升，薪資需求亦往往提高，「如果我們想在這些國家（移居的國家）給他們支付公平的薪金，對媒體的預算會造成沉重負擔」。

此外，如何決定讀者群也是另一討論焦點。一般來說，媒體的主要讀者對象通常是本地居民；然而，對於流亡媒體而言，他們的主要讀者既可以是他們原居地的本地人，也可以是已經流散到海外的流散社群，正如尼加拉瓜流亡媒體 *CONFIDENCIAL* 的讀者忠誠度經理 (Audience loyalty manager) Cinthia Membreno 坦言，「我們希望服務留下來的人和已離開的人」。問題是這兩者的興趣、觀點和關注的議題可能截然不同。流亡媒體應該如何選擇？

如果選擇以流散社群為主要對象，傳媒機構便可能須要面對流散族群人數遠少於本地居民的現實。讀者人數不足會導致影響力不足、資源不足，傳媒工作可能會難以持續。儘管如此，放棄流散社群讀者、專注於本地讀者也未必是出路。最明顯的問題是，媒體工作者如何在異地報道自己家鄉的事。在拉脫維亞報道俄羅斯新聞的 *Medusa* 總編輯及創辦人之一 Ivan Kolpakov 坦言，「每個流亡媒體都會努力為他們的母國提供服務，並期望自己能與本地民眾保持聯繫」，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對於流亡媒體來說仍是個挑戰。



Matt Kasper | 莫莫 攝



Ivan Kolpakov | 莫莫 攝

為了與原居地的民眾保持聯繫，一些流亡媒體會秘密安排記者在本地（原居地）工作。然而這可能會衍生出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流亡媒體無法保證這些本地記者的安全。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些與流亡媒體合作的本地記者或可能因此被拘捕，甚至被殺。在德國為俄國讀者服務的媒體 *ROMB* 的出版人 Matt Kasper 談到這裡時一度哽咽。「我們（與會者）大多都只是行政人員，而不是身處那些（威權）國家的記者。那些記者所冒的風險如此之大，他們才是走在言論與新聞自由前線的人。」

那麼，這些問題究竟可以如何解決？顯然沒有標準答案。事實上，即使有，答案也可能隨著時局的發展而改變，例如新科技的出現，可能會帶來新的解決方案，但威權政府採取新的打壓手段，又可能會加大



意大利佩魯賈 | 莫莫 攝

應對問題的難度。這或許就是為甚麼，這些問題要不斷討論。在今年的國際新聞節，無論是在正式講座還是記者閒聊的場合，都不時會聽到與會者認真探討如何應對這些問題。這些討論的機會是寶貴的，因為它們為流亡媒體人證明，儘管他們身在異鄉，失去了往日的「行家」朋友，可能會感到孤單，但他們並不孤獨。他們也有面對相同問題的「同路人」，甚至有「前輩」可以分享他們的經驗。

今次小組討論之所以命名為「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正是因為五名成員想要表明，流亡媒體雖然近年受到國際關注，但絕非新興現象。*ROMB* 和 *Medusa* 今年恰好 10 歲；*Zamaneh Media* 已有 18 年歷史；*Confidencial* 有 27 年；*Ole Chavannes* 的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更已運作達 31 年。這些年來，他們各有各的辛酸史，例如打從一開張就被伊朗政府審查的 *Zamaneh Media* 必須想盡辦法尋找繞過網路審查的方法；*Medusa* 在財政上要同時面對俄國政府的打壓，以及西方世界對俄羅斯機構的制裁；*Confidencial* 和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甚至不約而同曾經「二次流亡」，即曾經在政治局勢好轉時返回本國工作，但在政治狀況再次惡化後，又被迫離開。他們的經驗，總有流亡媒體「新手」可以借鑑的地方，而讓彼此借鑑交流，正是他們成立 *NEMO* 的目的。正如同於本地工作



國際新聞節是佩魯賈的盛事，市內一些商店還會售賣國際新聞節蛋糕 | 莫莫 攝

時，傳媒人會在下班後或放假時相約見面，閒聊或交換工作情報，五人希望 NEMO 也能成為流亡媒體「吹吹水」的虛擬空間。

NEMO 作為一個新成立的網絡，目前成員僅得五名與會者。他們表示歡迎其他流亡傳媒機構聯絡加入，但希望慢慢地、從基層做起，不希望搞成國際流亡媒體「大台」。即使在會上有觀眾對他們成立網絡的意念表示興趣，並笑問如果給 NEMO 10 萬歐元，他們會用來做甚麼，他們也指未有甚麼鴻圖大計，頂多就是「希望製作更多 Podcast」。

流亡，在許多意義上，本身就意味著離開「大台」。或許，NEMO 的發展方向確實就是流亡媒體應有的組織模式。在提問環節，一名來自肯亞、現居荷蘭的觀眾表示，她本來是傳媒工作者，移居國外後，仍非常希望重返媒體行業，只是這相當困難。她詢問講者能否提供任何建議。Matt Kasper 回答說：「我想說的是，我們恐怕無法直接幫助妳，但我們可能知道有人能幫忙。我們樂意利用我們的網絡為大家指引方向……妳可以看到我們的資料和電郵。」如若你查看 NEMO 網站 www.exiled.media，你會看見在「聯絡我們」一欄，他們的 email 是 info@exiled.media，而 location 則標註是：in exile。■



【《路透社》紀念講座】 如何在獨裁下報道： 尼加拉瓜及其他地區的經驗

譯／Jacky

編按

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每年都舉辦《路透社》紀念講座，邀請全球菁英新聞工作者，針對該年度新聞產業的重要議題發表演說，並在講座後進行座談會。

以下是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Carlos F. Chamorro）今年3月6日在2023年《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內容。《如水》獲路透新聞學研究所授權翻譯成中文發表。

“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於 2023 年 3 月 6 日發表一年一度的《路透社》紀念講座。屢獲殊榮的查莫洛是新聞網站 *Confidencial* 的編輯，並且是數個熱門電視節目的主持。”

非常感謝拉斯姆斯（Rasmus）、艾倫（Alan），以及路透社新聞研究所邀請我，在今天代表我的尼加拉瓜記者同業、乃至希望能代表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同業發言，分享我們在獨裁統治下的報道經驗。

將新聞及言論自由定為刑事化

在今年的 2 月 15 日，94 名尼加拉瓜公民被丹尼爾·奧蒂嘉（Daniel Ortega）和其妻羅薩里奧·穆里略（Rosario Murillo）的政權剝奪國籍；其他處罰還包括永久剝奪我們的政治權利，以及沒收包括社會保障退休養老金在內的資產。剝奪國籍的行為非法且違憲，並違反了尼加拉瓜所簽署的國際條約。

94 人的名單中包括 11 名記者，他們都是流亡媒體機構的負責人，如 *Confidencial*、100% Noticias、*Artículo 66*、*Nicaragua Investiga*、*Radio Darío*、*Divergentes*、*Café con Voz* 以及其他。在此之前 6 天，即 2 月 9 日，又有 222 名政治犯獲釋出獄，並被驅逐到美國，同樣被剝奪尼加拉瓜國籍。奧蒂嘉的報復行為，一手抹去之前釋出的虛假善意。

唯一拒絕接受被驅逐出境的政治犯——天主教會主教阿爾瓦雷斯（Rolando Álvarez），事發翌日極速被帶上庭受審，被重判監禁 26 年，並現已被轉移到一個最高戒備牢房。

至於獲釋放的政治犯中，有 12 人與傳媒有關：一名體育記者和博客、《新聞報（La Prensa）》的三名高層、創辦有線電視頻道 100% Noticias 的記者、一名電視節目政治評論員、幾名當地記者、甚至包括一名《新聞報》的司機。這名司機所「犯下」的罪行，是在 2022 年 7 月 6 日接載了一名記者，去報道仁愛傳教女修會修女被驅逐出尼加拉瓜的事。

他們都是在沒有任何證據下，被指涉嫌干犯所謂「密謀危害國家主權」、「洗黑錢」和「傳播假新聞」等罪行，甚至被單獨囚禁在監獄，或軟禁在家中長達 600 天。在被剝奪國籍的 327 人中，有政治和民間領袖、經濟學家、政治分析家、律師、商人、外交官、學者、科學家、醫生、牧師和社會活動家。

尼加拉瓜作為一個逾 15 年來禁止獲取公共紀錄的國家，這些被捕、被剝奪國籍的人士，一直以來都是獨立媒體的重要消息來源。在這次檢控後，尼加拉瓜不會再有任何獨立的消息來源可以具名提供事實、數據或分析。由於他們擔憂遭到官方報復——例如監禁，他們無一例外地要求匿名，以此作為向傳媒報料或發表意見的條件。

這種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雙面定罪，旨在打壓記者、新聞來源和輿論自由，也代表了尼加拉瓜法治在長久以來遭受摧殘的情況下，再次受到打擊。

作為一個「實然」¹ 警察國家，尼加拉瓜沒有集會或結社自由。政權還迫害天主教會，甚至禁止宗教遊行。2021 年，它掃除了所有的政治競爭，抹殺了舉行自由選舉的可能性，自

¹ 譯自拉丁文：*de facto*，意指在事實上存在，但或許未被法律等官方規範所承認。

2022 年以來，政權加大力度迫害民間社會，關閉了 3,200 多個非政府組織。

在這種情況下，在流亡下完成的新聞工作，仍然是我們所有憲法自由的最後防線。讓我簡要地解釋一下我們所經歷的來龍去脈。

民主轉型的崩潰

在 45 年前，即 1978 年 2 月，我開始在安納斯塔西奧・蘇慕薩・德瓦伊萊（Anastasio Somoza Debayle）的獨裁統治下，展開了我的新聞工作生涯。那時正是我的父親——《新聞報》總編輯佩德羅・華金・查莫洛（Pedro Joaquín Chamorro）被暗殺後一個月。

那是在互聯網發明的 20 年前。記者們不顧廣播新聞的審查制度，在教堂中庭裡讀出新聞報道。這被稱為「墓穴新聞（catacomb journalism）」。在反對獨裁統治革命的最後幾天，蘇慕薩下令用坦克摧毀《新聞報》的設施，彷彿它是一個軍事目標。

在桑地諾革命（Sandinista Revolution，又稱尼加拉瓜革命）期間，面對外國侵略戰爭和 80 年代的內戰，政治的軍事化令新聞工作被戰爭宣傳和反宣傳取代，國家審查和自我審查成為常態。

到了 1990 年，民主轉型開始，媒體蓬勃發展。這真是言論自由的春天。在我母親比奧萊塔・巴里奧斯・德・查莫洛（Violeta Barrios de Chamorro）的政府領導下，放寬新聞和言論自由成為政府政策，軍隊和警察也走向專業化。

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和過渡時期的成就是不可逆轉的。但是，自從奧蒂嘉在 2007 年通過選舉重新掌權以來，民主體制在超過 16 年的專制中倒退、被摧毀。奧蒂嘉通過選舉舞弊和非法連任總統，成功篡奪所有的政府機構；而奧蒂嘉的妻子穆里略，則作為政府的官方發言人，設計出一套傳播戰略，強制推出所謂「未受污染資訊」，也就是她所謂的「純淨狀態」的資訊，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傳達到市民手中，不經任何獨立媒體的質疑或調查。

在美國的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納羅出現的十年前，奧蒂嘉已經將獨立的新聞界稱為「敵人」，而且早在「假新聞」時代之前，他就指控記者是「戈培爾的孩子」²，以官方媒體激烈批鬥指控其政府腐敗和濫用權力的傳媒人。

早年，奧蒂嘉提倡恐嚇獨立媒體，以及進行政治間諜活動和封鎖公共紀錄。他還創建了自己的私人媒體帝國。然而，在他倚靠大企業裙帶經濟利益執政的期間，雖然尼加拉瓜政府欠缺民主和透明度，但還是容忍了諸如 *Confidencial* 這樣的媒體的存在。這些媒體曾經調查政權的腐敗行為，例如將超過 50 億美元的委內瑞拉援助款項轉給奧蒂嘉的私人企業，或者跨洋運河項目失敗的巨型騙局。奧蒂嘉當時會容忍這些異見，可能是因為他完全控制了政府的所有部門——包括軍隊和警察，認為弱小的反對派不是競爭對手，也不對他構成威脅。

² 編註：「戈培爾的孩子」指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孩子。

2018 年叛亂之後：極權主義獨裁下的新聞業

這種專制政府的模式，在 2018 年 4 月爆發的公民抗議運動下崩潰。政權看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遂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當局還放生了超過 300 宗謀殺案無作起訴，並視新聞界為要粉碎的敵人。

政權對新聞業的打壓，包括暗殺和對記者的人身攻擊、電視審查、對媒體的實際破壞，以及透過海關阻止報社獲得紙張和其他原材料。這些手段，最終導致媒體機構倒閉和被充公、政府另推新的鎮壓性法律，以及記者遭到監禁。

尼加拉瓜在 2018 年至 2023 年近五年的社會政治危機中，透過「實然」與司法打擊，對新聞界犯下的罪行，在委內瑞拉要花十多年時間才得以全部干犯。

2020 年，政府通過「網絡犯罪特別法」。該法例針對透過社交媒體和媒體機構傳播的所謂「假新聞」，並將涉案者處以 1 至 5 年的監禁。該法例提到，散播假新聞的行為會造成焦慮、不穩定和損害道德，卻無定義甚麼是「假新聞」。

在這法例下，已有逾 20 人因涉「假新聞」罪被判處監禁，當中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牧師，甚至還有一個沒有任何社交媒體賬戶的農民。

在獨裁統治下從事新聞工作——繼續報道和講述真相，是一種抵抗行為。我的 *Confidencial* 編輯部已經被查封過兩次。第一次是在 2018 年 12 月 13 日午夜，我們的辦公室被警方在沒有任何手令下突擊搜查，其後被武裝警衛長期佔據。2019 年 11 月，*Confidencial* 設立了一個新的臨時編輯部，但在 2021 年 5 月 20 日，我們再次被警察突擊，他們再次奪去我們所有電腦和電視設備。儘管如此，我們從未停止透過數碼平台報道和廣播，一天也沒有停止。

奧蒂嘉還查封了有線電視頻道 100% Noticias 和《新聞報》的辦公室。但他從未能剝奪新聞業本身，因為被查封的媒體繼續以流亡的狀態進行報道。

這個政權還關閉了 40 多家地方電台和電視台，迫使超過 150 名記者流亡。其中一些記者重組了大約 25 家電子媒體，這些媒體主要分布在哥斯達黎加、西班牙和美國；然而，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流亡記者，為了生存，或因擔心家人遭到報復，而不得不離開新聞專業。

我們製作的電視節目《本周 (Esta Semana)》和《今晚 (Esta Noche)》，已被禁止廣播和在有線電視上播出，但我們仍繼續透過 *Confidencial* 的 YouTube 頻道和 Facebook，觸及逾 415,000 名訂閱觀眾。

社交媒体是克服審查制度的超卓工具，但同時假消息和政治兩極化，也在同一空間與獨立新

聞媒體拉鋸。如果沒有民主和法治，新聞自由就會遭到不受制約的權力任意威脅，就像今天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內瑞拉的情況一樣。在那裡的記者得不到任何保障。

在美洲及歐洲，人權組織和致力於新聞自由的組織作出了非凡的努力，記錄及展示這三個國家如何迫害新聞行業。

然而最終，我們唯一的保護措施只有做更多、更好的新聞，以加強媒體的可信度以及我們與受眾的聯繫。唯獨優質的新聞工作，才能確保我們能夠有效傳播，抗衡政府的虛假信息，以及國家出資予統治家族私營企業管理的宣傳機器，包括五間電視台，和幾十間電台及網站。

尼加拉瓜流亡新聞業者的教訓與啟示

自 2021 年中期以來，我已經第二次流亡到哥斯達黎加，以避免因尼加拉瓜刑事起訴和逮捕令而被滅聲。我的整個新聞編輯部，以及幾乎所有的獨立媒體，都在流亡中工作。

流亡不再是一個迫使我們離開和搬遷到另一個國家的臨時緊急狀況，而是一種永久、中期的狀況。這對新聞業帶來巨大挑戰。我們的宗旨仍然是講述透過公民抗命改變獨裁統治的故事，但這些新聞報道的對象，並不是在哥斯達黎加或美國的流亡圈子，而是在尼加拉瓜。

從國外報道尼加拉瓜的情況，需要建立那些長期身處警察國家風險的消息來源。同時，這意味要提高核查標準，證實匿名消息來源，以便繼續發布可靠信息。

第二，我們必須取得消息來源的信任，以便從國家內部調查腐敗、政府雇員的不滿和政權危機。我們還必須保證安全的溝通渠道，來保護我們的消息來源。

卡洛斯·F·查莫洛與阿倫·羅斯布里奇 (Alan Rusbridger)、盧斯·梅利·雷耶斯 (Luz Mely Reyes) 和約翰·艾倫·納姆 (John Allan Namu) 進行對話 | 約翰·凱恩斯 攝



第三，我們必須通過合作夥伴網絡擴大我們的觀察和報道能力，並專業地為社交媒體上的圖像和資訊洪流進行新聞策展，以便能夠看到、聽到和報道日常生活的情緒、社會危機、鎮壓迫害、抵抗和變革的希望。

第四，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繼續在數碼平台上創新，以加強我們與受眾的關係，並講述令人難忘的故事，使我們能夠抗衡官方的謊言和社交媒體上瘋傳的錯誤信息。

事實核查（fact-checking）是克服錯誤信息的必要手段，但這仍不足夠。我們必須重建新聞媒體的信譽和讀者的信任，使媒體有能力重新與受眾建立聯繫，甚至利用社交媒體的影響力，來促進高質量的新聞報道。

第五，流亡新聞工作者還參與了國際和拉丁美洲的合作新聞倡議，如拉丁美洲調查新聞中心（CLIP）或美洲新聞平台（CONNECTAS），以具創意的多媒體敘事，講述橫跨多個國家的區域故事。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流亡新聞機構正面對財務可持續性的挑戰。這些機構一方面要面對由數碼革命引發的危機和與科技巨頭的不對等競爭；另一方面，政府又以法例檢控在這些媒體投放廣告的廣告商。這些危機迫使我們尋找新的經濟管理模式，並通過國際捐贈、觀眾捐款和商業盈利維持媒體的獨立性。

然而這也需要支持獨立新聞行業的慈善基金會和國際援助機構觀念上的範式轉移。它們有必要承認，流亡新聞業的生存不僅在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內瑞拉，而且在俄羅斯、烏克蘭、伊朗、阿富汗、緬甸、阿塞拜疆和其他國家，都是民主的當務之急，需要長期的支援策略。

以下我精選了 10 篇於 2018 年至 2023 年間，*Confidencial* 所發表的報道，當中有一些榮獲國際獎項，充分展現我們如何在獨裁統治下進行報道。

2018 年 6 月，*Confidencial* 發表了題為「他們精確射擊殺人（They shot to kill with precision）」的調查報道。該報道根據 19 名鎮壓死傷者的電腦掃描報告，揭示狙擊手使用戰爭武器對平民頭部和胸部進行致命射擊。這些證據均得到醫學專家和受害者家屬的證詞證實，成為支持國際人權委員會後續有關尼加拉瓜大屠殺和所謂「清理行動（clean-up operation）」報告的關鍵之一。

2018 年 11 月發表經濟學家、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FSLN）中央銀行政治秘書 Ligia Gómez 的深度訪問。該報道探討有關穆里略發出「讓我們全力以赴（Vamos con todo）」的命令以發動大屠殺，也是一系列調查報道的第一篇，旨在揭示鎮壓指揮系統如何在警察和準軍事團體之間協調運作。

2020 年 2 月發表有關「農村法外處決和屠殺農民」系列調查報道，揭示農村地區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發生的 30 多宗謀殺案，以及尼加拉瓜軍隊為何對此須負共同責任。

2021 年和 2022 年發表關於政府隱瞞 Covid-19 造成大量死亡悲劇的調查報道。該報道通過比較分析疫情首 21 個月官方發出死因為肺炎、心臟病、糖尿病和高血壓相關的數字，證明尼加拉瓜是全球因疫症造成超額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具人性的數據新聞故事，全賴受害者家屬、醫生及衛生工作者不顧官方審查制度提供證詞，才能成就這篇報道，當中許多人付出了被解僱和打壓的代價。

2018 年至 2023 年間，報道關於數百名政治犯遭受長期酷刑和隔離的狀況，以及警察、檢察官辦公室和司法部門逍遙法外的調查報道成為新聞焦點。政權一直未能從國家記憶中抹去這些政治犯的存在。

2022 年 2 月發表的一份關於奧蒂嘉一穆里略家族 22 間私營公司架構的調查報道，以官方董事會會議紀錄為依據，揭發其私營企業的代理人網絡，以及它們如何挪用公共基金及來自委內瑞拉政府的援助金進行貪污。

2022 年發表政府高級官員和數十名公務員的匿名證詞，顯示政府如何腐敗和鎮壓異己，並指出日漸失去支持的政權將政府工作人員脅為人質。

2018 年至 2023 年期間，有超過 60 萬名尼加拉瓜人大規模出走，相當於總人口的 10%，主要前往美國和哥斯達黎加。*Confidencial* 旗下的 *Nicas Migrantes* 平台，從另一角度，講述尼加拉瓜的故事。這些故事的主角，包括滯留在墨西哥華雷斯城（Ciudad Juarez）的移民、在試圖橫渡布拉沃河（Rio Bravo）被淹死的人、在墨西哥被偷渡蛇頭拋棄在貨櫃車中窒息而死的人，以及在哥斯達黎加成為勞動剝削受害者的移民工人。

針對奧蒂嘉政權主要國際盟友——俄羅斯、古巴、委內瑞拉、中國和伊朗的調查報道顯示，這些國家政府之間的保護主義，助長了政治間諜活動和違法不管的現象，並且對尼加拉瓜在獲得投資、國際貿易或接受外國援助方面幾乎毫無助益。

PX Molina 繪畫的漫畫，以及政治諷刺電視節目 *La Ultima Mirada News (The Last Look News)* 和 *Fuera de Broma (Joking Aside)* 等展示，幽默和嘲諷是對抗專制權力時最有力的資源，是瓦解官方謊言奧威爾式語言的一種方式。

奧蒂嘉獨裁政權本來就不是一個接受問責的政體，因此這些調查報道並沒有令公共政策產生任何改變。然而，這些故事和數據，都大大幫助專家組今天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提交有關尼加拉瓜侵犯人權行為的報告。而報告的結論就是，有明確的證據表明，總統奧蒂嘉、副總統穆里略以及國家的指揮系統在犯下危害人類罪方面負有責任，這些罪行且在尼加拉瓜一直持續發生。

這份重要報告中的證據，正是尼加拉瓜流亡記者的印記。記者們與受迫害者的家屬走在一起，寫出真相和記憶的一份初稿，為正義奠定基礎，豎立恢復尼加拉瓜民主的一根支柱。與此同時，國家仍然維持一貫論調，用仇恨言論污衊公民為「政變搞手」、「恐怖分子」，說他們現在是「無國籍」。但是，儘管恐懼和沉默仍然存在、試圖讓獨裁者逍遙法外的情況成為常態——獨立新聞正在真相的戰爭中獲勝。

面對民主的惡化，新聞界面臨的主要挑戰，始終是在最惡劣的政治撕裂環境下，仍堅持監督權力和做好新聞工作。

尼加拉瓜法治的崩潰，和獨裁政權的鞏固是一面鏡子，映射了今天受到獨裁主義傾向威脅的中美洲新聞業。在危地馬拉，賈馬特 (Giammattei) 政府將 *El Periódico* 的編輯 José Rubén Zamorodwa 囚禁在監獄達七個月。在薩爾瓦多，布克萊 (Nayib Bukele) 的政權已將獨立新聞標記為「敵人」。在洪都拉斯，我們慶祝加博基金會 (Gabo Foundation) 今天向 *Contracorriente* 的總監、年輕記者 Jennifer Avila 授予馬奎斯獎 (Gabriel García Marquez award)，作為在暴力、腐敗和有組織犯罪的背景下，勇敢實踐良好新聞工作的典範。

中美洲的記者們一同堅守承諾，不屈服於威嚇和審查，也不會選擇自我審查。正如去年在危地馬拉新成立的中美洲記者網絡 (Central American Network of Journalists) 所言，「沉默不是一種選擇 (Silence is not an option)」。

在危機中，記者有時需要面對取代政黨和其他機構角色的誘惑，但我們每天都要記住，記者不是法官、偵探、警察或稽核員。我們的使命也不是游離於社會運動，而是要維護我們的自主性，監督公共和私人權力，以及倡導變革的新力量。

尼加拉瓜的經驗表明，在獨裁統治下，流亡新聞業的抵抗並不足以為民主變革鋪路，但只要他們保持信念，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新聞，新聞自由的火焰就會繼續燃燒，成為所有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

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文／Kennedy W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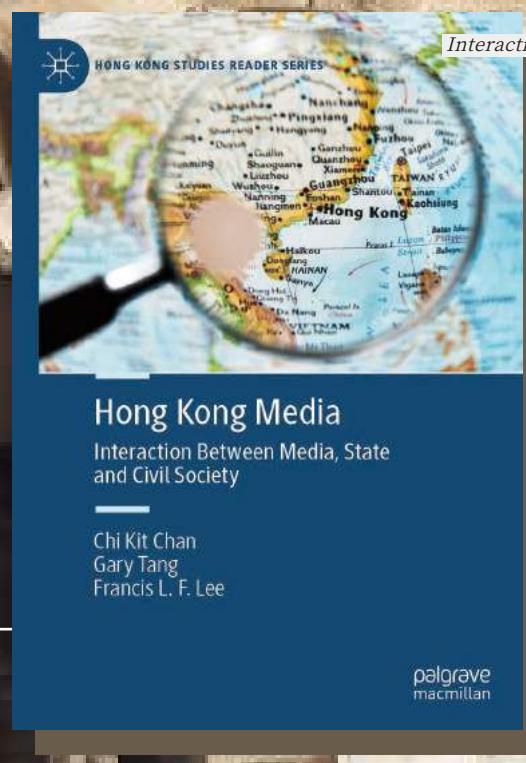
逝去的一種聲音？

2014 年 9 月 27 日早上 7 時，我站在金鐘夏愬道的便利店外，隔著玻璃看著當天報紙頭版。在我的記憶中，《大公》、《文匯》、《東方》等建制派媒體均形容，前晚衝入公民廣場為「暴力」行為，卻甚少提及警察當晚拿起警棍衝入人群追打示威者。反之，《蘋果日報》則提及當晚警察過分的執法行為。旁邊的友人與我徹夜留在添美道，他低聲喃道「只係得《蘋果》講真話……」。這句話在當年相當諷刺，因為《蘋果日報》的新聞報道手法，在校園經常被老師詬病，甚至禁止學生引用。但在當刻的香港，似乎只有《蘋果日報》才把當晚示威者的經歷作完整報道。

2021 年 6 月 24 日清晨，100 萬份《蘋果日報》附上「給香港人的告別書」，被押解走入歷史。黎智英、壹傳媒行政總裁（同為《蘋果》社長）張劍虹、《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等高層相繼被捕。不久後，《立場新聞》也逃不過停運、高層被捕

的命運。在國安法之下，有一種新聞聲音在這些年間在香港被消失。不少網台 KOL 多次提及香港新聞自由被封殺，大眾如今須在海外尋覓具備公信力的媒體。經濟學家 Albert O. Hirschman 曾經出版一本書名為 *Exit, Voice, and Loyalty*。如今的香港媒體，是否已經失去聲音（voice），只剩下忠誠（loyal）和離開（exit）兩條路？

在西方社會有一句諺語叫「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No news is good news）」。但在極權社會中，的確是沒有新聞（news），因為只有好的黨國宣傳（propaganda）。當媒體只是黨國機器時，社會便缺乏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因此，在極權國家，其實「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那麼今天的香港，我們該如何理解新聞自由與媒體生態？這便是今期評論著作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要處理的問題。



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 亦不是天長地久

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

本書回看媒體歷史，提到在初期的英殖香港，新聞自由曾經在高壓政治下處於低谷。例如，殖民地政府曾經在 1951 年訂立非常嚴格的報章註冊法例。雖然報紙業在當時非常蓬勃，但在報道殖民地政府及中英矛盾問題上，卻是敏感議題。例如在 1962 年 5 月的逃港潮期間，就有記者因在邊境採訪，而被控以「阻差辦公」罪。由此可見，當時的英殖政府並沒有尊重媒體監察政府的公權力。

然而，在六七暴動前後，港英政府逐漸脫離高壓政治模式，嘗試讓香港變成開放的國際城市。因此，新聞媒體逐漸變成資訊流通的重要媒介，也成為了公民社會的聲音。三位作者陳智傑、鄧鍵一和李立峯在書中提及主

權移交前後的新聞媒體業，是介乎於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之間，有著監察政府和反映市民生活的重要角色。書中亦提及一些學者曾經預測，香港媒體於主權移交後，在後六四年代的中國極權治理下，會變成黨國宣傳機器。然而，這猜測當時落空，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親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媒體均仍擁有所謂的自由發聲的空間。

這種自由的空間在過去十多年的本土運動中，容讓不同本地媒體資訊流動自由，甚至產生動員能力。本書提到在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中，親建制與民主派媒體便發揮不同角色，代表著社會上兩種互相對立的聲音。而基於社會兩極化的政治環境，親政府媒體會與反政府的報道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會為政府提供反對運動的說辭。而在網上媒體發達的年代，不少人把資訊接收的渠道轉移到網媒和 KOL，尋找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聲



音。雖然在這段抗爭時期，不少人會質疑政見與自己不同的媒體的真確性，但在更廣闊的政治光譜上，「新聞自由」的確容許不同種類的資訊和視角，同時存在於一場運動和一個城市之中。

然而，如今不少人所惋惜香港逝去的「新聞自由」，其實是有一段歷史的限期，那大概就是六七暴動後的社會開放及國際化，一直到近年社運及國安法這段時期。學者推測回歸後「新聞自由」會完全消失，如今也是一種遲來的應驗。尤其當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非建制媒體逐一面臨打壓和倒閉。作者則認為，在後國安法時期的香港，新聞媒體的角色，和對公民社會的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有新聞作為一種好新聞？

書中提及多項在國安法後收集的研究數據，其中提到在白色恐怖下，不少人減少在社交媒体分享新聞資訊，這減低了傳統新聞媒體的流通性。此外，網上的自媒體生態中，也出現「自我審查」的現象，例如留在本地的網絡 KOL 也減少在社交媒体發布政治相關的新聞消息。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新聞機構彷彿只剩下「忠誠」與「離開」兩個選擇。然而，我們仍然看見一些新聞工作者、旁聽師與本土研究機構，繼續努力在本地經營獨立報道並擔任消息發布的工作。這些人是值得尊敬和支持。此外，近年不少 KOL 和資深傳媒人選擇離開香港，於海外持續報道香港新聞及政治議題，成為「離開的一種聲音（Voice after exit）」。移民群體如何在外地建立全球性的僑民／公民社會？這也是近年流散政治學者熱烈討論的議題。

然而，本書在 2022 年 8 月發行，因此並沒有提及近年非常多人關注的《法庭線》和《庭

刊》等本地網絡新聞媒體。這些媒體透過旁聽摘錄，把法庭內的內容傳播給香港本地和海外的香港人。這些報道客觀陳述為主，但提供了不少消息和新聞養分予海外一眾 KOL 及網絡媒體，讓事件可以持續發酵。例如 47 人初選案，在開審以後獲得全球各地港人關注，香港人在社交網絡不斷流傳、分享有關消息，亦有 KOL 和網民在網絡平台表達對法庭審訊內容的看法。因此，這些非政治取向的法庭新聞報道，仍在香港本地及海外香港人群體擔任相當重要的傳播媒介。

總結本書的討論，筆者認為海外媒體的成立，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

遙控器上的香港：

比起媒體， 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

文／破曉



10 年前，政府宣布「香港電視」不獲發牌。數十萬計網民一夜間湧入群組聲援，演變成空前壟冚的政總集會，人數之多顛覆一直以來香港人只就政制爭議、反高鐵或反國教等重大議題而上街的印象。往後 10 年，更大規模的衝突多不勝數……

原來遙控器上的一個選擇，預視了一座城市的未來。

「港視」的不明死因漸被歷史淡忘，但即使前者成功轉型成網購，亦不能湮沒當權者是否嘗試改變一貫遊戲規則的謎團。行政會議曾同意向 3 間電視台發牌，惟一名最初獲邀且合資格的申請者，最終被行政長官以「一籃子因素」扼殺，後來司法覆核披露，干預自由市場的理由竟是「公眾利益」。王維基誓言要建立一間屬於香港人的電視台，為此賣走一手創立的香港寬頻。當時香港網絡速度位居全球第一，但他認為創意產業對香港未來甚至比最值得驕傲的「世一」還更重要。結果一個本來沒多少爭議的免費電視牌照，碰上港人身分認同和產業單一的癥結，意外掀起一場完美風暴。香港媒體未來不只是一間機構或一個行業的命題，終究是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命運。

媒體是因，想像是果。探討香港媒體未來，先要拷問它因何而生。

香港開埠早期的報章是透過刊憲、傳教和貿易反映大英帝國利益，首份英文日報《孖刺報》卻是由美國人主編，對英人持批判立場，更因批評怡和洋行而誹謗罪成。該報印刷字典時留下一副中文活字，於是這副活字被用來出版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



報》，主理的伍廷芳和黃勝因洋人不諳中文而自主編採，隨後報人紛紛辦報宣傳變法以至革命。

歷史說明香港媒體擁有三大支柱。一是自由港帶來意見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視新聞為商品，唯一限制是普通法下的誹謗罪。二是透過地緣政治引進傳播科技，媒體目的則由傳教過渡至推廣公民社會。三是文化落差衍生的創作和新聞自由。歷史上只有輿論開始反噬香港地緣政治地位等情況下，港府才會出手干預。例如封禁反清言論、戰前新聞管制、及省港大罷工和六七暴動期間的新聞審查。香港媒體的價值是以香港獨特地位為底線的放任自由。

只要不觸及大前提，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香港對外宣傳，造就前所未有的媒體景觀。

據稱香港曾是全球按人口比例最多中文報紙的地方。戰後香港報紙急增至 85 份，其時人口只有百餘萬。20 年前，全盛時期香港有 5 條全天候新聞頻道，數量居然比同期的英美還要多。以效益而言，這是不合邏輯的，唯一合理解釋是香港媒體表面上一直服膺本地市場，實際卻依賴海外收益。例如《蘋果日報》採用電腦排版和遊走灰色地帶的報道手法宣揚民主、《有線中國組》則利用 24 小時頻道和香港記者在中國的差別待遇報道政治消息。兩者賬面上是連年虧蝕，縱使新聞質素再高，背後支撐的仍是看不見的價值。對《蘋果》而言可以是投射到兩岸的政治影響力，對有線來說或是九倉的地產項目和在中國的投資。當投資者視樓盤節目為真正戰場，未受注視的新聞環節，



便有機會形成編採自主的一片綠洲。

不過一旦香港的政治版圖有所改變，媒體亦會跟著出現板塊移動。

我們正經歷的，是一場徹底改變遊戲規則的大地震。新聞由被視作商品變成法律詮釋下的政治工具、地緣局勢下嶄新科技如人工智能逐漸絕跡香港、默許的資訊自由被監視。當支柱崩塌而無人修補，香港媒體將步入萎靡不振的時代。有人將出路寄託於近期相繼湧現的眾籌網媒，解藥卻取決於我們能否重新定位。一間媒體是政治氣候、營運模式和內容三者缺一不可。單靠內容，可以因為不擅吸引足夠受眾而無法持續經營。寄託離散亦難免重蹈歷史覆轍。歷史軌跡表明，離散媒體成長所依賴的翻譯外電和移民專題，需求將隨後代融入當地社會而下降。有心人成功配對資金支持仍要面對缺乏影響力的困局，畢竟目前的復甦假象掩飾不了市場萎縮的事實。雖然多間新辦媒體先後吸納以往具公信力媒體的班底，但整體影響力疊加起來，仍不足以彌補一間傳統媒體的消失。要麼只能專注一類新聞、要麼隔周刊登深度報道、要麼在多地頻密更新而分身不暇。最不方便的真相是，即使媒體數量反彈，留下來的人發現以碎片化網誌的方式苟延殘喘，已難以重奪流失至綜合性外媒和專門時事評論的讀者群。

災後重建雖則艱鉅，可幸是我們並未丟失藍圖。

我們需要認清，當公民社會遭受打擊時，支持本地媒體和爭取香港民主掛勾的論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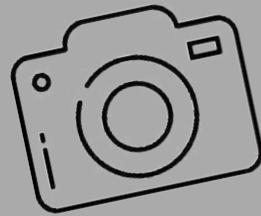


失效。政治上香港媒體要在國際上重新定義未來角色，避免潛在讀者陷入迴避新聞（News avoidance）的漩渦。當香港媒體仍在討論在網站增添分享連結時，美國傳媒近期已經探討網媒先後結業或破產是否象徵社交媒體步向終結。不論媒體或是政府未來的最大難題，都是如何與十數秒的短片展開競賽。我們要拾回未來傳媒人和年輕受眾的注意力，率先進入下一個傳播世代。在全球趨向脫勾之際，更值得香港人思考的是如何從狹縫中找到擅長製作而能獲世界注目的內容。比起媒體，未來香港或許更需要一個平台去整合內容達致協同效應，研究如何以創新的營運方式，在國際政治上重奪資訊樞紐的地位。

香港媒體未來與一個共同體的命運之間是注定的羈絆。歷史意外未必重演，不過媒體發展的有趣之處在於科技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時候。當初我們也以為轉台的按鈕必然在電視機上，遙控器面世卻改寫了曾經的理所當然。正是不經意的偶然，讓未來充滿想像。■

以攝影走入社區

文、攝／陳啟駿



移居英國已好一段時間，一直希望能結識更多本地朋友，深入瞭解當地社區文化、居民特質與傳統。自己修讀攝影，一直也希望以攝影走入社區，拉近與本地群眾的關係。種種攝影創作方法中，我最喜愛黑房沖曬，因為每次沖曬都不一樣，充滿驚喜。一直希望能在家中花園設置一個黑房，與不同朋友一起分享、經歷和談論攝影，一同享受攝影帶來的樂趣。攝影是一種獨特的媒介，與時間、空間和文化有著緊密的扣連。在特定的時空進行拍攝，能令照片帶有獨特的意義，創作出屬於這個時代的照片。

離家不遠有一個很受當地人歡迎的公園，每逢假日也有不少家庭到訪，十分熱鬧。心想如果能在公園設置一個流動黑房，便能與不同朋友一起體驗拍攝與沖曬的樂趣。在沖曬的過程中亦可與當地朋友分享交流，暢談生活。透過社區藝術，我希望能與當地朋友產生連繫，再建立一種獨特的溝通方法。

大約在兩個月前，我開始了一個透過攝影與本地朋友拉近關係的社區藝術項目。作品拍攝的地點是我居所附近一個很受歡迎的公園。那是不少居民經常流連散步的地方，是社區的聚腳地，帶有不少他們的珍貴回憶。

我選擇了銀鹽相紙作為拍攝的負片，這能夠讓參與者在較短的時間內觀看拍攝的影像。照片記錄的是參與者站在湖邊的剪影，而非正面，以保護被攝者的個人私穩，讓民眾更容易接受這個社區藝術項目。

我在公園湖邊的一個遊人必經之處搭建了一個流動黑房，邀請社區朋友一同參與拍攝和沖曬過程。

在沖曬過程中，我會邀請參與者為正片任意塗上顯影劑。於是，顯影的圖案便帶有他們的身體動作和記憶，成為他們參與創作的痕跡。拍攝的照片不單記錄了我和他們相遇的瞬間，還記錄了他們與這個空間的回憶。 ■



日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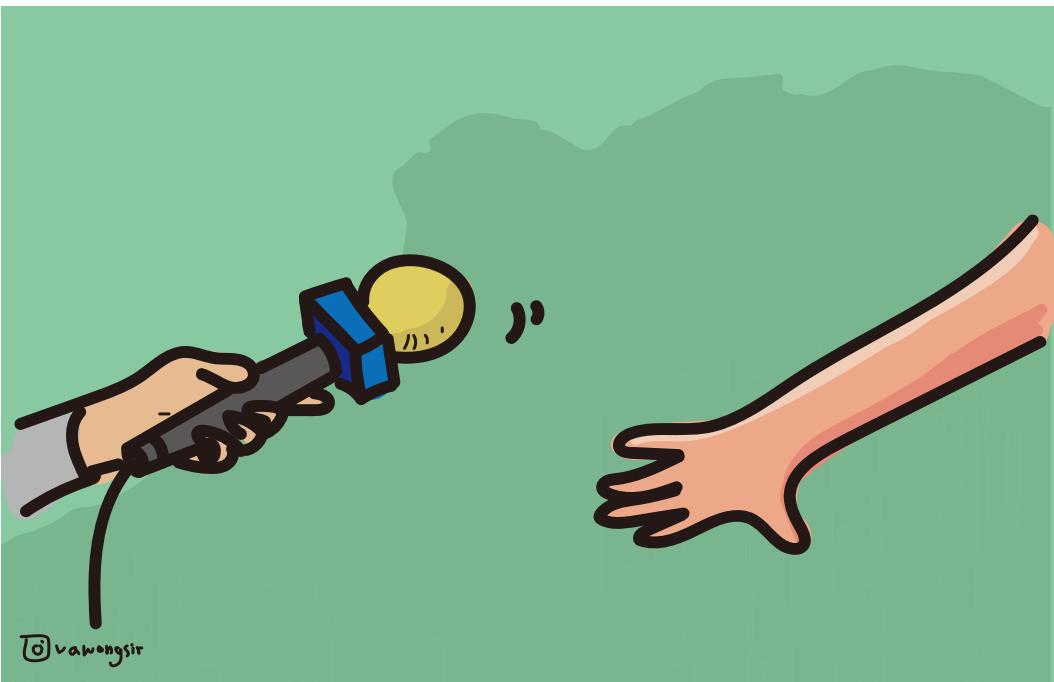
瑪珂



Justin Wong



Vawongsir



@vawongsir

讀者：

《如水》編委入面，我印象中有部分都有公開講過 / (或公開招生) 有同中學生私補，如果佢哋問你升學問題，例如問港大畢業嘅某幾位，依家應唔應該為「香港大學」個名而走去讀（我講緊薄扶林嗰間），你哋會點答？

三大是否仍然存在？

New message!

OPEN

答：—

感謝某部分讀者的某部分問題。我在私人市場打滾幾年，基本上都任職於歐美的上市公司，同時在學院入面讀書同工作，恰巧又是讀者所講的某部分港大畢業同時又教私補的編委會成員，我估計我這部分人最有資格回答這位讀者的某部分問題。

為甚麼我這麼強調在私人市場工作？因為在汰弱留強的私人市場，會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不同學歷背景的人。就我看來，對於雇主或上司來說，公開考試和大學文憑的功能都一樣，就是一種降低訊息費用 (Information Cost) 的手段。

因密謀欺詐等罪行而被美國通緝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因常）在其著作《經濟解釋：受價與覓價》中曾以尋歡市場解釋何謂訊息費用，我試著用這個例子解釋勞工市場。（按：相信雷鼎鳴教授深有體會。李雲迪使用「交易費用」甚高的微信支付尋歡，可謂雷教授的忠誠信徒）。在不完全競爭下，市場處於覓價狀態。要獲得與貨品相關的訊息來釐定價格不易。例如，我所想像的賣笑佳人作為一種勞動力的體現，其勞動力的價格會因外貌、聲音、技能、服務內容等而有所不同，但客人趨近問價甚或詢問技能會十分尷尬，而且不可能每一個佳人都問，更甚者佳人有可能謊報，因此要獲得賣笑佳人的全部資訊再進行交易的話，訊息費用甚鉅，最終會出現張五常所講的「類聚定律」，但在此不贅。

同樣道理，在另一類的勞動力市場中，一個人作為生產單位，付出勞力，換取收入。可是勞力也有很多種，諸如技術、智商、才能、天賦等，都是勞力的一些例子。這些勞力並不能輕易驗證，或者說，要獲得每一個應徵者在這方面的資訊，訊息費用高昂。因此大學文憑與公開考試成績就是可以減低獲得這方面資訊的工具，讓雇主 / 上司快速知道一個人的基本才能，或曰知道他是否一個正常人類。因此一張良好的大學文憑，可以給予雇主或上司較為充足的資訊來作出招聘決定。從招聘和求職的角度而言，良好的大學所發出的大學文憑更為有效降低訊息費用，繼而增加應徵者的工作機會。

如果一個人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那麼更為知名的大學的資源理論上比較充足。舉例而言，學術期刊訂閱平台 Jstor 為院校提供不同的訂閱制度。同一篇論文 / 電子書，不同學校會有不同閱讀權限。小弟嘗試過要找尋一本書，結果港大和 UBC 的圖書館帳戶可以存取下載，而另外兩家大學的帳號則沒有檢閱權限。小小的例子，已經知道差別。

如果從一個補習老師的角度來說，我不會糾纏是否港大，而是本著一種「存在先於品質」的精神，請學生考進大學後才議論大學之間的優勝劣敗。不過，通常我都會說：「有錢就出國啦。冇錢？咁就做大池塘裡面的小魚，都唔好做小池塘裡面嘅大魚啦。」學鄭中基於《我要做 Model》話齋：氣質這回事是沒能夠買的，它是來自生活，同時來自你身邊的人。

係咪咁講？當然啦，我作為一個崇優的人，三唔三大呢啲問題對我嚟講係從來冇存在過。不過又咁講，出面世界好大，你以為你喺香港喺一個大池塘，其實呢個大池塘又只係出面喺小池塘。都係啲句，冇錢就過塘吧啦。■



讀者：



我係一個喺香港讀緊書嘅大學生，但完全睇唔到香港發展事業嘅將來，例如我有專業技能，或者躺平做基層職位，兩樣都睇唔到將來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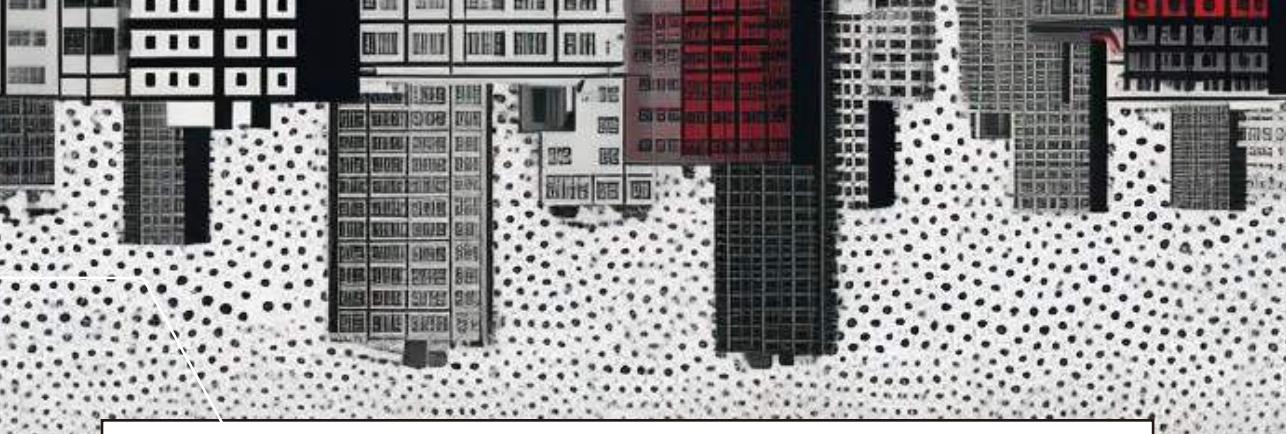
發展專業服務或高科技啞零空間配套支援。做基層行業隨時係窮忙族／月光族。

想問香港未來仲會唔會有可能繼續任何發展？

(e.g. : 發展事業 / 組織家庭等等)

New message!

OPEN



答：
—

各行各業情況有所不同，而每個人嘅需求同理想亦不一樣，所以老實講，真係好難一概而論。亦因為咁，我認為不論係一味勸留定係一味勸走，都係不負責任的。

單從教育來講，作為一個喺香港讀 bachelor 但之後亦有分別喺英美留過學嘅人，我的確係認為國外某啲機構能畀到比香港嚴謹得多嘅訓練。但掉返轉來講，亦有不少去咗英國嘅朋友，發現當地人工遠比香港低，只係能勉強應對租金同生活費，真係 paycheck to paycheck。所以真係好睇你係擺香港同邊嘅比，同埋你想做乜。

不過，對非流亡嘅香港人來講，其實留或者走並唔係一個咁斬釘截鐵嘅決定：有唔少朋友來咗英美好幾年，最後都係決定返去香港發展，更有唔少朋友周不時兩邊走。如果資源同能力許可，我會建議出來試一兩年，master 又好，打份工又好，自己親身體驗一下唔同地方嘅工作情況，同認識吓當地嘅政經體制，再決定喺邊嘅發展，都不失為一個做法。

你提到嘅問題係香港喺 2019 年之前，過去二三十年一直面對緊嘅問題：對新興行業支援唔夠，對基層市民亦保障唔足。呢啲亦唔係香港獨有嘅問題，雖然美國喺工作上嘅支援同配套大體來講係比較好，但係唔少城市嘅基建都千瘡百孔，而佢嘅醫療同教育制度亦對基層同中產唔友善。你如果問我，美國係咪一個組織家庭嘅好地方，老實講我都會有保留。當然，呢啲條件唔係一成不變，但亦不易改變：喺美國有身分嘅人可以用選票甚或抗爭嘗試改變社會，但其兩極化嘅政治亦令好多根本嘅問題無從解決。國安法下嘅香港，固然制肘處處，但 2021 年 deliveroo 外送員依然成功組織罷工，證明並非毫無抗爭空間可言。我哋固然可以揀邊嘅發展，但最後啲個地方變成點，it is still up to us。■

守望麥田：

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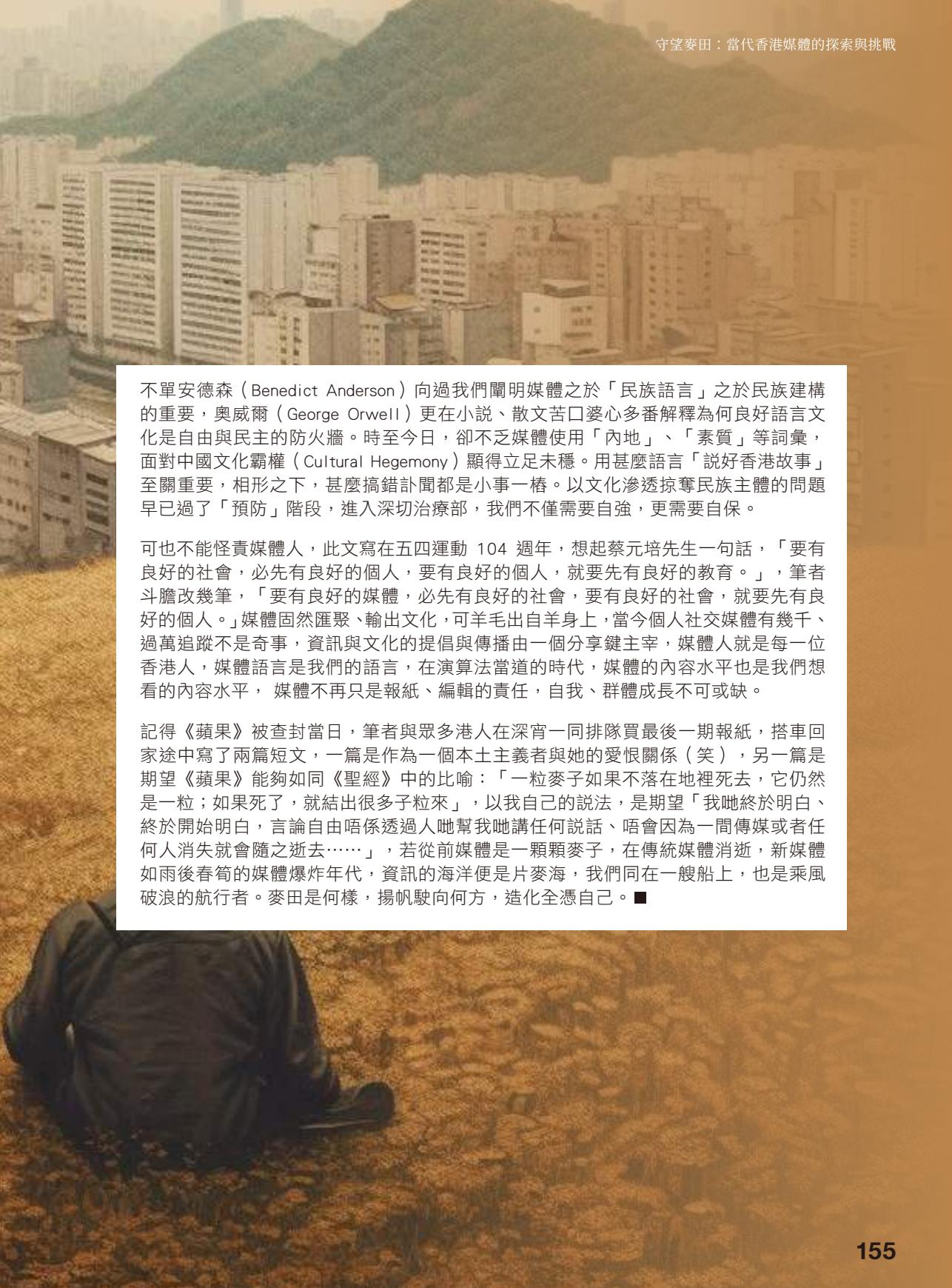
文／莫離（筆名，本名不傳，好奇的香港人，社群工作者，愛海德公園，更愛海心公園。）

記得蔡瀾先生在前年書展簽書會被問為何不再寫專欄、轉戰微博時，答道：「《蘋果》結束後都沒有報紙能入眼，寫在哪裡好？」今天的我想，若蔡生得悉港人群體有如此多有質素的刊物雜誌，有個園地寫文章、不需用微博做平台便是好。

可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試問我們香港又有哪間媒體能容下蔡生一隻字呢？他德高望重，小媒體不敢用；他敢言敢為，「大媒體」也許連正眼也不看。但由此可見，查良鏞先生的《明報》、黎智英先生的《蘋果》，一代頂尖、蓬勃的紙媒確實功不可沒，供那時代、那些傳奇的字句、思想、文人、領袖、故事、歷史棲身，孕育現代香港想像，媒體之於民族的重要顯而易見，《想像的共同體》當中也詳述了印刷與民族建構的深厚關係。當現代的媒體早已經脫離紙本，更脫離文本，幾乎被圖像、影像、甚至短影片壟斷，這些轉化、碎片化了的媒體卻仍然是資訊匯集與傳播之處、公共文化的塑造者、思想的溫室，擔當民族與時代精神的火炬。

筆者工作主要服務香港流散社群，身在異地，難免記掛香港大小事。雖然沒見有單位像以往紙媒的集團式經營、包羅萬有，但看到眾多媒體擔起大旗，在不同平台、以不同形式各展所長，補足各類資訊，成為現時港人社群的橋樑，實在欣慰。可是，在接觸同胞期間，發現媒體倚賴、思考的惰性仍然存在，更發現更可怕的是新一代根本不看香港媒體。即便以前在香港舉辦學生活動、與一眾青年人交流遊戲，估歌仔命中率最高、反應最快的永遠是抖音歌，問到香港有哪些熱門網絡事件、本土節慶，青年人則啞口無言，遑論要流散新一代有系統地、以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視角瞭解香港與族群，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這裡說媒體與族群與身分認同的關鍵，並不是要主張媒體應該成為宣傳（propaganda）工具，而是強調媒體擔當著民族文化的把關角色。在全球化、資訊爆炸、認知戰爭當道的年代，筆者已經不再期待媒體在質量、體量上做得多好，因為這裡最大的隱憂是連我們的語言運用也開始轉變。普通話在校園中成為主流，中國用語融入日常，甚麼優化、高光、小三……不只是 00 尾、10 後香港人（是，2010 年出生的香港人已經升上中學了），一般大眾與媒體亦如是。



不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向過我們闡明媒體之於「民族語言」之於民族建構的重要，奧威爾（George Orwell）更在小說、散文苦口婆心多番解釋為何良好語言文化是自由與民主的防火牆。時至今日，卻不乏媒體使用「內地」、「素質」等詞彙，面對中國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顯得立足未穩。用甚麼語言「說好香港故事」至關重要，相形之下，甚麼搞錯訃聞都是小事一椿。以文化滲透掠奪民族主體的問題早已過了「預防」階段，進入深切治療部，我們不僅需要自強，更需要自保。

可也不能怪責媒體人，此文寫在五四運動 104 週年，想起蔡元培先生一句話，「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筆者斗膽改幾筆，「要有良好的媒體，必先有良好的社會，要有良好的社會，就要先有良好的個人。」媒體固然匯聚、輸出文化，可羊毛出自羊身上，當今個人社交媒體有幾千、過萬追蹤不是奇事，資訊與文化的提倡與傳播由一個分享鍵主宰，媒體人就是每一位香港人，媒體語言是我們的語言，在演算法當道的時代，媒體的內容水平也是我們想看的內容水平，媒體不再只是報紙、編輯的責任，自我、群體成長不可或缺。

記得《蘋果》被查封當日，筆者與眾多港人在深宵一同排隊買最後一期報紙，搭車回家途中寫了兩篇短文，一篇是作為一個本土主義者與她的愛恨關係（笑），另一篇是期望《蘋果》能夠如同《聖經》中的比喻：「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很多子粒來」，以我自己的說法，是期望「我哋終於明白、終於開始明白，言論自由唔係透過人哋幫我哋講任何說話、唔會因為一間傳媒或者任何人消失就會隨之逝去……」，若從前媒體是一顆顆麥子，在傳統媒體消逝，新媒體如雨後春筍的媒體爆炸年代，資訊的海洋便是片麥海，我們同在一艘船上，也是乘風破浪的航行者。麥田是怎樣，揚帆駛向何方，造化全憑自己。■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

Hongkonger in Deutschland e.V.

香港人在德國協會是一個於2019年10月成立的非牟利機構，旨在為香港人和德國人提供一個交流和相互支持的平台。我們的使命是向在德國生活的人推廣香港文化及語言，讓他們獲取香港的時事新聞，從而更了解香港的歷史和社會現況。

我們的工作包括：

- 為在德港人提供協助；
- 舉辦不同活動，如集會、展覽、飯聚、放映會等；
- 開辦廣東話和德語課程，促進港德文化交流；
- 翻譯新聞、電影字幕、書籍等。





香港邊城青年
- the Hong Kong outlanders -

· 自 2019 年成立的在台港人組織 ·

我們是在 2019 年反送中期間，由一群關心台港議題的香港青年組成。
自成立以來，曾在台灣舉辦過大大小小的遊行、集會、快閃行動和活動。
目前主要工作是連繫在台港人離散社群，以及在台香港政策研究與倡議。

過往我們來到異鄉求學或工作，從生活中認識台灣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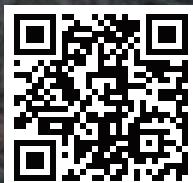
在這片土地立足，嘗試紮根於此，並為家鄉發聲。

香港情勢的變化，讓我們開始更慎重思考在台港人的未來發展。
在劣勢當中，我們仍抱有希望，相信在外依然有能為香港做的事情。
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貢獻一己之力，讓台灣變得更好。

我們希望在這片土地上持續以香港人的身份說出香港經驗。
讓世界上更多的人，對於民主、自由以及人性等普世價值，有更多的思考。

我們堅信，就算是大雨，也永遠沖刷不了香港人的志氣與堅持。
願榮光歸香港，願民主與自由長守台灣。

歡迎各位透過以下方式更了解邊青：
hongkong.outlanders@gmail.com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Hong Kong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South Australia

SUPPORT

ADVOCATE

ENGAGE

協會致力在南澳推廣香港文化及普世價值，
並協助新移居南澳香港人安居樂業，和攜手
參與社區公民活動。

我們把握機會進行倡議和遊說，向政府反映
香港移民的需求，以制定適切的移民政策及
支援措施。

協會旨在建立一個包容和繁榮的南澳香港社
群，貢獻澳大利亞社會。

聯絡我們：

contact@hkcasa.org.au

www.hkcasa.org.au

www.facebook.com/hkcasaorgau



FACEBOOK
PAGE



協會官網



BRITONS
IN HONGKONG

[@britonshk](#)

[@britonshk](#)

[@britonshk](#)

Britons in Hong Kong (BHK) 的成立，除主張推動 BN(O) 身份及待遇平權外，亦希望香港人開始以英籍港人此身份生活及思考。在道德責任上，BHK 認為英國既然同樣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對中國長期違反聲明及不承認其有效性的情況，不應只發表每半年一次的香港報告及口頭批評作罷。BHK 希望製造輿論壓力，令英國政府就香港日趨惡化的政治情況發聲及作出行動，以保障其海外國民在香港的基本權利。

2020 年，英國政府推出 BN(O) Visa 後，BHK 稍微轉變短期目標，旨在協助香港人就該計劃移居英國（包括提供簽證教學、收集和整合在英港人對準備移英之建議等）以減輕移居帶來的不安和焦慮；本組織同時亦提出作為 BN(O) 公民應有的權力和義務，包括推動港人登記成為選民並投票。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移英，令 BHK 重心放於英國，致力作為宣傳不同的在英港人組織在英的抗爭活動，以及推動各項聯署活動，令本地民眾更容易理解港人移居英國的原因和極權政府在英國的滲透。

2022 年 11 月，英政府放寬 BN(O) Visa 的申請限制，容許在 1997 年後出生的 BN(O) 子女能獨立申請簽證。此舉反映政府開始正視英國國民後代不是英國國民的問題。

BHK 未來的其中一個重點為積極推動政府進一步放寬申請限制（包括但不限於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前未滿 18 歲，其父母並沒有為其申請 BN(O) 的人）。對於香港前景未有明確方向的情況下，BHK 嘗試以英籍港人本位的角度，在各個社交平台提供一個空間，以討論和思考歸英後自決的可能性。



TELEGRAM
CHANNEL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3 JUN Vol.10 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編輯委員會 張崑陽、黃台仰、Kennedy Wong、鍾燊豪、鄺頌晴、江曼諺、
式、馮敬恩、言、千八女鬼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譚競端、周永康、梁繼平

總編輯 張崑陽

編輯部 M.Y.、Jacky、日巷、卡卡、莫莫

美術設計 富六六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106 臺灣臺北大安區仁愛路三段 29 號 8 樓之 1
電話 (02)2564 3255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3 年 6 月

定價 新臺幣 450 元

客服信箱 contact_cs@flowhongkong.net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聯絡更換)

如水：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張崑陽總編輯。--
初版。-- 臺北市：社團法人如水協會，2023.06
面； 公分

ISBN 978-626-964-008-9 (PDF)

1.CST: 媒體 2.CST: 政治 3.CST: 文集 4.CST: 中國
5.CST: 香港特別行政區

541.831657

11201083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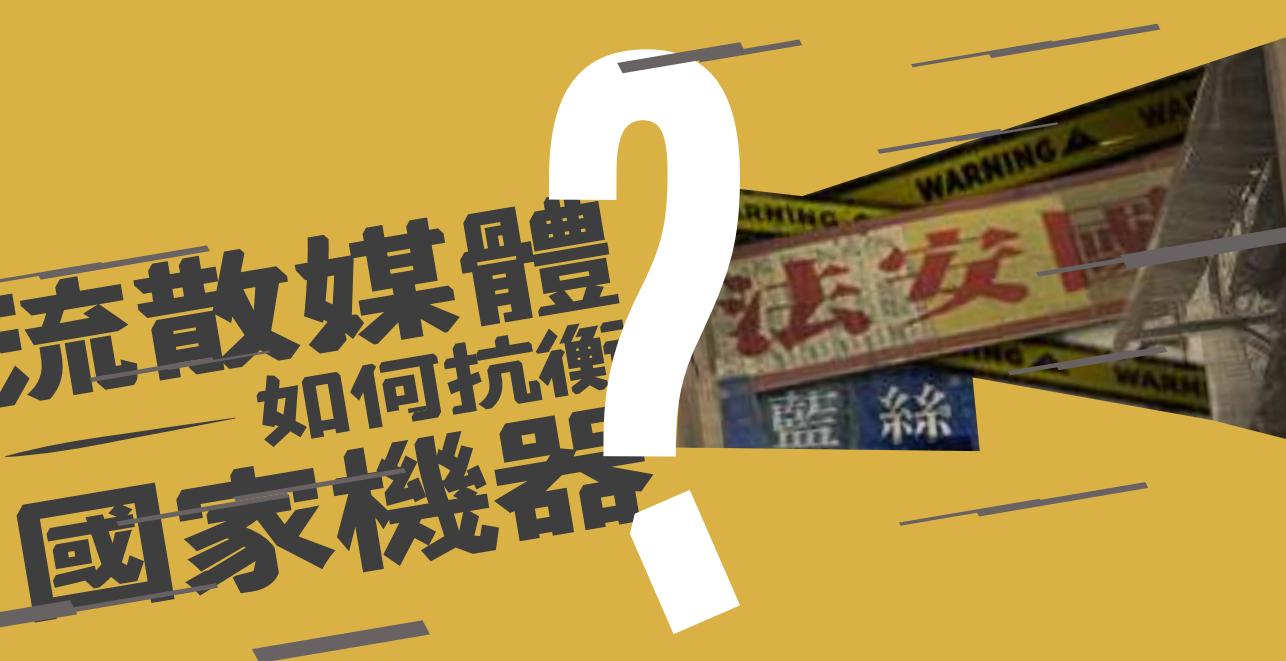
《如水 Flow HK》

官方網站：<http://flowhongkong.net/>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flowhkmagazine/>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flowhkeditorial/>

Vol. 10
2023 JUN



流散媒體 如何抗衡 國家機器

社團法人如水協會
出版發行

| Printed in Taiwan | 新臺幣450元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